

范毓周《甲骨文》

[一刻字“龙骨”的奥秘](#)

[二 汉字的鼻祖](#)

[三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

[四 甲骨文的流散国外](#)

[五 从孙诒让到王国维](#)

[六 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的全面展开](#)

[七 新中国建立后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八《甲骨文合集》的编集及其意义](#)

[九 甲骨文所反映的晚商社会](#)

[十 殷墟以外的甲骨文](#)

[十一 甲骨文研究的未来展望](#)

著者范毓周先生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书由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由殷墟网站站长殷商帝国大祭司2002年9月27日扫校上网。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数不尽的文化宝藏。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是其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甲骨文是我国商、周时期用于记录占卜活动内容的古代文字。它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比较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甲骨文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的鼻祖和前身。

甲骨文又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它真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愧为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和古代埃及的纸草文书、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一样，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发达史上占居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放射着绚丽的光辉。

一、刻字“龙骨”的奥秘

我们通常所说的甲骨文，一般是指殷墟出土的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的商代晚期文字。

殷墟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至帝辛(即殷纣王)八代十二位商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我国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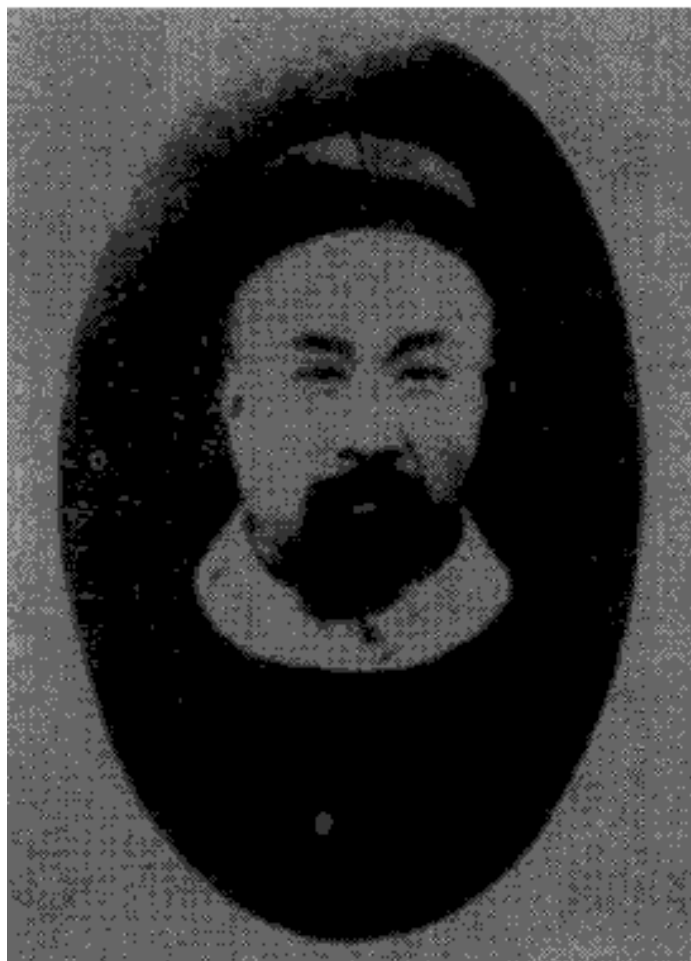
郊；以小屯村为中心，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范围约有二十四平方公里左右。这里到处埋藏有极为丰富的商代晚期文化遗物，甲骨文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贵族在进行占卜活动后，将有关占卜活动的内容刻写在用于占卜的龟甲或兽骨之上的文字。由于刻写有这些文字的龟甲或兽骨首先在殷墟发现，甲骨文又有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殷契、殷墟文字等许多名称。此外，学者们也有称之为龟版文、龟甲兽骨文字、龟甲文、甲骨刻辞、贞卜文字的。甲骨文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名称。

甲骨文除了出土于殷墟之外，在我国的河南省郑州市，山西省洪洞县，陕西省长安县、扶风县、岐山县以及北京市昌平县等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也陆续有发现。这些甲骨文不仅有商代的，还有周代的。不过，它们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内容上看，都远远无法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比。因此，在以下各章的叙述中，我们所介绍的主要是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至于殷墟以外出土的甲骨文情况，我们将在第十章中专门介绍。

甲骨文最初发现于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关于它的发现经过，曾经流传过一个极为有趣的传说。

相传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秋天，北京城内有一位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图一)因患疟疾延请太医诊治。太医诊脉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一味是中医经常用以涩精补肾的药材“龙骨”。王懿荣随即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从明代开张至今的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一一审视，无意间发现药包中的“龙骨”上刻有一种和篆文相似而又不大能认识的文字。这一发现使他大为惊讶。王懿荣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对于古代文字有很深的素养和造诣，“龙骨”上的这些奇异的古代文字，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寻根问底，查明来历，专门派人又到那家中药店将所有带有文字的“龙骨”全数买回。王懿荣对这些带字的“龙骨”进行了精心研究，初步断定这些“龙骨”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原来是比当时已知的各种较早的古文字还要古老的文字，它们也根本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商代占卜用的兽骨。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是在这样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的。



这个故事不仅十分生动，而且流传相当广泛，但它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传闻。因为经人调查，北京的中药店拣药时，一向都是先将拣出的龙骨捣碎，然后再包入药包的。“龙骨”既然被捣碎了，当然也就无从去发现它上面是否刻有文字。不过，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王懿荣是较早接触、收购甲骨文并最早对甲骨文进行初步鉴定的学者，则大体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最早发现这些带字“龙骨”的，应当说是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农民。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被人们当作带字“龙骨”看待的。

早在学者们开始接触甲骨文之前的二十多年前，小屯村的农民便在翻耕土地时发现了甲骨。当时，他们只是把这些甲骨收集

起来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药店，药店也一直把这些甲骨当作“龙骨”来收购。这种“龙骨”的收购，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激发着当地农民挖掘甲骨的兴趣。他们每至农闲时节，便随时就地挖掘，挑出较大的卖给药店。在这些较大的甲骨上，往往刻有文字，而药店收购时不要带有文字的，他们使用铲子削去文字后再拿去出售。对于小块的或字多不易削去的，他们往往用来堵塞枯井。也有人用它们刮削成粉末充作医治刀伤的“刀尖粉”。总之，在学者们开始接触甲骨文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它们一直是被当作刻字“龙骨”看待的，数以万计的珍贵甲骨文资料就这样被毁弃了。

大约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药店不愿收购的刻字“龙骨”引起了古董商人的注意。清代末年的安阳城是当时的彰德府府治所在，由于当地经常出土青铜器和其他古代文物，北方各地的古董商人常到这里收购古物转销北京、天津等地。在这些古董商人中，有一位山东潍县人范维卿。他在收购古物的过程中，注意到小屯村农民挖出的刻字“龙骨”，便在这年冬天，告诉了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和王襄等人。他们听了范维卿谈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的契刻文字，孟定生并猜测这可能是古代的简策。第二年秋天，范维卿买到一些刻字“龙骨”，带到北京，送给当时担任园子监祭酒一职的著名金石学者王懿荣，立刻受到王懿荣的极大重视。王懿荣经过研究，初步断定这是一种刻写有古代文字的“龟版”，遂出高价购买收藏。王懿荣凭借他的丰富渊博的金石学和古文字知识，经过更进一步的精细研究，终于断定这是商代用于占卜的甲骨，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是当时所知最早的古文字篆文和籀文之前的一种更古老的古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说，最早接触、购买甲骨文并作出鉴定意见的学者是王懿荣。大约在同一年稍晚，范维卿到天津时还卖给了孟定生和王襄一些甲骨，因而，他们也是较早接触并购买收藏甲骨文的学者。由于王懿荣等人的购买、研究，一向不为人们所知的刻字“龙骨”终于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开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的重要珍贵资料。

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刻字“龙骨”的奥秘被人们揭示出来。原来这些刻字“龙骨”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王室贵族进行占卜活动留下的文化遗物。

占卜作为一种宗教迷信活动，在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就已流行，后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广泛流行于我国许多民族中。商代是占卜活动极为盛行的时代，当时几乎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吉凶。例如，祭祀、征伐、田猎、收成、风雨阴晴、祸福疾病，直至妇女妊娠，生男还是生女，都要进行占卜，有时对同一件事还要反复进行占卜。

商代晚期占卜所使用的材料是龟的甲壳和兽类骨骼。使用龟甲时主要是使用龟的腹甲，间或也用龟的背甲。兽骨则主要使用牛的肩胛骨，偶尔也使用牛的肋骨或鹿、羊、猪的肩胛骨等。龟甲在使用前要将甲壳从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的连锁处——甲桥部分锯开，使甲桥的平整部分留在腹甲上。然后将带甲桥的腹甲锯去甲桥外缘的一部分，使之成为边缘比较齐整的弧形(图2)。背甲则一般直接从中间脊缝处对剖为两个半甲(图3)。有的背甲在对剖之后，还要再锯去靠近中脊部位的凸凹较大的部分和首尾两端，使之成为近似于鞋底状，并在中部钻出一个圆孔(图4)，这种背甲学者们称之为改制背甲。牛肩胛骨也要经过加工才能使用。一般先要将骨臼部分从较长的一面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使之成为月牙形，然后再将臼角向下和向外分别切去一部分，使留下的臼角形成一个近于直角的缺口，最后再将直立的脊骨连根削去，并将整个骨板削平，同时削去骨臼下部隆起的部分，整个骨板的初步加工即算完成(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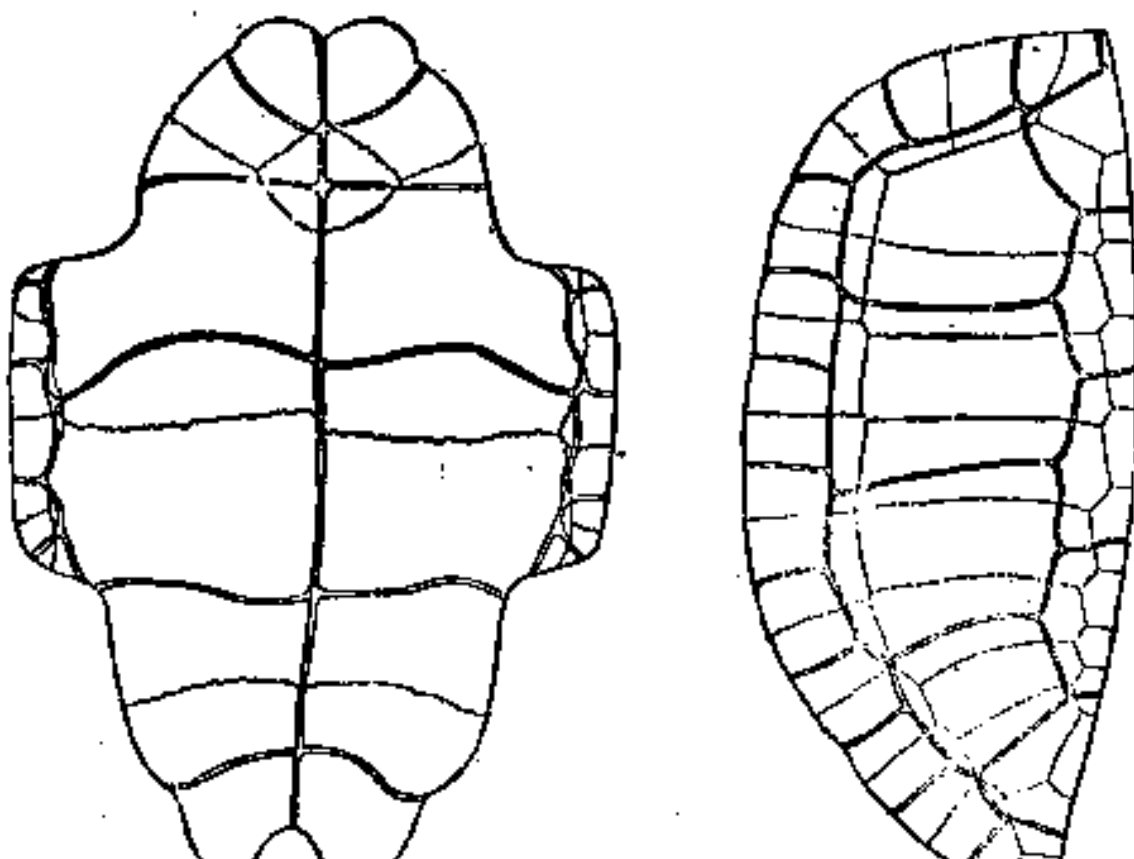




图 2 加工后的龟腹甲



图 3 加工后的龟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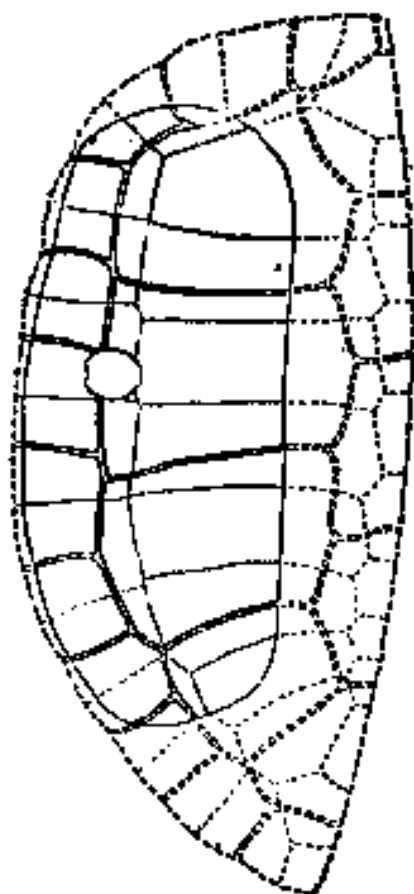


图 4 改制的龟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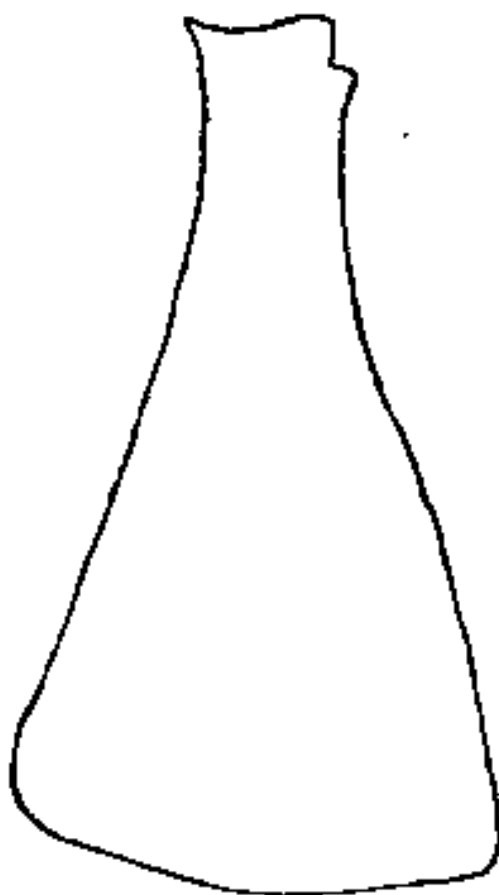


图 5 加工后的牛肩胛骨

龟甲和牛肩胛骨经过上述初步加工后，还要进一步刮削和磨光，然后在它们的反面挖和钻制出圆形和长椭圆形梭状的巢槽，以便在占卜时用火在这些巢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纹。长椭圆形梭状的巢槽叫作凿，一般长约1厘米左右，口宽底窄，呈梭状斜槽。圆形的巢槽叫作钻，一般紧靠凿边正中部位钻出，是比凿稍小的圆形洞穴，一般都在凿的内侧。凿和钻都只做到距离正面极薄的地方，但不能穿透骨面。凿和钻的排列和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其数目则根据龟甲和牛骨的大小而定(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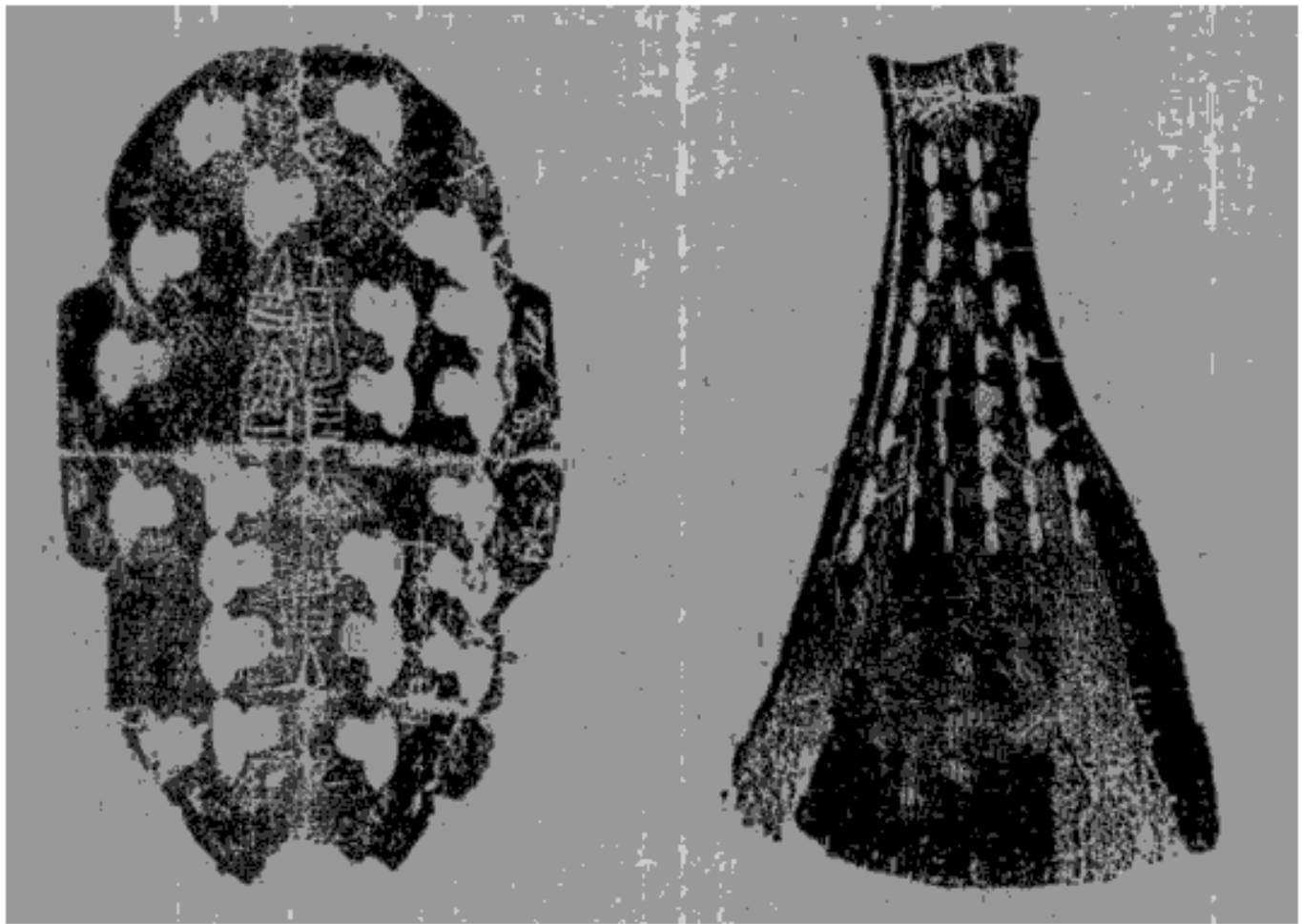
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保管这些龟甲和兽骨时，一般还要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这种记事文字在甲骨上刻写的部位共有五种形式，学者们称之为“五种记事刻辞”。它们分别为：

1、甲桥刻辞

即刻写在龟腹甲反面甲桥上的刻辞(图7)

2、背甲刻辞

即刻写在龟背甲反面边缘处的刻辞(图8)



a. 龟腹甲

b. 牛肩胛骨

图 6 甲骨上的钻凿

- 3、甲尾刻辞 即刻写在龟腹甲尾部的右边的刻辞(图9)。
- 4、骨臼刻辞 即刻写在牛肩胛骨顶端骨臼面上的刻辞 (图10)
- 5、骨面刻辞 即刻写在牛肩胛骨骨面比较宽薄的一边下部的刻辞(图11)。



图 7 甲桥刻辞(右:我以千。
左:妇丙示百,癸)

图 8 背甲刻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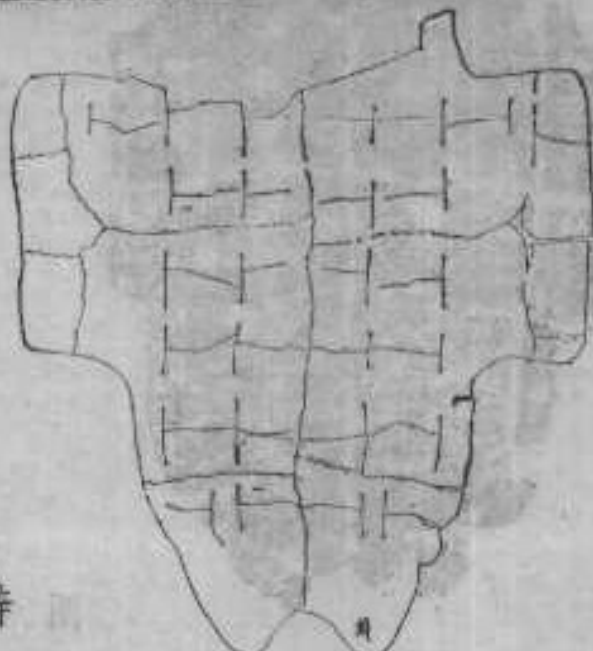


图 9 甲尾刻辞

有的学者也把上述五种记事刻辞称为“署辞”。它们也是甲骨文的组成部分。

商代晚期的占卜活动一般是由卜官从事的。卜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穴，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项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的卜兆下面，还常常刻写出表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甲骨学者称之为“兆序”（图12）。它们也是甲骨文的组成部分。





图 10 骨白刻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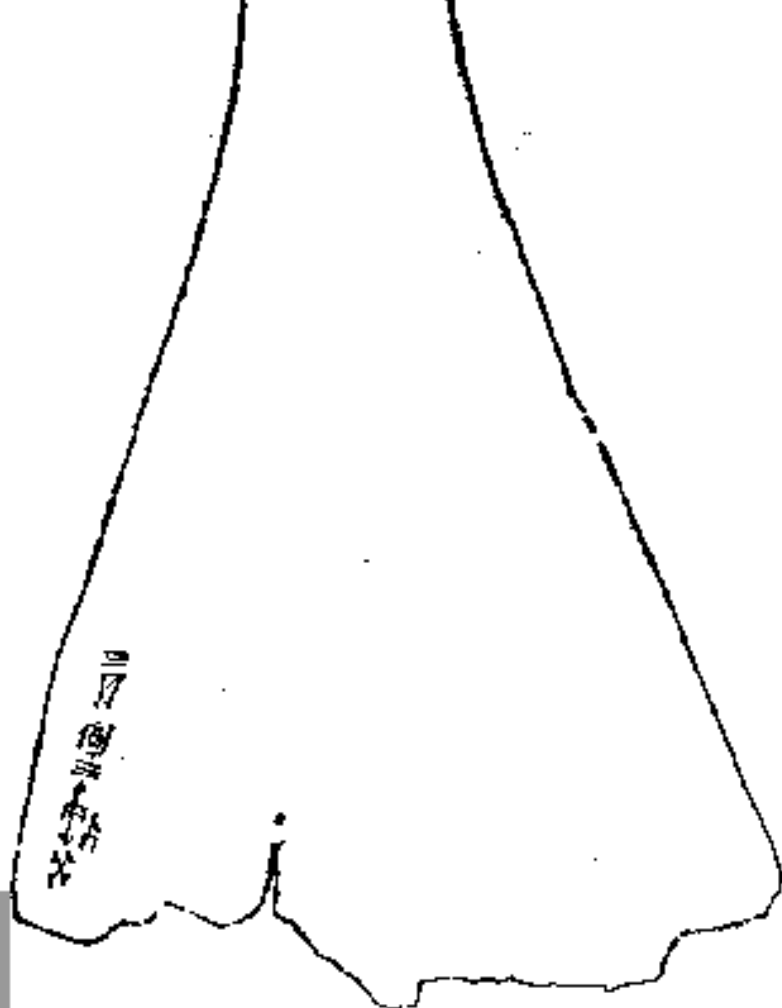


图 11 骨面刻辞



图 12 卜兆与兆序

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卜辞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通常是正面刻写出一部分，另一部分在反面接着刻写。一条比较完整的卜辞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1. 前辞

学者中也有称为叙辞的，一般记述占卜的干支日期和主持占卜活动的人物名称等内容。

2. 问辞

学者中也有称为命辞的，一般记述占卜时卜问的事项内容。

3. 占辞

一般记述商王或占卜者根据卜兆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吉凶判断或推测。

4. 验辞

一般记述占卜活动结束后事情是否和预卜的判断或推测相应验等内容。

例如，武丁时期的一条完整的卜辞为：

癸卯卜，殼贞：旬亡(无)祸？王固曰：祟(有)祟，其
祟(有)来艰？迄至七日己巳，允祟(有)来艰自西，
噩友角告曰：舌方出，侵(侵)我于聚，田七十、人
五。(图13)



图 13 刻有完整卜辞的甲骨

它的基本组成是

前辞：“癸卯卜，翌贞：”

问辞：“旬亡(无)祸？”

占辞：“王固曰：里(有)祟，其里(有)来艰？”

**验辞：“迄至七日己巳，允里(有)来艰自西，翌友角告
曰：舌方出，慢(侵)我于鬯，田七十，人五。”**

甲骨上卜辞的刻写也有一定的规律。商代的书写行款和旧时代直写的格式大体相同，也是竖写直行，由右到左。不过在甲骨上刻写卜辞时还要根据卜辞的位置而定。例如，刻写在龟甲上的卜辞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龟甲左右边缘部位的卜辞，刻写时是由外向里，即位于龟甲左边的行款由左向右，位于右边的则由右向左；另一种位于龟腹甲中缝两边的刻辞，则由里向外，即在左边的从右向左，而在右边的则从左向右。牛胛骨上的卜辞一般多刻在靠近骨边的部位，其行款大多是从外向里。

甲骨上一般刻写的卜辞不止一条。当时对于同一件事常常有正反相对应的两种卜问，记载这种对应相卜的卜辞叫作“对贞卜辞”。对贞卜辞往往刻写在甲骨上左右对称的相应位置上。此外，还有一种对于同一件事反复卜问多次的卜辞，它们在牛胛骨上大多由下向上依次分段排列。早期卜辞中的这种对于同一件事反复卜问多次的卜辞，也是连续卜问，但总是在每一段间刻写另一条卜辞，学者们称之为“相间卜辞”(图14)。





除了上述记事刻辞、兆序和卜辞外，中骨文中还有一种特殊刻辞。这种刻辞刻写的是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学者们也称之为甲子表(图15)。这种甲子表是当时的人们用来检核和推算干支纪日日期 的谱表，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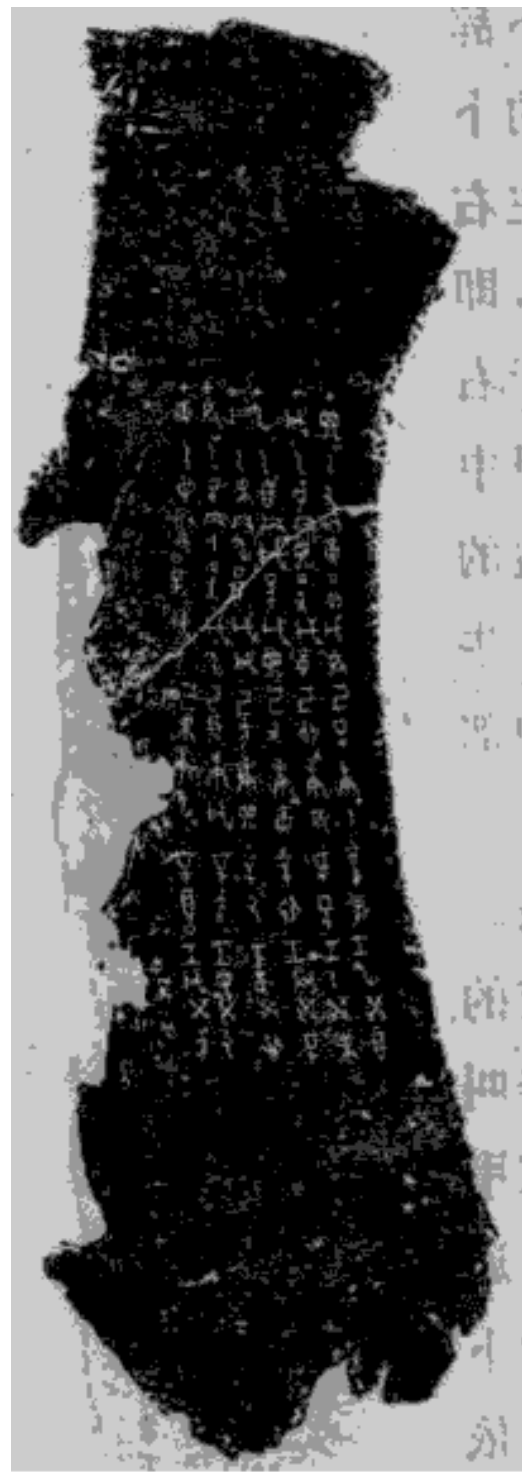


图 15 甲子表

此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文字的作品，学者们称之为习刻或习契(图16)。它们大多是一些单字的重复或甲子表以及某些卜辞的抄写，从中往往可以看出当时师徒相授的有趣迹象。

甲骨文一般是先用朱砂或黑墨写在甲骨上，然后再用刀刻出浅槽，但也有不少是直接刻成的；早期的甲骨文在刻好之后，还往往用朱砂或黑墨涂在字划里，学者称之为涂朱或涂墨。经过涂朱和涂墨的甲骨文显得格外好看，简直是一种雕刻精美的艺术品。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二 汉字的鼻祖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曾经经历过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从文字的成熟程度上看，还是从使用字数的数量和体系的完整来讲，甲骨文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汉字的萌芽，从现有资料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号是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图17)。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灰陶缸上的图形文字(图18)，已基本上具备了象形、会意文字的雏形。到了商代，文字的发展更为进步，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片上的刻划文字(图19)和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文字(图20)，已经是接近于甲骨文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了。





图 17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上 刻划符号摹本 下 带刻文的陶片



3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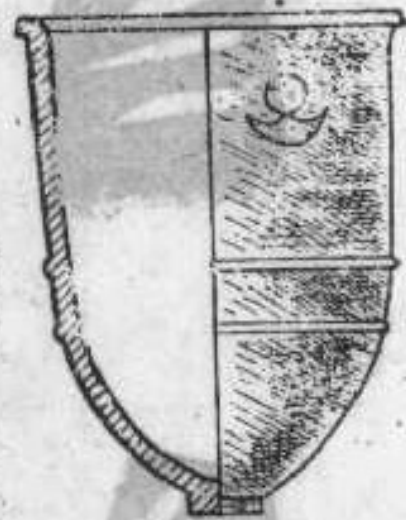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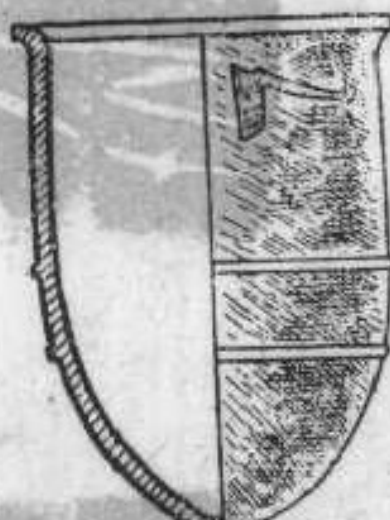




图 18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图形文字、灰陶缸
 1—4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图形文字拓本 5. 诸城前寨遗址
 出土图形文字拓本 6. 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灰陶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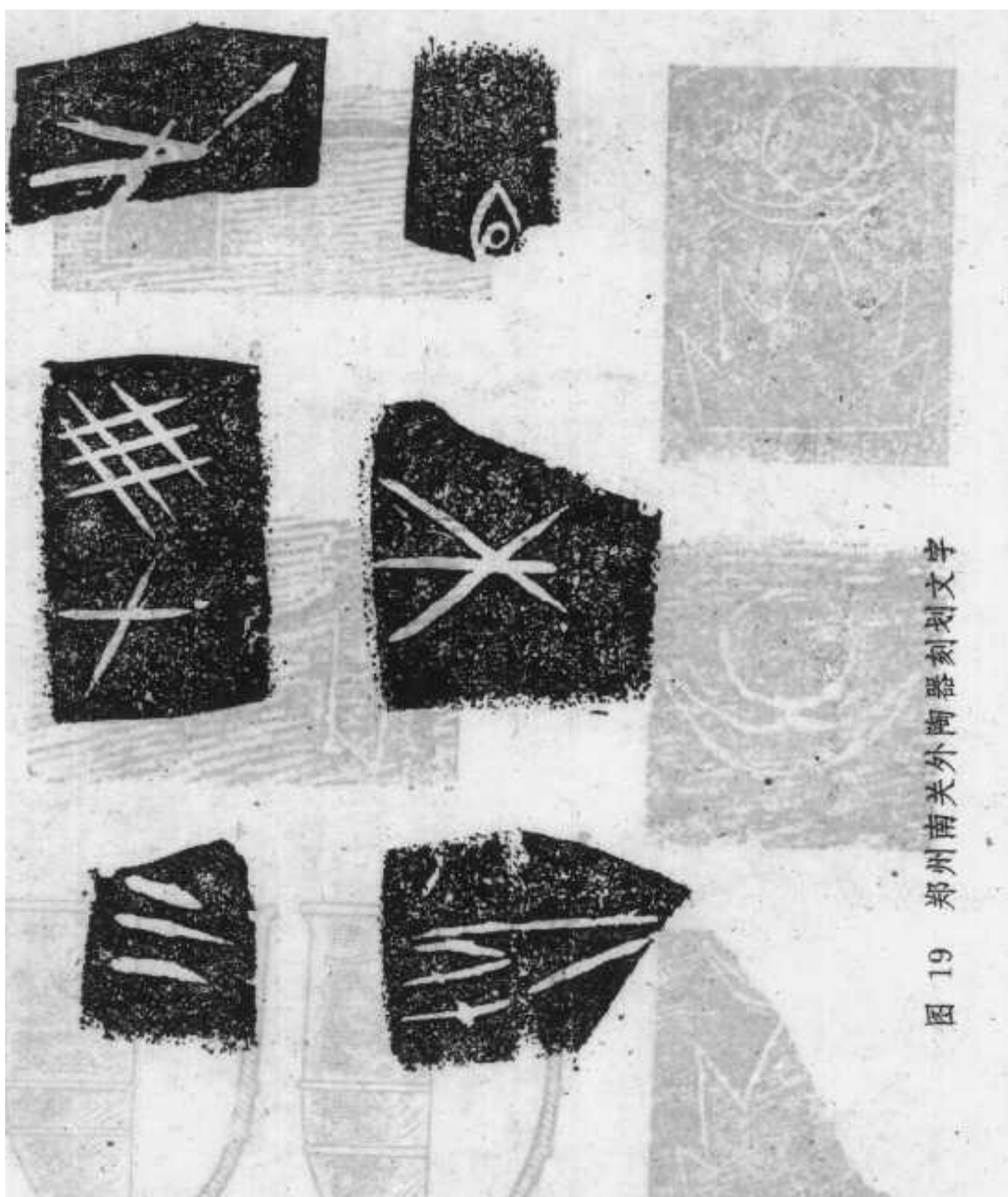


图 19 郑州南关外陶器刻划文字





图 20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刻划文字

上述陶器上的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既无完整的体系，也很难看出规律来。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材料而言，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

根据学者们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相重复的单字四千五百个左右。这些单字并非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因为甲骨文只是记录占卜活动有关内容的文字；虽然卜辞中涉及到的内容极为广泛，但还远远不能包罗当时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但就甲骨文的使用情况来讲，它已经是一种体系，比较完整并有比较严密规律的文字了。

首先，甲骨文的单字已经完全具备后来汉字的基本特点。。曾经有人把我国的汉字称为“方块字”，甲骨文就有这种方块字的非常显著的特点。甲骨文每个单字的点划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长短线条互相配合构成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形体呈现方块或长方块的单个文字。这种独特的文字形体特点影响着以后汉字发展的基本途径，一直持续到今天，汉字仍然是方块字形体的文字。

汉字的另一特点是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我国古代的文字学家曾经将汉字的结构规律总结为“六书”的理论。所谓“六书”，按照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作的界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六种文字构成和使用的类别。几乎所有的汉字的构成方式都可归纳到这六大类别之中。甲骨文的单字从构成和使用情况看，已经完全具备了这六大构成类别。其中象形、形声和假借已经是文字构成的主体。从现有的甲骨文单字看，早期文字的象形成份较多；晚期的，尤其是到了商代末年的帝乙、帝辛时代，象形字的比例渐少，形声字增多，许多字的形体结构都已基本定型。甲骨文与后来的西周金文、小篆、直至今天所使用的楷书形体，基本上是一脉相通、依次发展下来的。下面我们选取一些常见字的不同时代的形体(表一)，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彼此相承的关系。

表一 甲骨文、金文、小篆、今楷字形对照表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今楷
大	大	大	大
中	中	中	中
小	小	小	小
多	多	多	多
少	少	少	少
木	木	木	木

			少
			東
			西
			南
			北
			元
			兄
			先
			牧
			文
			此
			各
			可

由于甲骨文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形声字，一些相当于后来汉字偏旁部首的构字成份也开始形成并逐渐定形化。例如，下面的每一组甲骨文单字都包括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构字成份(表二)。

表二 甲骨文构字成份及其构成单字

构字成份	构成单字字例
人(人)	𠤎(企) 𠤎(千) 𠤎(元) 𠤎(先) 𠤎(及) 𠤎(此) 𠤎(北) 𠤎(任) 𠤎(保) 𠤎(休)
止(止)	𠤎(步) 𠤎(之) 𠤎(出) 𠤎(各) 𠤎(正)
阜(阜)	𠤎(陟) 𠤎(降)
木(木)	𠤎(析) 𠤎(杞) 𠤎(林) 𠤎(楚)
牛(牛)	𠤎(物) 𠤎(牢) 𠤎(牡) 𠤎(牝) 𠤎(牝) 𠤎(告)
宀(宀)	𠤎(宅) 𠤎(宰) 𠤎(宫) 𠤎(宗) 𠤎(室) 𠤎(家)
女(女)	𠤎(妇) 𠤎(妃) 𠤎(好) 𠤎(娶) 𠤎(娠)
酉(酉)	𠤎(奠) 𠤎(尊) 𠤎(酒)
水(水)	𠤎(洧) 𠤎(洹)
示(示)	𠤎(柢) 𠤎(福)
隹(隹)	𠤎(获) 𠤎(崔) 𠤎(观) 𠤎(淮) 𠤎(旧) 𠤎(迁)

甲骨文除了上述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现代汉字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一些经常出现的由两个单字结合构成的名词、习语、数

词或数量词组合，每每采取写在一起的合书形式，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单字。这种合书的形式，学者们称之为“合文”。例如，商王的先公和先王的庙号常常写作下面的合文：

田(上甲) 𠂔(报乙) 𠂔(报丙) 𠂔(报丁) 𠂔(报壬) 𠂔(报癸)
 𠂔(大乙) 𠂔(大丁) 𠂔(大甲) 𠂔(大庚) 𠂔(大戊) 𠂔(中丁)
 𠂔(祖乙) 𠂔(祖辛) 𠂔(祖庚) 𠂔(小辛) 𠂔(小乙) 𠂔(武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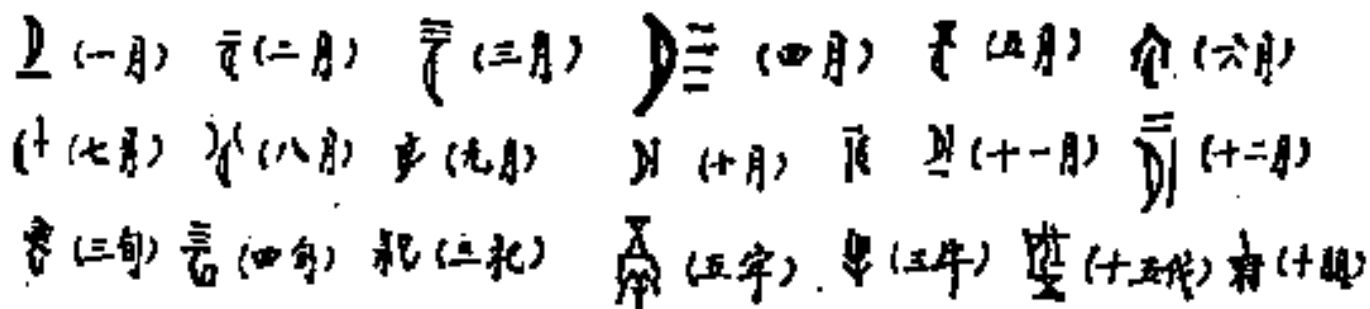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名称和习语写作下面的合文

𠂔(后母) 𠂔(王母) 𠂔(小母) 𠂔(多母) 𠂔(小示)
 𠂔(小帝) 𠂔(小王) 𠂔(小臣) 𠂔(小风) 𠂔(小雨)
 𠂔(受佑) 𠂔(引吉) 𠂔(上下屯) 𠂔(黄牛) 𠂔(人方)
 𠂔(之日) 𠂔(上下) 𠂔(下上) 𠂔(翌日) 𠂔(正月)

又如，十以上的数字常常写成以下合文形式：

𠂔(十三) 𠂔(十五) 𠂔(五十) 𠂔(六十) 𠂔(七十)
 𠂔(八十) 𠂔(九十) 𠂔(二百) 𠂔(三百) 𠂔(四百)
 𠂔(五百) 𠂔(六百) 𠂔(八百) 𠂔(九百) 𠂔(二千)
 𠂔(三千) 𠂔(四千) 𠂔(五千) 𠂔(六千) 𠂔(八千) 𠂔(三万)

另外还有一些数词和量词结合的词语，也往往采用合文的形式，例如：



上述这些合文字虽然是由两个或三个(例如“十五伐”)单字组成的,但看起来则完全象一个字。我国古代的汉字书写历史中,这种合文的书写形式曾经流行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甲骨到西周金文、直至秦汉简牍,几乎都有这种合文的书写形式。这也是古代汉字的一个特点。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甲骨文已是一种具有比较完整体系和有相当严密规律的文字,并且基本上具备了后来汉字的种种特点,称它为现代汉字的鼻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三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工作,如前所述,是从王懿荣开始的。王懿荣是当时长于金石学的著名学者,在清末的朝野士大夫中,尤其是在山东缙绅中声望甚高。凭借他的特殊地位、雄厚财力和较高识力,他在认识到甲骨文的性质和价值后,立即开始积极购求、收藏。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天,王懿荣最先从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处买到12片甲骨,每片二两银子。第二年(1900年)春天,范维卿又带来一百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得了许多银子。稍后,王懿荣又用二百两银子从范维卿手中买到800多片甲骨。此外,王懿荣还曾用一百多两银子从山东潍县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手中买到几百片甲骨。就这样王懿荣在短短的一年内,先后以重金高价购求,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1900年秋天,王懿荣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自尽。他所辛勤搜集的上千片甲骨被抛置一边,无人问津了。

王懿荣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后来都转归到刘鹗手中。

刘鹗(图21),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即精通数学,曾行医经商,都不得意,转而弃商从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在河南郑州附近决口,黄水泛滥成灾,清政府派吴大澄治理黄患,刘鹗以捐官投效吴大澄门下,以同知身分参预治理黄河事务。由于他精通数学,长于设计和计算,并能和民工一起操作,在治河中立功,由同知升知府入北京候补。到北京后,他体察当时的国家情势,认为扶衰振弊,应从兴造铁路着手,用实业振兴国家。于是他上书光绪皇帝,建议修筑津(天津)镇(江苏镇江)铁路,又请求与欧洲人合作开发山西铁矿,竟遭诬陷,被人指控为汉奸。刘鹗还能写小说,以讥讽清末官场丑态著名的《老残游记》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者。他参预治河时所投效的吴大澄就是当时名声极大的金石学家。刘鹗到北京作候补知府后,又和王懿荣交往很深。他在王懿荣处看到甲骨,深为惊奇,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王懿荣死难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懿荣的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父债,出卖家中所藏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甲骨买去。在这之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就已经开始搜集甲骨。后来他又从方药雨手中买到范维卿卖给他的300多片甲骨。同时,刘鹗还曾通过古董商人赵执斋买到甲骨3000多片。此外,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赴河南搜集到1,000多片。就这样,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总共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从他搜集到的甲骨中,精选拓印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问世。这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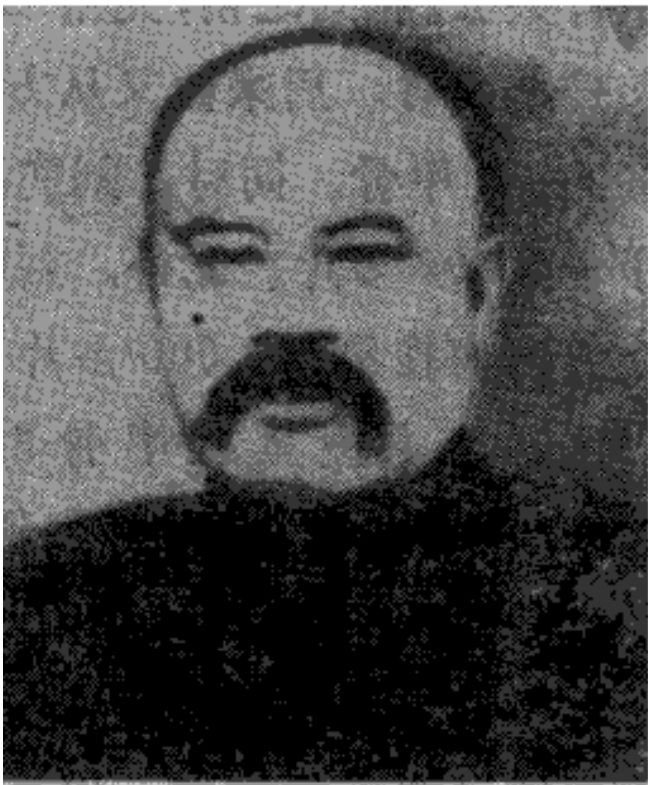


图 21 刘 鹗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古代文物时，因他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曾为救赈北京饥民向俄军购买他们所占的太仓中储藏的大米，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流放途中，刘鹗郁郁寡欢，悲愤而死。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到的甲骨随之四散，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在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此外，商承祚、束世澄、陈中凡、王澐、沈维钧、郇承铨、胡光玮和胡厚宣等几位学者，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总之，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以刘鹗搜集到的最多，然而在他死后，也分散得最零乱。

王懿荣、刘鹗之后，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方面，做工作最多的当推罗振玉(图22)。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新学兴起时，罗振玉曾趋奉时风，先后在上海创立“学农社”、“东文学社”，并编辑出版《农学报》和《教育世界》等杂志。但他更为擅长的却是考究古代文物和研求金石文字之学。凭借他对古代文物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兼做一些古董生意。就在王懿荣开始搜购甲骨文的那一年(1899年)，罗振玉也听到有关甲骨文的消息，但直到两年之后(1901年)，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他才在刘鹗家里看到这些拓本。刘鹗正是在他怂恿之下才编印了《铁云藏龟》一书。刘鹗印行此书时，罗振玉还根据他当时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理解，为该书撰写了序文。罗振玉自此便对甲骨文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移官北京后，利用经营古董生意的积蓄，开始积极搜购甲骨，通过古董商人陆续买到不少。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一大批甲骨，于是他便留意打听甲骨文的真实来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古董商人又由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才设法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与此同时，他又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由于罗振玉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而又深感这种珍贵的文物正在修遭破坏，日渐濒临毁灭，急需抢救，他便四处委托古董商人到河南尽力收购甲骨。仅在1910年一年内，他即从山西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手中买到甲骨10000片以上。但他仍然不满足，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等人亲自到小屯找当地农民挖掘，得到了更多的甲骨。



图 22 罗振玉

罗振玉搜集到这些甲骨后，从中选出比较精美并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约3000多片，拓制成拓本，依照刻辞的内容性质分为八类，编为《殷虚书契前编》一书，共二十卷，先在《国学丛刊》第一、二、三册上，以石印方式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逃亡日本，《国学丛刊》停刊，《殷虚书契前编》的刊行也暂时停顿。罗振玉逃往日本时，曾将他的全部甲骨收藏带走，途中几经波折，损坏约在一半以上。到日本后，罗振玉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重新编为八卷，于1912年用照相制版印出。1914年，罗振玉又在他所藏的甲骨文中选取最精美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拓墨精印成书。这就是甲骨著录书中印制最讲究的《殷虚书契菁华》。

1915年春天，罗振玉由日本回国，曾亲自跑到河南安阳小屯去考察殷墟的实际情况，写出《五十日梦痕录》一书。随后，他又在1916年将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甲骨以及旧藏的甲骨和殷墟其它的出土器物汇为一编，编印为《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此后，罗振玉又到日本将以前未拓印的甲骨再加挑选，选出比较精美的约1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后编》一书。后来，罗振玉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种种方法搜集到国内其他人收藏的甲骨文的拓本，从中精选出2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续编》一书，共分六卷。在解放前，除了中央研究院所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外，罗振玉所编的这几部甲骨文著录书，可说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罗振玉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甲骨出土地和包含年代的确定。由于罗振玉接触到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又具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识力，他在很早就对甲骨的内容、性质作出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并努力去探求它的真实出土地。

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安阳小屯一带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废都的着法。191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

安阳小屯一带是商王武乙到帝乙之间的都城故墟。这样，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而且第一次把甲骨文所包含的历史年代由以前笼统讲为“夏殷”时代缩短到了商代晚期武乙至帝乙三代商王统治的时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为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有关问题、尤其是把甲骨文包含的历史年代确定在从盘庚到帝辛(即殷纣王)的大约二百七十三年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诱发作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和包含年代，应当是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

罗振玉甲骨文收藏极富。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约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分别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前面已经讲过，和王懿荣约略同时接触并开始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他们最初搜集的甲骨大约不过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对甲骨文兴趣很大，陆续在北京、天津两地先后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他也选出一部分较好的，拓印成书，编为《簠室殷契徵文》一书印行。王襄所藏的甲骨解放后全部送归文化部文物局收藏。

早期搜集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还有清末大官僚端方。他仅在1904年一年中，就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1000片左右。瑞方所藏的甲骨后来也多散失，他的后人手中可能还保存有一些。此外，先后经过古董商人之手买到甲骨的，还有徐坊，他约购得1400片，后又卖给燕京大学，由容庚、瞿润缙编成《殷契卜辞》一书。又有黄心甫，也曾买得600片左右，但后来又卖掉，其中一部分的拓本由其子黄浚于1935年收录在《邨中片羽》一书中。另有方地山也买到300片左右，后归其子方曾寿；霍保禄曾买得463片，后来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其他学者如方药雨、沈曾植、王瓘、盛昱、黄仲慧、刘季纓等人，也都先后购得多少不等。而北伐战争中安阳小屯挖出的甲骨，大多都由开封和上海的古董商人转售到了各地学者手中。

以上这些人，在甲骨文资料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都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在甲骨文研究的发展史上，应当有其一定的地位。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四 甲骨文的流散国外

就在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文之后不久，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对甲骨开始注意并进行搜索。例如，1903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斂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库寿龄，在潍县合伙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许多甲骨，并把其中的400片转卖给了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同时又把另外的79片卖给了英美教会在潍县合办的广文学堂校长柏根，后又转归英美教会在济南所办的广智院(解放后改为自然博物馆)。这些甲骨曾先后由英国人吉卜生和加拿大人明义士分别摹写发表，后来又由方法斂编为《甲骨卜辞七集》于1938年出版。此后，方法斂和库寿龄还陆续搜购到许多甲骨文资料。1906年春天，方法斂从他所买到的甲骨中选取了119片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出土的珍贵甲骨文资料从此开始流散国外。这批最早流散国外的甲骨曾经由白瑞华部分著录在《甲骨卜辞相片》和《殷虚甲骨拓片》两书中，后来又由方法斂发表在他的《甲骨卜辞七集》一书中。

方法斂除了上述转卖活动之外，还曾在1908年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在山东代购甲骨，一次就有800多片。这部分甲骨文资料后来由方法斂摹写印成《金璋所藏甲骨卜辞》一书。1909年，方法斂又将他所购到的438片甲骨转卖给美国的卡内基博物院。1913年，方法斂还曾将他所买到的4片较大的甲骨转卖到了美国的菲尔德博物馆。与此同时，库寿龄也在1909年将他买到的760片甲骨转卖到苏格兰皇家博物院。1911年，库寿龄又将他和方法斂合买的485片甲骨转卖给了英国大英博物院。这些流散到英国和美国去的甲骨，后来曾由方法斂以摹本编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在中国出版。

此外，还有一位德国人威尔茨也在青岛买到711片甲骨，后来又转卖到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另一位德国人卫礼贤也曾从青岛买到72片甲骨，后来转卖到了瑞士的巴赛尔人种志博物馆和德国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据我国甲骨学家的统计，早期由欧美人转购流散到国外去的甲骨，至少也有5000片以上。

最早在中国开始购买甲骨的日本人是在天津《日日新闻》报担任主笔的西村博。其次是三井源右卫门，在罗振玉派人到安阳搜集甲骨之前，他就派专人到安阳收购甲骨，他先后共搜购甲骨约在30000片以上。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交往很深的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救堂早在1905年也买到了100片甲骨，当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林泰辅见到后即买了10片。此后，林泰辅又陆续买到600多片甲骨。至1917年，林泰辅把他所收藏的甲骨中比较重要的连同榑古斋所藏甲骨一起拓印成书，编为《龟甲兽骨文字》一书，于1921年以石印方式出版。这是日本人所编著的第一本甲骨文著录书。为了购买甲骨，林泰辅并于1918年亲自由日本到安阳小屯进行调查，得到一些甲骨，回日本后曾将调查所得进行研究，写成《殷虚遗物研究》。此外，1922年日本人大山柏也曾亲自到安阳作过调查。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日本先后购到甲骨的学术单位约有三十多个，私人收藏家也在三十个以上，如以这些公私收藏情况为准，流散到日本去的甲骨总数至少在12000片以上。

外国人中搜集到甲骨数量最大的要数加拿大人明义士。1914年春天，明义士在河南安阳作长老会的牧师，听说小屯一带出土

带有文字的甲骨，就开始经常骑着一匹老弱的白马在小屯附近的洹水南岸进行考察。当他了解到这一带确实有带字甲骨出土的情况后，就积极向当地农民购买。最初，他曾买过一些假的大甲骨，是用新的牛骨仿刻的，存放不久就腐朽不堪。后来他转而购买小片，悉心学习，渐渐可以辨别真伪。到了1917年，他已买得甲骨50000片左右，对于甲骨文也有了一定研究。于是，他从买到的这些甲骨中选出2369片，编成《殷虚卜辞》一书，在上海出版。此后，明义士又分别在1923年、1924年、1925年和1926年先后从小屯农民处买到几批甲骨，并从这些甲骨中选拓了1000多片，编成《殷虚文字后编》一稿，后未出版。1937年，明义士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仓皇回国，后又转到美国军部任职。临行前，明义士曾将他所收藏的甲骨选出一部分寄存在加拿大使馆，解放后转归南京博物院。另一部分存在齐鲁大学，解放后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现存山东博物馆。明义士另有一部分甲骨已流散到加拿大，现存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约有3000多片，其中不少是极精美的甲骨藏品。流散到加拿大的甲骨，除了上述明义士所藏之外，还有一批怀履光旧藏的甲骨及一些碎片，均藏安大略博物馆。总之，流散到加拿大的甲骨总数仅次于流散到日本的，约在7000片以上。

除了上述几批流散到国外去的甲骨之外，先后以各种方式流散到法国、苏联、比利时、瑞典、瑞士、新加坡、南朝鲜等国家的甲骨文资料也有相当数量。

根据我国甲骨学的专家最近所做的最新统计，目前收藏有甲骨文资料的国家共有十二个，流散到这些国家的甲骨文资料总数为26，700片。这些国家收藏的数字大致如下：

日本：12，443片
加拿大：7，802片
英国：3，355片
美国：1，882片
西德：715片
苏联：199片
瑞典：100片
瑞士：99片
法国：64片
新加坡：28片
比利时：7片
南朝鲜：6片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五 从孙诒让到王国维

从1899年甲骨文初次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甲骨学者一般称之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短短三十年年中，中外学者搜集、收藏的甲骨资料已达十万片左右。这一时期拓印成书的甲骨文著录专书有十二种，共公布甲骨文资料9919片。这些书的出版年代与收录甲骨文资料片数大略如下：

- 一、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1058片
- 二、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1912年2229片
- 三、罗振玉：《殷虚书契著华》1914年68片
- 四、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40片
- 五、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1104片
- 六、罗振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4片
- 七、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年2369片
- 八、王国维(原题姬佛陀)：《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655片
- 九、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1023片
- 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1925年1125片
- 十一、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1925年240片
- 十二、罗福成：《传古别录》第二集1928年4片

虽然以上发表的材料还只占当时传世甲骨的十分之一。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材料已大体上公布出来。随着上述甲骨文资料的流传和公布，研究甲骨文的风气逐渐在学者中慢慢形成，终于产生出一门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崭新学科——甲骨学。

最早对甲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当推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图23)。孙诒让，字仲容，晚年又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光绪末年，孙诒让旅居北京时，已是当时声闻遐迩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见重于当世，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推许。此外，他对古文字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几十年之久了。1904年，他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铁云藏龟》，感到非常惊奇，用他自己的话讲：“自己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他凭借对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素养，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把《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材料大体上理出一个头绪。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被学术界誉为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作用的《契文举例》。



图 23 孙诒让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共分十章，各章的篇名为：

- 月旦第一
- 贞卜第二
- 卜事第三
- 鬼神第四
- 卜人第五
- 官氏第六
- 方国第七
- 典礼第八
- 文字第九
- 杂例第十

孙诒让的这部书虽然只是一部对甲骨文的文字进行极其初步考释的著作，但其中的不少见解却是很有见地的，有些看法甚至至今也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如果考虑到孙诒让是在甲骨文刚刚公布一年的时候，撰写这部书，所看到的材料还极有限，而刘鹗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在当时还仅仅只能称为龟板等的情况，孙诒让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窥破了它们的奥秘，看出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并能按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孙诒让当时所运用的那种以《说文解字》为根据，以铜器铭文作比较证据的文字考释方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的这一方法，对于其后的研究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所遵循。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王国维(图24)，是孙诒让之后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又一位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死于1927年。王国维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1898年，正当罗振玉在上海兴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的时候，二十一岁的王国维由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他在汪康年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社担任抄写和校对工作。1898年夏季，《时务报》社关闭，王国维便转入罗振玉的东文学社作庶务，同时开始了日文和自然科学的学习。由于王国维聪明而又好学，不久便被罗振玉看重。1901年，罗振玉为了培养王国维，曾经慷慨解囊资助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年轻人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后来，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时，又请王国维回国担任该杂志的主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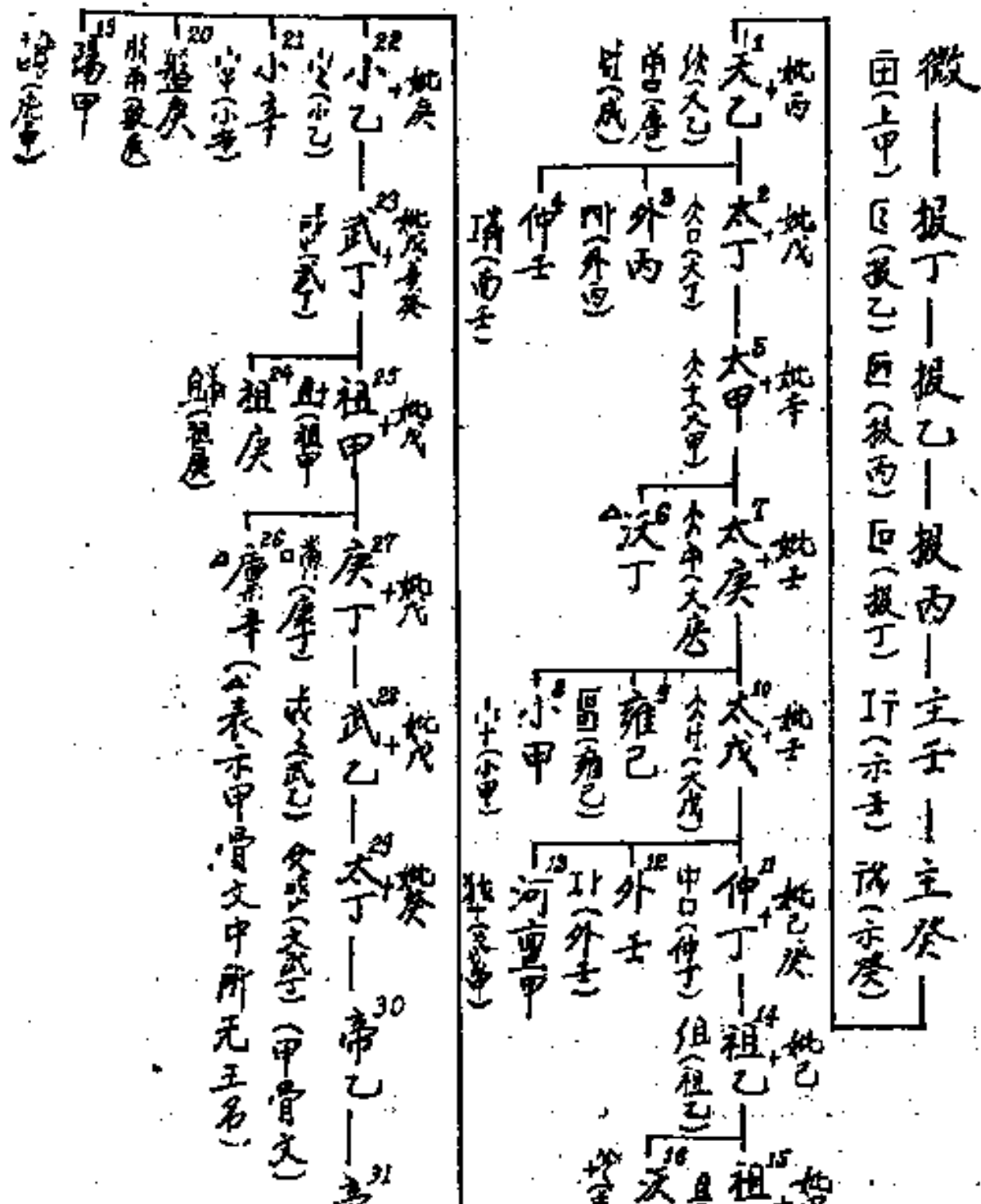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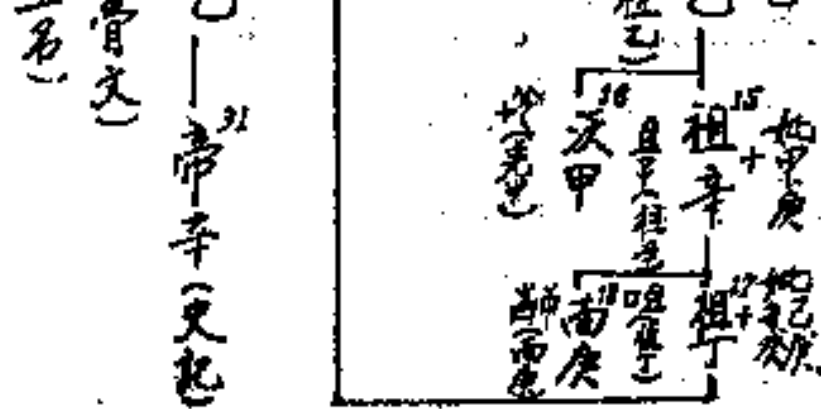
图 24 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而又非常刻苦努力的学者。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先后撰写过《叔本华和尼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论著，显露出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学术见解。后来又转攻戏曲、音律，也撰写过名重一时的《戏曲考源》和《唐宋大曲考》等论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研究宋元戏曲的同时，开始帮助罗振玉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从此他和甲骨文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他在发表《宋元戏曲史》的同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并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氏资料拓印为《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就在编印、考释《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同时，王国维撰写并刊行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殷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篇论文和它的续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王国维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

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除在个别地方与卜辞记载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资料应当改为“王亥”。又如，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王国维根据甲骨文资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据甲骨文资料，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类似的还有《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均被王国维一一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甲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问题，在王国维之后，又有吴其昌、董作宾和丁山等几位学者，继续研究和补充，已经基本上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他们根据甲骨文资料整理、订正的商代世系表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大致可以列表对照如下：

表三 商代世系对照表





由于王国维在学术上卓有建树，1925年，他经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授。新的学术环境，使王国维有更好的条件从事甲骨文研究。他先后撰写出《古史新证》和《殷礼徵文》等论著，将甲骨文研究由孙诒让以来的单纯文字考释推进到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阶段。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贡献，郭沫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指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正当王国维准备对甲骨文进一步作更深入的综合研究的时候，由于他深感时代的前进与自己政治思想的保守日不相容，内心异常痛苦，最后只好怀着对旧日封建时代浓厚的依恋之情，投入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尽了。一代学术巨匠就这样匆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王国维约略同时或稍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振玉、丁山等人外，还有武龙章、王襄、商承祚、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玮、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这些人虽然远远赶不上罗振玉和王国维，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都有建树。

此外，这个时期陆续有些外国学者也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金璋、库寿龄、银格兰姆，法国人沙畹；德国人穆勒、勃汉第和日本人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滨纯太郎、石滨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岛佑马、丹羽正义、饭岛忠夫和无关等人。

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甲骨文的研究逐渐展开，相继取得重要成就，终于形成古文字学的一个崭新学科——甲骨学。这就为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文全面研究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六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的全面展开

随着甲骨文的广泛流传和研究者渐多，甲骨文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是也就在这时，甲骨文本身却在遭受着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厄运。一方面，小屯的农民每年都在为了卖钱而到处乱挖私掘，大批甲骨失去了原有的地层关系，与甲骨共存的其他文化遗物全遭毁弃；另一方面，甲骨文又大量流散国外，尤其是明义士几乎将1923年至1926年间出土的成千上万片比较完整的甲骨全部囊括而去。这在学术上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了抢救甲骨文和殷墟文化遗存，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成立，便立即开始了利用现代考古技术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928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派董作宾(图25)前往安阳小屯村调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况。董作宾到安阳后，首先同安阳的彰德十一中校长张尚德、城内古董店尊古斋店主王嘉瑞和城郊小屯附近花园庄私塾老师阎金声等人商谈调查事宜，委托他们代为收购甲骨和访查情况。然后，他又亲自到小屯村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殷墟的甲骨文尚未挖完，还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董作宾的调查结论是：殷墟确有从速进行科学发掘的必要。从此，开始了对于甲骨文研究和现代考古学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殷墟发掘工作。



图 25 董作宾

从1928年10月第一次试掘开始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在这短短十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总共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三次发掘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十二次均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仅在YH127坑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17,000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龟甲约有300多版，创造了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奇迹。总计十五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近30,000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

在殷墟发掘的间隙中，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2月进行过两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3,650片，由关百益选拓800片编为《殷虚文字存真》一书，后又由孙海波选拓出930片，编为《甲骨文录》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室曾经在安阳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后，直到解放前夕，除了陆续发生一些私人盗掘外，殷墟发掘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殷墟发掘工作在开始阶段的主要目的，仍旧在于发现甲骨。后来随着发掘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发掘经验的丰富，虽然也逐步注意到铜器、陶器、骨器、蚌器、象牙器和玉、石器等其他文化遗物以及建筑基址和墓葬等，但投入注意最多的仍然是甲骨文；在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中，有一些人由于从事殷墟发掘而走入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并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后来即成为甲骨文断代和天文年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而在殷墟发掘后期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些则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甲骨学学者。

殷墟发掘对于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甲骨文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在促成甲骨文研究这一根本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董作宾所创立的分期断代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学者发现后，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被考证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殷纣王）灭亡共约273年，经历过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能否根据甲骨文内在的规律将它们分出不同的时期，已经成为甲骨文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早在董作宾之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试图从一些角度着手进行探讨。例如，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于祖先的称呼有所不同，便断定这是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据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辈为阳甲、盘庚、小辛，判定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称谓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他还根据武丁的三个儿子分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断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时代的甲骨文。他的这种依据商王世系和

称谓判定甲骨文时代的方法，曾对董作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终于成为董作宾关于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标准。

董作宾对甲骨文开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主要是受到所谓“大龟四版”启示的结果。所谓“大龟四版”，是指1929年12月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四个比较完整的刻满甲骨文的龟腹甲，当时的发掘报告称之为“大龟四版”。董作宾是第三次殷墟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他在对这四个龟腹甲的甲骨文进行考释时，发现其中的一个龟腹甲上，每一条卜辞中在干支之后和“卜”字之前都有一个相当于人名的字，他认为这些相当于人名的字都是当时参加占卜活动问卜的史官名字，他把这些史官称为“贞人”。在这个龟腹甲上总共有六个这种“贞人”的名字。他们既然同出现在一个龟腹甲上，当然应当是同时在商王朝任职的史官，而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当和这个龟腹甲上的甲骨文属于同一个时期。这就是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贞人断代学说。

1933年，董作宾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期断代学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系统提出根据十项标准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图26)的分期断代理论。他的十项标准是：

- 一世系
- 二称谓
- 三贞人
- 四坑位
- 五方国
- 六人物
- 七事类
- 八文法
- 九字形
- 十书体

他所划分的五个时期为：

-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位商王)
-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两位商王)
-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两位商王)
- 第四期：武乙、文丁(两代两位商王)
- 第五期：帝乙、帝辛(两代两位商王)





图26 a. 一期甲骨文

c. 三期甲骨文

d. 四期甲骨文

e. 五期甲骨文

董作宾的这一分期断代方法虽然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但基本上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基础。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以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为经纬的甲骨文分期理论的创立，使甲骨文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视为混沌一片的十多万片甲骨文资料，从此鸿蒙凿破，成为可以划归前后五个不同时期的有条理的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据以探讨甲骨文不同时期文例、字体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据以探讨不同时期的史实、礼制的发展变化，把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就在董作宾从事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同时，大革命后东渡日本旅居的郭沫若(图27)，也开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断代问题。他在编纂《卜辞通纂》一书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与董作宾大体一致的一些看法。他在收到董作宾寄赠给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时，感到董作宾的说法和他的某些见解是相似的，他的一些看法也可在个别地方为董作宾的说法作补充。两个相距数千里之遥的学者能够产生大体一致的看法，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实际上并不在这一方面，而是在于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

郭沫若和甲骨文发生关系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于政治原因东渡日本以后；自此，他便和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晚年仍然兴趣不衰。1929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资料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31年，郭沫若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专门

从事甲骨文文字考释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33年，他又出版了《古代铭刻汇考》一书，其中有九篇是专门讨论甲骨文的有关问题的，因此他将这组文章定名为《殷契余论》。同年，他还根据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籍和国内外私家收藏的甲骨文，进行精心挑选、分类编排，并作详尽考释，编为《卜辞通纂》一书，为甲骨文的学习研究者提供了一本极方便的入门著作。1934年，郭沫若又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篇》一书，其中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文章有三篇。1937年，郭沫若又从刘体智所藏甲骨资料中精选拓印，编成《殷契粹编》一书；同时对于书中收录的资料一一进行翔实考释。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八年间，编写了六七种甲骨文论著，考证出不少甲骨文新字，提出了系列有关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新见解，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学术界把他(号鼎堂)和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并称为为甲骨文研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所谓“四堂”。



图 27 郭 沫 若

“四堂”之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用力较勤、收获较大的学者，要数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的胡厚宣了。胡厚宣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叶曾亲身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并亲手整理过殷墟发掘所得的绝大多数甲骨文。他不仅为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科学发掘所获甲骨的总集《殷虚文字甲编》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作过释文，而且参加了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所发现的YH127坑出土的17,000多片甲骨的实物整理工作，这些甲骨后来曾是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得甲骨文总集《殷虚文字乙编》的主要内容。胡厚宣在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能充分利用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相传世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对殷代社会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此外，他在甲骨文材料的访求、搜集和流传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因此，他在甲骨学的许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例如，他曾先后解决了商代卜龟的来源、记事文字

的类别与意义、商代的农业生产与气象问题、商代的宗法与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状况等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有关“四方风名”的考证与“一甲十癸”说法的考辨更为学者专家称道。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截至解放前夕，胡厚宣共发表、印行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的论著至少有五十四种之多，大多十四种之多，大多都收集在后来获国家科学著作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文集中。日本的甲骨学者曾经称道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是甲骨学“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

从殷墟发掘开始到解放前夕，甲骨学度过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历程，总算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首先是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中，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已近300人，出版的甲骨文著作已增加到70多种，著录和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已有四万多片，共发表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800多种。其次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方法的日渐科学化。这一时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现。除了前述董作宾、郭沫若和胡厚宣等人的专门著作外，许多学者都出版、发表了重要论著。例如，罗振玉、王国维的弟子商承祚，编印了《殷虚文字类编》一书，开创了将甲骨文按《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辑录成说集为专书这一先例；后来，他又编印、考释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又如，辽宁海城人于省吾于治理经学、小学之余，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形义，先后出版了《双剑（言多）殷契骈枝》初集、续集、三集，其中不少考证很有价值，对于甲骨文的形义源流解说精当，见解颇新。‘再如，浙江秀水人唐兰，除了编印、考释《天壤阁甲骨文存》外，还先后撰写了《殷虚文字记》、《殷虚文字研究》多种，并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对甲骨文的识读、考释方法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另外，河南潢川人孙海波辑录各家成说，将已经释读和未释读的全部甲骨文单字摹写编次，编印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加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则除了编有《甲骨学文字编》外，还编写了《甲骨学商史编》一书。此外，吴其昌著有《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丁山撰写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张政烺作《爽字解》，陈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炜作《甲骨文例》，周传儒写《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陈直著《殷契剩义》，徐仲舒著《耒耜考》，余永梁著《殷虚文字考》……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新颖，影响广泛，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此相类似的论著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甲骨学由于殷墟科学发掘的促进，达一时期已经取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甲骨学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甲骨学真正获得新生，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七 新中国建立后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殷墟这一埋藏甲骨文的地下宝库。1950年春天，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还处于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国家就拨出专门费用，恢复了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随后，国家文物部门又将殷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殷墟设立了专门从事殷墟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考古工作站；六十年代，又在该站建立起专门陈列展出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其他文物的殷墟陈列室，供中外学者和广大群众参观学习和研究之用。在这一基础上，停顿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其规模和成就都是旧中国的殷墟发掘工作所远远不能比拟的。随着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建国以后在甲骨文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例如，1950年春季，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殷墟发掘中，在小屯村西边的四盘磨村西地SP4探坑离地三米的SP11小探坑内，发现了一块横刻着三行包括有由数字组成的文字的卜骨(图28)。这些有数字组成的文字被学者称为甲骨文中的异形文字。四盘磨西地甲骨文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这一发现使得人们对殷墟甲骨文出土范围的认识较前更为开阔，学者们发现以前那种认为只有小屯村及其附近一带才出土甲骨文的看法显然是不当的。这一新的认识在以后的殷墟发掘过程中曾经再次得到证实。例如，1958年至1959年的殷墟发掘工作中，在小屯村东北洹河对岸的大司空村又发现过两块带字的卜骨。其中一片是在灰坑114中发现的，是一块整治粗糙、白角未经切除的卜骨，其正面刻有“辛贞在衣”四个字(图29)；另一片刻有“文贞”二字。这两片卜骨经专家研究，认为都是习刻作品。虽然如此，“辛贞在衣”一片也极富有学术价值。“衣”依甲骨文通例应为地名，过去学者们都认为衣地在沁阳附近，而这片卜骨发现于殷墟范围内，这就使有的学者据以提出“衣”地可能就在安阳附近而与当时的王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新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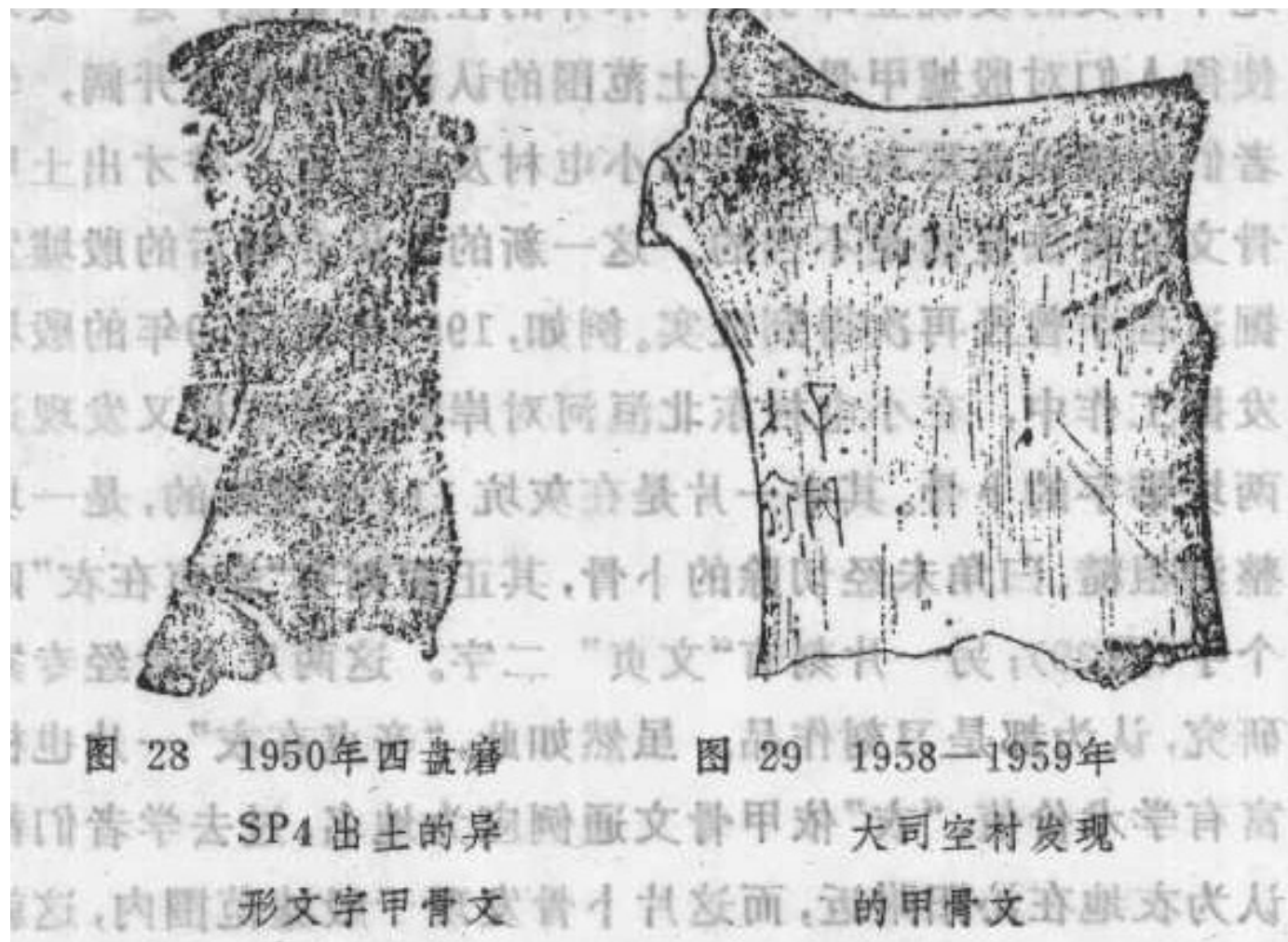


图 28 1950年四盘磨

图 29 1958—1959年

此外，小屯村及其周围也还继续有甲骨文出土。例如，1955年秋季，曾在小屯村的灰坑H1中，出土有一块带字牛胛骨，上面刻有“丁卯。癸亥卜，王其入商，*乙丑王弗每，弘吉”等字(图30)。又如，1971年12月，小屯西地1号探沟内发现21块完整的卜骨，其中有10块刻有文字(图31)。关于这批甲骨文的时代问题，学者间曾经有过较大的争论，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建国以后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973年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所发现的一批甲骨。这批甲骨共7,150片，其中有字甲骨有4,829片。这批甲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所刻卜辞的内容也极丰富，几乎广泛涉及到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的又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小屯南地发现的这批甲骨文资料，从时代上讲，除一小部分为第一期和第五期的卜辞外，绝大多数为第三、四期的卜辞，其中尤以第四期武乙时代卜辞为多，康丁、文丁时期的卜辞也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这批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且大多都与陶器有共存关系，这就为甲骨文分期断代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积极制订、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历史文物政策，大量私人手中收藏的甲骨多被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单位陆续征集、收购起来，予以妥善保护，以便为研究人员集中提供甲骨文资料。例如早期刘鹗、罗振玉和哈同夫人所藏的甲骨文，几经辗转，最后都收归浙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旅大市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与此同时，许多文物收藏家和甲骨学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文藏品以各种方式捐献给国家主管单位。例如上海的大收藏家刘体智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8,000多片甲骨文藏品捐给了文化部，后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又如最早的甲骨文收藏家兼甲骨学者王襄，也将自己五十多年中搜集到的甲骨文藏品献给了天津市文化局，后归天津市博物馆收藏。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的甲骨文藏品除了极少数尚在私人手中外，绝大多数都已收归到九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这不仅使过去零散的珍贵文物相对集中起来得到了妥善保管，同时也为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带来了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首先在甲骨文的流传工作方面，胡厚宣一面努力以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作一番新的研究，一面积极从事甲骨文资料的调查、搜集和著录公布工作。他从1951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上、下)、《战后京津所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上、下)等四部甲骨文著录书。在这四部甲骨文著录书中，除了公布了他自己从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按集到的重要甲骨文资料外，还将当时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国内公私收藏的重要甲骨文藏品尽量收录，总共公布了甲骨文藏品13814片，约占段墟历年出土的全部甲骨文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是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在著录甲骨文的体例方面，他也突破了以往已出版的各种著录书的局限，采取了分期分类的编排方法。他把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三、四两期合为一期，从而把全部甲骨文材料分成四期，然后在每期甲骨材料中再依材料的内容性质分为若干门类。甲骨材料经他这样编排后，不仅眉目清晰，而且科学性极强。他所开创的这一著录甲骨文资料的新体例，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外不少学者在

编纂甲骨文著录书时，也纷纷仿效他的体例。胡厚宣上述四部甲骨著录书的编印出版，是他长期努力访求、搜集、整理甲骨文的结果，其中蕴含着 he 献身于甲骨文研究事业的大量心血。这些甲骨文著录书的印行，不仅使长期沉埋于公私收藏者手中的零散甲骨文资料得以集中刊布，而且使这些凌乱的甲骨文资料得到初步的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胡厚宣之外，还有一些甲骨学者也先后编印了一些甲骨文著录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亚农的《殷契摭佚续编》、郭若愚的《殷契拾掇》(一、二编)、陈邦怀的《甲骨文零拾》等。此外，解放前已经编讫尚未印完的《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也在五十年代初期分别在我国台湾和北京出版。

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先后出版过许多种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董作宾和严一萍曾于1956年编印了《殷虚文字外编》，饶宗颐于1956年编印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和《巴黎所见甲骨录》，并于1959年编印了《海外甲骨录遗》，又于1970年编辑出版了《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外也陆续编印了一些重要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日本著名甲骨学者贝塚茂树曾在五十年代末编辑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书，松丸道雄曾于1979年出版过《谢氏瓠庐殷墟遗文》一书。加拿大学者许进雄在七十年代先后编辑出版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两书。美国学者周鸿翔也于1976年编印了《美国所藏甲骨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由郭沫若任主编、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已经陆续编讫出版，使学术界有了一部可资利用的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总集。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全部甲骨文资料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正式出版。这是继《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这部书不仅材料丰富齐全，在编排上还完全按照坑位关系系统编排，并且在每片下面都明确注明出土坑位和地层关系。这就为学者们结合考古资料更科学地研究甲骨学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的另一项成就，是甲骨文的缀合与辨伪工作。甲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由于骨质松脆，甲骨背面经过钻、凿和烧灼，出土时极易碎裂，再加上出土后又屡经转运、转卖和各种人为的损坏，往往一片完整的甲骨几经断裂最后成为碎片，并常常分属几个藏家，弄得身首异处、面目皆非。这种支离破碎的甲骨文碎片，如果不经复原，就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很早就有学者注意把原来同属一片而散在各处的甲骨文粹片拼接在一起，使之复原为一片。这种工作就是甲骨文的缀合工作，它是甲骨文研究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最早注意到这一工作的是王国维，他在1917年曾将《戡寿堂所藏甲骨文字》中的一片与《殷虚文字后编》中的一片加以缀合(图32)，从而发现了自上甲至示癸的商代先公世系次序与《史记·殷本纪》所记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1933年，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又再补缀上一片，使这片甲骨更为完整(图33)。1933年，郭沫若在编纂《卜辞通纂》的过程中，曾经缀合过30多片甲骨，随后又在《古代铭刻汇考》一书中补充了经他缀合的甲骨断片的八个例子。董作宾后来在编写《殷历谱》一书的过程中，又缀合过许多甲骨碎片。这些缀合工作曾经给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图 32 王国维缀合的甲骨文

图 33 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基础上作的新缀合

建国以后，致力于甲骨文缀合工作的学者也有很多。例如，1950年，曾毅公曾将他多年的缀合工作成果汇集成书，编印为《甲骨缀合编》，共收录已缀合甲骨396片，取材于32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其中不少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比起他在解放前出版的《甲骨（上双下双）存》一书，规模要大得多。《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两书所收录的甲骨文资料，虽然都是解放前殷墟发掘所得的科学发掘品，但它们在出土之后屡经周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搬运，其中多数原来比较完整的甲骨都已破碎成为失掉原有联系的碎片，这种状况曾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使这些失去联系的甲骨碎片重新会合，郭若愚曾经精心拼接，缀合出324片。随后，曾毅公、李学勤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拼合，缀合出郭若愚尚未缀合的甲骨158片，并于1955年汇合三家缀合结果，印为《殷墟文字缀合》一书，共收录缀合甲骨482片。另一位对甲骨文缀合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的是台湾学者张秉权。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根据实物对《殷虚文字乙编》中所收录的YH127坑出土的甲骨碎片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出较完整和较大的甲骨300多片，先后编为《殷虚文字乙编》上辑、中辑和下辑共6册，分别于1957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67年和1972年在台湾印刷出版。还有一位台湾学者屈万里，对《殷虚文字甲编》进行了拼接缀合工作。他除了纠正了《殷虚文字缀合》误拼的一些错误外，又新缀合了106片甲骨。这些成果收录在他在1961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一书中。此外，原在台湾后又旅居美国的严一萍，也于1975年编印了《甲骨缀合新编》一书，全书共十册，总共收录已缀合的甲骨文资料700多片。他还专门将以往误拼错缀的甲骨加以订正，印为《甲骨缀合订伪》一册。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缀合工作在最近一些年来，又有新的异军突起，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文试验工作的展开。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到现代生活，1973年国外有人开始尝试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甲骨文进行缀合。1974年，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索。根据童恩正、张升楷、陈景春等人的报告，他们选用了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在大连坑出土的263片卜甲和殷墟第四次发掘中E16坑中出土的154片甲骨，编出程序，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缀合试验，结果成功率达到40%左右。虽然从成功率看还不算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开创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甲骨文研究的先例，是甲骨文研究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可喜的先声。

甲骨文的辨伪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甲骨文发现后，随着它的广泛流传和人们的积极搜求，其价值日渐昂贵。商人们为了牟

利，便请人刻制假的甲骨文冒充真品，经过转售而广泛流传。甲骨文的伪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甲骨本身和上面的文字全是假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早期收买的甲骨文，不少都是用新鲜牛骨炮制后刻上文字的假甲骨文。有的则是用殷墟出土的无字骨刻上假字，或用真的甲骨文作底本进行仿刻伪造，或在甲骨上真的字数较少的甲骨文旁边再加刻一些假的甲骨文。例如解放前安阳城内即有一位专为古董商刻制假甲骨文的兰宝光，他所刻制的假甲骨文就欺骗过不少学者。这些伪刻的甲骨文有时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编印的甲骨文著录书中。如果对甲骨文不加鉴别地运用，就会出现以假当真或以真为假的情况，这都会给甲骨文研究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干扰和损失。

早在解放以前，就有不少学者做过一些辨伪工作。例如，郭沫若、胡光玮、董作宾、陈梦家和容庚等人都曾对《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伪刻部分有所辨正。解放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这部书中的有关材料继续进行辨伪工作。

学者间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对其中的第1056片所谓“儿氏家谱”这片大骨(图34)的鉴定意见。五十年代中期，陈梦家、李学勤曾经认为“儿氏家谱”不是伪品，并断定它是武丁时代的家系刻辞。于省吾认为它并非伪品，并据以论证了商代王室和其他贵族的谱牒世系的上限，应在夏末商初之际。最近，胡厚宣论证了这片甲骨系伪刻。

对于《甲骨卜辞七集》一书中所收录的孙文澜旧藏甲骨，学者们意见也不一致。1956年陈梦家认为这部分甲骨全是伪刻。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分甲骨非但不伪，而且内容较精。

此外，过去不少学者在谈到我国古代蚕桑史时，大多都以刻在甲骨上的所谓蚕桑图形的甲骨文作为商代已有蚕桑生产的例证。这种刻有所谓蚕桑图的甲骨文共有2片，经考古学专家鉴定，这2片都是伪刻。

上述这些辨伪工作，对于有效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甲骨文文字考释方面，建国以后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新成就。首先是一些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例如，杨树达曾于1954年出版过《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和《耐林廐甲文说L辞求义》两书。朱芳圃于1966年出版了《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收录了他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不少成果。于省吾于1980年将其历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甲骨文的考释成果汇为一编，编印为《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还有不少学者为了深入探讨卜辞内容，更好地发挥甲骨文资料的珍贵史料价值，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方面进行积极的研究，先后发表过一系列论著。例如，胡厚宣发表过《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释余一人》、《殷代的刖刑》和《说我王》等，张政烺发表过《释甲骨文中俄、隶、蕴三字》、《卜辞袁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和《释它示一论卜辞中没有蚕神》等论文，杨向奎也发表过《释“不玄冥”》。另外，裘锡圭、林（水云）、齐文心、王宇信和范毓周等人也部相继发表过一些有关甲骨文文字考释的文章。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于甲骨文的文字考释都有新的贡献，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已超过了前人已有的成就。

解放以后，还出现了一些试图对甲骨文研究做出总结或进行综述性质的著作。新中国建国伊始，胡厚宣就先后编印了《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和《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两书，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甲骨文发现和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1956年，陈梦家用了两年多时间撰写的《殷墟卜辞综述》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对1956年以前六十多年来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比较全面系统总结的巨著。在这部书中，陈梦家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文献材料和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心得，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经过、研究方法和各个分支领域的主要内容与重要问题，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叙述和讨论。全书共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上、下)、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庙号(上、下)、亲属、百官、农业及其它、宗教、身分、总结及附录等二十章，共约75万字。这部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至今仍为学术界普遍重视。

继陈梦家之后，从事甲骨文综述工作的，还有严一萍。他于1978年在台湾编印了《甲骨学》一书，共分九章，各章篇名为：

第一章认识甲骨与殷商的疆域

第二章甲骨的出土传拓与著录

第三章辨伪与缀合

第四章钻凿与占卜

第五章释字与识字

第六章通句读与识文例

第七章断代

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

第九章甲骨学前途之展望

全书长达1,400多页，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八十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综述之作，对于学习和研究甲骨文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国外也有于些学者从事这一工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1978年编写了《商史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一书。这是由外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对甲骨文发现与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和介绍的

英文专著，在学术界受到一致好评；目前被国外的不少学校采用，作为学习甲骨文的必备教材。

1979年，王宇信也编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对三十年来甲骨文研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面介绍。1980年，孟世凯也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殷墟甲骨文简述》，对甲骨文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概况作了简要介绍。总之，上述各种综述和介绍性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甲骨文知识、推动甲骨文研究，都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后，甲骨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另一领域是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些甲骨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商代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首先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拉开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讨论的序幕。随后，他又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奴隶制时代》等一系列论文，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至五十年代中期，许多学者都先后参加过这一讨论。例如，孙海波于1956年发表了《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一文，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徐喜辰也于1956年发表《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一文，提出了和孙海波大体相似的看法。同年，束世澄在《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中也提出了和孙、徐相近的观点。1958年，唐兰发表《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针对于省吾1957年在《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中提出的商代为军事民主主义说，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一书中也持有相似的看法。这些讨论，对于深入探讨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许多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有关商代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根据甲骨文和考古资料，对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探索。例如，胡厚宣于1956年、1959年先后发表《释“余一人”》、《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下)，赵锡元于1957年发表《关于殷代的“奴隶”》，于省吾于1956年发表了《殷代的奚、奴》，又于1962年发表《释奴、婢》，姚孝遂于1960年发表过《“人牲”和“人殉”》，胡厚宣又于1976年发表了《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齐文心于1979年发表了《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兼甲骨文“圉”、“戎”二字用法的分析》。此外，郭沫若、李亚农、王承(示召)、王玉哲、斯维至、徐嘉辰、赵锡元、束世澄和陈福林等人，还曾就“众”和“众人”的阶级身分和社会地位进行过一系列的讨论。陈梦家还曾就殷代的官僚机构与官吏组成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讨论。所有这些，对于深入进行甲骨文和商代社会史研究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建国之初就有陈梦家连续发表《甲骨断代学(甲篇)》(1951年)、《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1951年)、《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学丙篇》(1953年)和《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1954年)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甲骨文的分期与断代问题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新看法。胡厚宣在编印前文所述的几部重要甲骨著录书时，合并了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第三、四两期，形成新的四期分期法。李学勤于1958年发表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并对这类卜辞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断代意见。于此同时，日本甲骨学家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也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分期断代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研究，把董作宾原定为文丁时期的一部分卜辞划归武丁时代。另外一位对贞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对董作宾的贞人断代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意见。香港学者饶宗颐，也对贞人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出版了专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七十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许进雄，从钻凿形态角度研究甲骨文断代理论，先后发表了《钻凿对卜辞断代的意义》(1970年)的论文和出版了《卜骨上的钻凿形态—断代分期的重要标准》(1973年)的专著。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对T53(4A)探方中出土的七片“(阜去掉十)组卜甲”进行研究后，依据地层关系，否定了董作宾把这类卜辞定为文丁时代的说法，从而确定它们的时代应为武丁时代。甲骨文中有一种字体较大、书法峻峭，贞人名称为“历”的卜辞，学者们称之为历组卜辞(图35)。过去董作宾曾把这类卜辞定为武乙、文丁时代，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对于董作宾的上述说法发生怀疑。例如1976年冬，安阳殷墟五号墓发现后，李学勤根据他对五号墓出土铜器、陶器的分析，认为出现此墓墓主人妇好名称的历组卜辞可能是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的甲骨文。他的这一看法后来经过裘锡圭、林(水云)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于上述一些问题还有不少看法互异的意见，但总的来讲，已经冲破了传统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的禁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又新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大批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新资料，而且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甲骨文研究的许多分支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独立学科，正在逐渐成长、壮大，不断丰富、完善和继续发展。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八《甲骨文合集》的编集及其意义

甲骨文从它在1899年被学者发现到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努力，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学者们普遍感到，在甲骨文的流传、掌握和利用方面，仍有极大的局限性。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甲骨实物大多由私人搜购，古董商人为牟取暴利而随意转购，外国人也乘机涉足其间，许多重要资料或者惨遭破坏，或者流散国外，或长期封藏在私人的箱底秘而不宣，以致于许多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甲骨文资料长期与世隔绝，无法得到利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著录的资料，也因大多是由私人拓印，很多材料辗转流传，造成许多著录书籍互相重复，而且拓印的质量优劣不等，有些资料即使已经印出，也无法加以有效的利用。此外，在这些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刊中，也有不少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而且印数较少，现又分散在各处，有的已经很难见到。这些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因而，对国内公私收藏的甲骨文资料重新拓印、统一挑选、剔出伪片、全面整理、科学地汇编为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久已成为中外学术界深所期望但又不易着手的巨大工程。

1956年，多年来就有志于进行这一工作的胡厚宣、桂琼英夫妇，将他们已开始着手的这项科研课题在中国科学院提出，很快就被列为国家科学研究“1956年至1967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的大型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后来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的组织、编写工作非常繁重，需要动员许多人力，集思广益。为了推动《甲骨文合集》编集工作的进行，国内著名古文字学家会聚一堂，共同讨论编辑计划，同时成立《甲骨文合集》编纂委员会，请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担任全部编集工作。编集工作正式开始

于1959年。在編集过程中，工作人员追訪祖国各地，先后到过大江南北44个城市，访问90多个收藏甲骨文的单位和40多个私人收藏家，并对他们所藏甲骨进行鉴别、精选和拓印，然后汇合八十多年来国内外已出版和已发表的甲骨文资料以及分散在国内外公私藏家手中的甲骨实物的传世拓本、照片与摹本，进行系统的选片、辨伪、去重、綴合和分期、分类等艰巨、繁重而又细致、认真的一系列工作；历经二十多个寒暑，中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几经波折，时辍时续，终于在1979年完成，并开始出版精选40,000多片甲骨文资料的集大成巨著《甲骨文合集》(图版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极高的声誉。

《甲骨文合集》的图版部分共十三巨册，总共著录甲骨文精品41,956片，系由目前国内外藏品的150000余片甲骨文资料中精选出来的，约占全部现存甲骨文总数的四分之一。《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文资料的基本原则是：“凡甲骨刻辞完全和比较完全的文句(包括省略句)以及辞句虽有残缺而内容较为少见者，一律选录。”因此，凡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体上已被收进《甲骨文合集》中。因而，《甲骨文合集》是一部既不同于全集，也有别于选集的精粹毕集的合集。

《甲骨文合集》的材料来源是非常广泛的。它首先取材于自1903年最早问世的《铁云藏龟》至七十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六十多种中外甲骨文著录书，同时包括各种甲骨文论著所附录的甲骨文材料。其次，它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公私所藏的各种甲骨文拓本、照片与摹本，其中有许多材料是迄今尚未发表的。此外，它还选拓了全国21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少数个人70多处现藏的甲骨实物。这些新拓的拓本，有的和旧拓本相比更为清晰精美；有的则补充了旧著录书上所印拓本经过剪裁、残缺或漏收(如有的甲骨正、反面都有刻辞，著录书只收一面等)的不足；有的则纠正了旧著录书的种种错误。总之，就现存甲骨文资料来讲，经过《甲骨文合集》的编选，可以说基本上被搜罗殆尽了。

《甲骨文合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编排方法上，它既照顾到甲骨文本身时代的先后关系，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全部甲骨文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期分类编排。在纵的方面，它依照目前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材料分为五个时期。在横的方面，它又在每期中依照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四个大的类别，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其分类原则大体为：

一、阶级和国家

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等若干小类。二、社会生产包括农业、渔猎、畜牧等小类。三、思想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气象、医学、祭祀、鬼神崇拜等小类。四、其他包括文字等不宜划归以上各类者。这种分期与分类互为经纬的编排方法，使40,000多片混沌一团的甲骨文资料成为条理分明的科学资料，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甲骨文合集》的編集过程中，全体工作人员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付出巨大的心血。例如，以往的甲骨文著录书材料的互相重复现象非常严重，他们曾对60多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进行过认真的对重，同时还把新拓的甲骨文著录书与这些甲骨文著录书进行互校。据初步统计，他们在編集过程中，校重复片次有14,000多片次，校出各种重片6,000多片，占《甲骨文合集》所收甲骨文资料总数的七分之一强。经过这一工作，不仅彻底清理了旧的甲骨文著录书的重出现象，同时也为《甲骨文合集》避免出现重片打下了良好基础。又如，《甲骨文合集》还比较全面地进行了甲骨文的綴合工作，他们在前人綴合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工作成果而又大大超越了前人，全书共綴合甲骨文1,600多片。这一工作使得原来残缺零乱的碎片得以复聚，使原来无法通读的许多内容变得通畅明了，从而等于增添不少新的材料。此外，在《甲骨文合集》中，凡是文句相同的卜辞(甲骨学者称之为“同文”现象)，都已按照记载占卜先后次序的数字，从小到大排列，这就不仅使一些原已残缺的卜辞有了补足所缺辞句的机会，同时也体现了原来占卜时的先后次序，便于学者据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甲骨文合集》还将散见于各书之中被分割开的原属同一卜骨的正面、反面与骨臼的拓本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编号来处理，这就使甲骨文原有的面貌更为清楚，内在联系更加明显。

总之，《甲骨文合集》一书无论从材料来源、编排方法上讲，还是从工作的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等方面看，都远远超越了前人。这样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工作，是前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甲骨文合集》的图版部分目前已经编讫出版，释文部分也已基本完成，行将付印。这一大型整理工作的完成，在甲骨学发展史上无疑是树立了一座丰碑。它既是八十多年来甲骨学各项成果的结晶，也是甲骨学开始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迈进的重要标志。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九甲骨文所反映的晚商社会

商代晚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由初步繁荣走向全盛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无法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面貌。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感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太少，从而发出过“文献不足”的慨叹。关于商代历史的较为可靠的文献，有《尚书》中的五篇《商书》和《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尚书》中的五篇《商书》，其中《汤誓》的文字比较浅显平易，学者们大多认为它的时代较晚，未足凭信。《高宗彤（rong2）日》、《西伯勘黎》与《微子》三篇文字很短。比较长而可信的只有《盘庚》一篇，总共不过1,283字，并且只谈到盘庚迁殷一件事。而《商颂》五篇，是周代宋人追祀先祖的颂歌，内容也较简单。根据这样的史料来探讨商代的社会历史，当然不免会有“文献不足”的慨叹。甲骨文的发现，给研究商代晚期的社会历史带来了新的契机。尽管甲骨文字句比较简单，形式千篇一律，有些字句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但它毕竟是商代晚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数量有十多万片之多，内容相当丰富，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根据甲骨文来探讨商代晚期的社会历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经过八十多年来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商代晚期的社会面貌已经大体清楚。

首先，从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商王是全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常自称“余一人”，这完全是一种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唯其一人为至高无上的独裁口吻。商王又利用对上帝的信仰将其王权充分神化。在甲骨文中，上帝是一位至上神，他不但有极大权威，并有人格和意志，主宰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他能命令风、雷、云、雨，决定农业收成，并能降赐人间祸福、护佑国家兴亡、决定军事胜败。‘他也拥有朝廷，并有史、臣供其役使。商王的先祖多被赋予帝的称号，从而被神化为和上帝具有同样权威的王帝。他们也能降临祸福，主宰人间吉凶。甲骨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宰人间的商王向上帝和先祖问卜吉凶的活动记录。商王就是通过这种神秘手段神化他们的王权的。

在商王之下，设置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包括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监狱等。根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商代晚期有数量众多的官吏队伍，依照他们职能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主管事务的臣正(包括“某臣”、“某正”、“某臣正”、“某元臣”、“某藉臣”、“某小藉臣”、“某匕臣”、“小丘臣”、“臣”、“小臣”、“少臣”、“多臣”、“多辟臣”、“尹”、“多尹”、“某尹”、“某族尹”等)，主管军事的武官(包括“马”、“多马”、“亚”、“多亚”、“亚某”、“多（上竹下服）”、“射”、“多射”、“射某”、“卫”、“犬”、“多犬”、“犬某”、“五族戍”、“戍某”等)和主管文化的史官(包括“乍册”、“史”、“御史”、“卿事”、“吏”等)。此外，各个邦族、方国又有“侯”、“田”、“牧”、“卫”、“方伯”等首长和官吏。商王就是依靠这些官吏统治着分为内服与外服的辽阔疆域的。

甲骨文中常有有关“古王事”的记载，是指一些臣服于商王的方国、邦族首领和商王封在外地的臣属、王妇、诺子，为商王服役、从征、戍守等事。此外，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关于商王向方国邦族征收贡物的记载。这都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属关系。

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和征服威慑方国邦族，商王拥有数量巨大的军队。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当时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记载。例如，根据专家研究，仅在武丁时期，商王就对周围方国邦族发动60多次战争，每次征集兵员数字都在3,000人以上，其中最多曾达13,000多人。根据商代末期甲骨文记载，当时有右、中、左三师军队，每师约有10,000人左右。当时的作战方式是车战，乘车作战的是“王族”和“多子族”等贵族武士；一般每车三人，前边为驾驶车辆的御手，左边持弓、矢的为主将，右部持戈的为护卫。车下由徒兵追随，一般由三人组成一组，他们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被征参战的“众”或“众人”，其身分可能为平民。此外，商王还拥有“马”、“射”等特种武装，其中射手常以300人为一单位。由此可见，当时商王的军队具有相当的战斗能力。

商王还制定了种种酷刑并设立了不少监狱。据专家研究，当时已有“墨”、“劓（yi4）”、“宫”、“（非刀）”和“大辟”等所谓“五刑”。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大量关于“刖刑”的记载，“刖刑”是锯掉一条腿的酷刑，当时对于奴隶常常施用这一刑罚，动辄数十人直至百人之多。商王还在各地设有监狱，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商王曾在东对、敦、冰、爻、旁方等地普遍设置了监狱，其中不少是设在边塞地区的。这些监狱，既是监禁奴隶的集中营，也是向中央王朝输送奴隶的转运站，是镇压奴隶反抗的强大工具。

当时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被称之为“羌”的奴隶，他们随时都有被无辜杀害的可能。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捕捉他们并把他们贡到商王朝的记载，还有大量用他们和牛、羊等牲畜一起当作祭品的记录。他们还要从事开垦农田等各种繁重劳动，最终仍然不免惨死于奴隶主手中。

甲骨文中还有关于“仆”的记载，从字形上看，象是一个手中拿着工具在房子里干活的家内奴隶，他们可能是从事家庭劳动的。商代奴隶主对他们的杀戮是非常随意的，甲骨文中有一次祭祀中就屠杀500个仆来作祭品的记载。

此外，被商王用作祭品的奴隶还有“报（去掉提手）”、“奚”、“妾”等多种。杀害他们的方法既有用刀、斧砍杀的“伐”、“（奚戊）”，又有用火焚烧的“（火交）”等多种。每次屠杀的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上百人。

“众”和“众人”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身分名称。关于他们的阶级身分和社会地位，目前还有争议，但从他们在商代所参加的各种活动看，可能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王命令众人进行大规模农业协作生产，和众在小臣的命令下种植

黍类作物(图36)的记载，都反映他们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加者。此外，他们还常常被征调参加战争和戍守活动，商王还屡屡卜问他们会不会丧失，这又反映了他们是受到商王的信任和关心的，其社会地位与上述可以随意杀戮的奴隶是完全不同的。



图 36 记载众在小臣命令下
种植黍的卜辞

由于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对广大奴隶和平民进行种种剥削和压迫，奴隶和平民常常举行反抗和斗争。甲骨文中有不少追捕逃亡奴隶的记载。例如，常常有关于“呼追羌及”、“呼追羌执”、“呼追羌获”、“踵羌”、“及奴”、“追仆及”、“踵仆执”等的记载。这些逃亡奴隶一旦被追捕回来，就要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有的被用乱箭射杀，有的则被处以刖刑，有的在被杀戮后还被用作祭品。面对这种迫害，奴隶们不得不进行反抗和斗争，他们或者焚烧仓廩(图37)，或者在监狱举行暴动(图38)。这些反抗和斗争与平民对贵族的反抗和斗争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终于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以阵前倒戈的方式，推翻了商王为首的奴隶主的统治，把我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时期。

在甲骨文中，还保留有不少有关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状况的珍贵史料。当时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已有多种用途不同的农业生产工具。例如，整地和翻土的工具耒和耜，耒是一根尖木棒或下端分叉的尖木棒，在靠近下端处附加一根供足踏的短横木，耜则是固定在耒上的锋刃具。甲骨文中有“藉”字，就是人持耒以足踏短横木进行翻土的象形。除草、中耕和收获用的农具，主要有石制的锄、镰和蚌制的凸刃蚌刀和蚌镰，甲骨文中的“蓐(ru4入)”、“薍(hao1蒿)”等字，都是手持蚌制工具刈除草木的象形。甲骨文中的“秦”字，是手持杵(chu3)对禾进行加工的象形。甲骨文中又有“田”字，则是土地经过整修分割成块的象形。当时的农作物也有许多种，从甲骨文看，至少已有“黍”、“稷”、“稻”、“麦”和“(禾来)”等类作物。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当时已有一定的灌溉系统，并有调节土地肥力情况的轮作制，同时还要定期进行土地翻整。当时的农作物可能多是春天播种，一年一熟，播种方法可能为点播或撒播。当时并有一系列的田间管理，如除草、培土、施肥和灌溉等。甲骨文中有“贵田”，据专家研究，是用锄或铲一类工具使土壤崩溃松散，同时进行除草并将土壅附在农作物根部的农事活动。又据有的学者推断，当时已掌握溷厕储粪和翻肥的方法，因而已懂得对农作物施肥。一些农史学者还据甲骨文资料推测，当时已有一定的农田灌溉系统，并有一些朴素的植物水分生理知识。甲骨文中有“采黍”和有关“廩”的记载，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对农作物的收割和储藏情况。此外，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求年”、“它禾”和“省黍”的记载，反映着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畜牧业方面，商代晚期已有比较繁盛的畜禽驯养生产。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当时驯养的畜禽已有马、牛、羊、鸡、犬、猪等多种，其中对马、牛、羊、猪的驯养尤为发达。当时的商王几乎每天都要宰杀牲畜作为祭品，每次少则几头、十几头，多则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头。甲骨文中就有商王为了耳鸣进行祭把，一次宰杀158只羊的记载(图39)。此外还有用“千牛”进行祭把的卜辞。由此可见当时的畜牧业是何等发达，牲畜贮备多么丰富。



图 39 记载商王为耳鸣宰杀 158 只羊举行
祭祀的甲骨文(左侧刻辞)

图 39 记载商王为耳鸣宰杀 158 只羊举行

祭祀的甲骨文(左侧刻辞)

商代晚期的蚕桑业也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关于蚕桑的记载也有不少，据学者们研究，仅据武丁时甲骨文记载，商王命令臣属省察蚕事的卜辞就有九条之多。这就说明蚕桑在当时是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之一。

商代晚期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久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甲骨文中也有有关冶铸情况的记载。例如，甲骨文中记有当时铸造青铜器不是使用铜矿石冶炼，‘而是直接采用“黄吕”这种冶炼后的铜料的情形。这反映了商代后期青铜冶铸已有炼铜和铸器两种不同的分工。这种情况也为考古材料所证实，例如，安阳苗圃北地的殷墟铸铜遗址中，在10,00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只发现有坩埚、陶范和陶模，而从未见有铜矿石出土。

商代晚期的科学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根据甲骨文记载，当时的人们对于天象已有比较详尽而周密的观察，对于风、云、雷、雨、雹等天气变化已作记录。甲骨文中不但有我国对于心宿二(大火)、新星、南方七宿(鸟星)和木星(太岁星)等星象的最早观察记载，而且还有关于日食和月食的最早记录。董作宾、赵却民、张秉权、张培瑜等学者都曾经对其中的月食记录进行过研究和推算，认为它们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天文现象。

商代晚期的历法也是比较成熟的。根据甲骨文可知，当时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每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一般有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十四个月不等。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般是大、小月相间，有时则有两个大月相连接的“频大月”现象。在历法的置闰方法上，早期一般是把闰年放在岁末，从而形成十三月，有时则要“再闰”，增加一个闰月，因而有十四月现象。祖庚、祖甲以后，闰月开始放在一年中间的七月或八月，这是所谓年中置闰的方法。当时的月名一般以数字表示，但也有用其他名称的，如一月也称“食麦”，二月也称“父(禾玄)”等。当时一个月又分为三旬，每旬十日，每日以干支表示，依次循环往复，并不受月份的限制。当时的年一般称为祀，也有称年或岁的。每年约有353日或354日，闰年则为383日或384日。有的学者还认为，当时已有了夏至的概念。

商代晚期对于一日之内也有表示不同时间阶段的各种名称。甲骨文把从日出到日没的白天称为“日”，从日没到日出的夜晚称为“夕”。日又分为上午的“明”、“旦”、“朝”、“大采”和“大食”，中午的“中日”、“昼”和下午的“昃”、“小食”、“小夕”、“暮”和“昏”等。可见当时的历法是非常细密完备的。

商代晚期对于人体和疾病的知识也很丰富。根据胡厚宣研究，当时记录在甲骨文中的疾病已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疾病，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今天的内、外、脑、眼、耳鼻喉、口腔、泌尿、妇产、小儿和传染病等主要医学分科的知识。此外，还有关于“心疾”和“疾肘”等病的记载，相当于今天神经系统和疖肿等病患。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关于“龋齿”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龋齿记录，比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同类记载要早七至十个世纪。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关于“疾言”的记载，可能是因口腔疾病或咽喉患病影响到语言上产生障碍的病状记录。上述种种有关人体各种疾病的记载，都是当时人们长期同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案记载，是研究世界医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史料。

商代晚期在数学方面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知识。甲骨文中有了以1为基本单位的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并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位单位和概念。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

在牲畜驯养技术方面，商代晚期也已具有比较高的水平。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相马、执驹、攻特等技术的记载，并且出现了原始的马医。

此外，在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蝗灾记录(图40)，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危害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灾害有了一定的认识。

总之，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晚期社会生活是极丰富多彩的。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不但在整个古代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后世的科技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它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极好证明。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十殷墟以外的甲骨文

除了殷墟之外，解放以后先后在我国的河南郑州二里岗、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和扶风齐家村等地，都曾发现过一些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这些新的发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

河南郑州二里岗，是一处商代中期文化遗址，它的时代早于殷墟文化并与殷墟文化相衔接。1952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训练班在当地发掘时曾发现卜用兽骨375片，卜用龟甲11片，但未发现文字。有字甲骨是河南文物工作队后来在这处遗址中发现的。

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共有3片。其中一片是1953年4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在被翻动的地面上找到的。这是一片牛肋骨，上面刻写的是练习契刻的十个字(图41)，文字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体相似，有人认为可能和殷墟甲骨属于同一时期。另外一片是1953年9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在CIT30探沟内发现的，这是一片呈扁圆状的牛肱骨骨片，出土于离地面半米左右的地层中，它的一面为平底，一面凸起，在凸起的一面刻着一个“有”字(图42)，是殷墟甲骨文中常见的字。第三片是1954年4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发掘时发现的一条带有小孔的薄骨片，上面也刻有一个字。专家们认为，上述三片甲骨可能是王室以外的贵族日常使用的卜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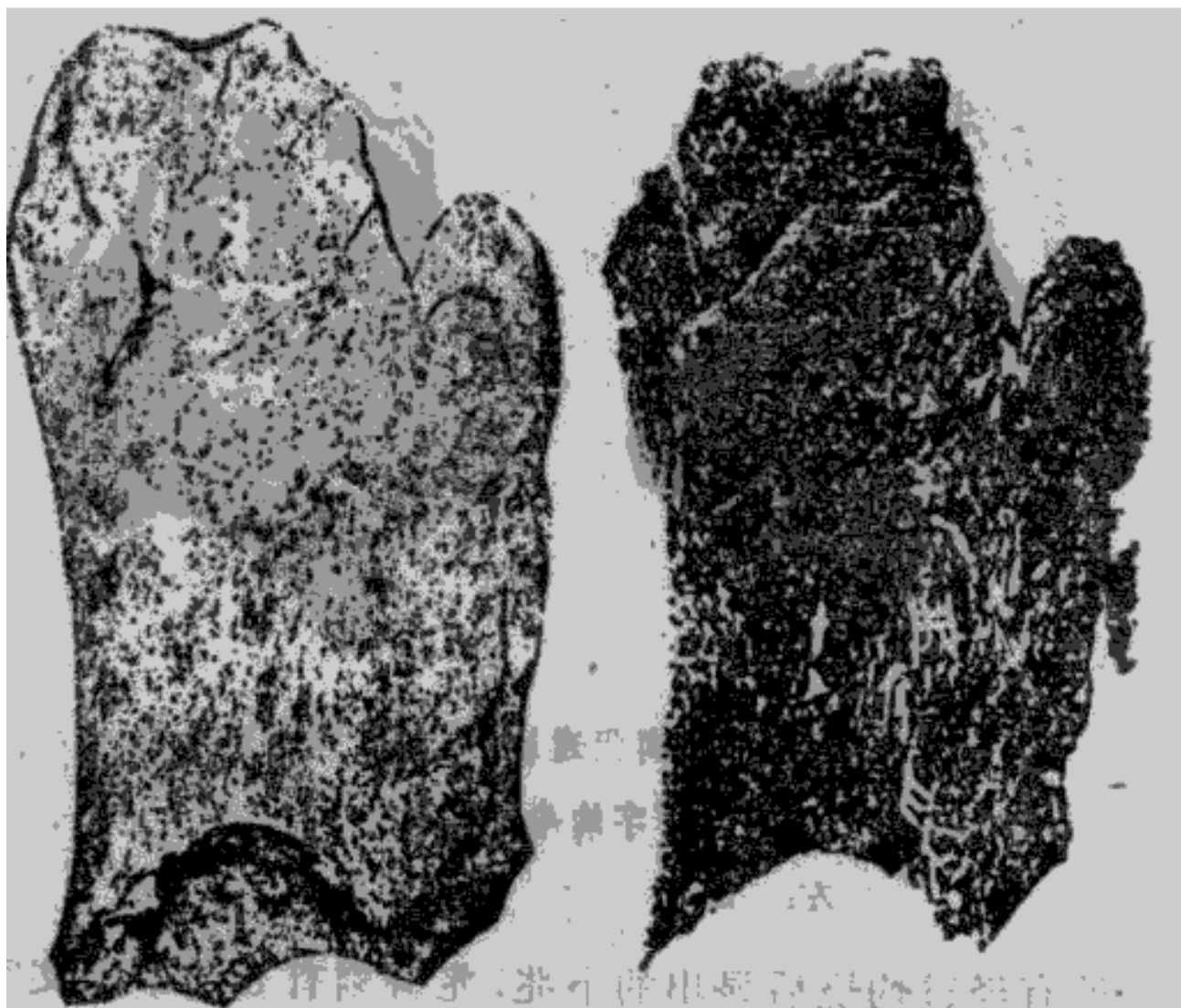


图 41 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练习契刻的甲骨

左： 照片

右：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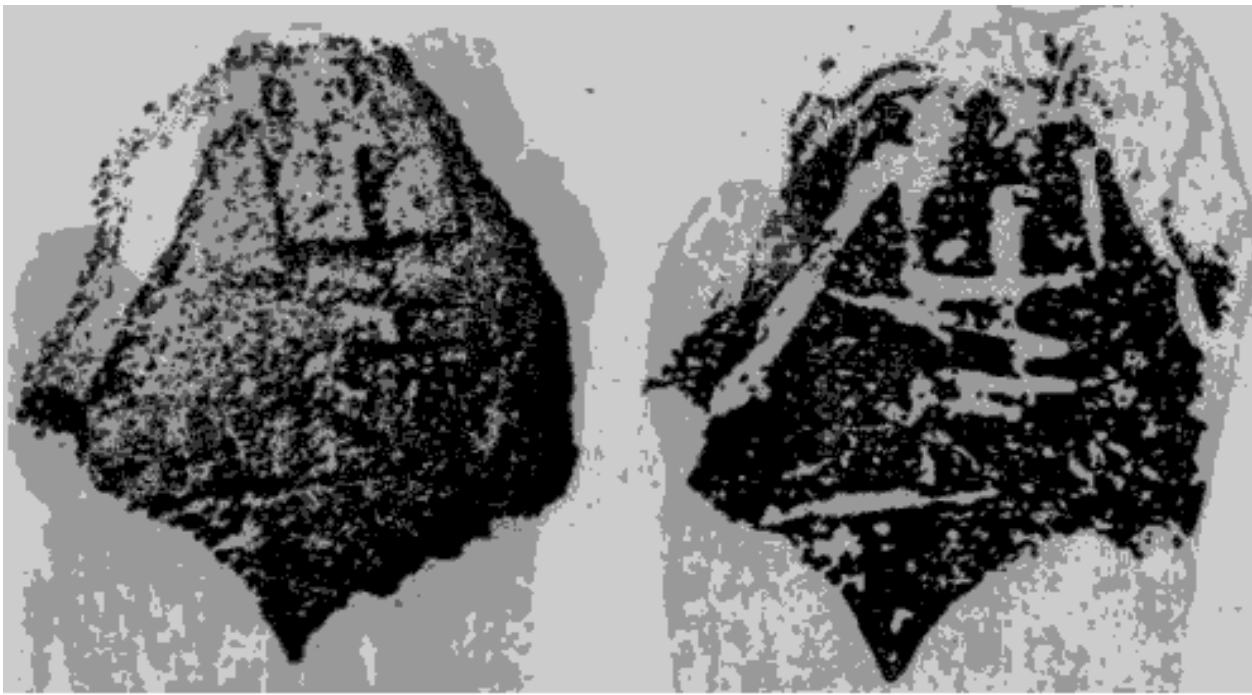


图 42 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 CIT30 探沟出土的
刻有“王”字的牛肱骨骨片
左： 照片 右： 拓本

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有字甲骨，人们开始认识到甲骨文并不限于商代才有。洪赵坊堆发现的有字甲骨仅一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臼处有钻窝16个，不规则排列成数行，中下部靠近左边处另有钻窝5个，形成纵列一行。卜骨正面相当于背面钻窝处有经过灼烧后显出的卜兆，兆旁刻有8个甲骨文字。对于这片甲骨的时代，学者间曾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春秋或更晚时期的东西，有人认为应属西周初期。

继上述发现后不久，1956年1月，陕西文管会又在西周的京畿腹地长安丰镐遗址的张家坡，发现了西周的有字甲骨。这是一块肩胛骨的柄部，背面靠边处有三个钻窝，钻边有极细的凿孔，正面相当于钻凿处均有卜兆，卜兆附近并刻有极细的两行文字，一竖行，一横行。随后又在同一地区发现过另外一块兽类肢骨，其上部相当于钻孔的正面，也刻有字划极细的文字。据统计，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先后共发现3片有字甲骨，共刻有30字。

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周初燕国墓地也出土了两批甲骨。其中一批出土于一座墓葬的人骨左上方，共10片，全是卜甲碎片，有腹甲也有背甲；其中刻有文字的共2片，分别刻有“贞”和“不止”等字。另一批出土于另一座墓葬的椁室右侧中部，约有100多片，均为卜甲残片，腹甲、背甲兼有；其中刻有文字的共3片，一片刻有“其祀”二字，一片刻有“其尚上下韦馭”等字，另一片刻有“央告”等字。这一遗址共出土有字甲骨5片，共有13个文字。

以上几处周代甲骨的发现，使人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大为改观。人们看到，不仅在西周的京畿地区有甲骨文出土，而且在周的晋、燕等封国也有甲骨文发现。能否发现更多的西周甲骨文呢？1977年春天，考古工作对此作出回答。陕西省周原考古队的考古工作者，在对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西周宫殿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清理时，在该基址的西厢房2号房基内的H11和H31两个窖藏中发现了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F甲16,700多片，均为龟腹甲；卜骨300多片，均为牛肩胛骨。这批甲骨经过清洗整理，共发现有字甲骨289片，总共刻有903字，其中合文字12个(图43)。这批甲骨大多数为周初卜甲，也有少数在灭商以前的商代晚期；刻辞内容极其丰富，广泛涉及到灭商以前到西周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批甲骨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重视，有关周原甲骨的讨论和研究从各个方面迅速展开。例如，有一些研究人员对这批甲骨的字形、孔型和刻辞中的人名、宫名、方国名、地名以及有关周初历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根据这批甲骨资料，结合殷墟甲骨文中的有关资料探讨了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根据这批甲骨资料论证了周原甲骨中“楚子来告”一片应为楚人先祖鬻熊投奔西周的原始记录；讨论了这批甲骨的来源问题；研究了有关方国的一些问题；有一些研究人员则讨论了这批甲骨的分期与断代的问题。这批甲骨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也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也先后撰文参加了讨论。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现的“王”进行讨论；认为在“文武帝乙”庙中祭祀祖先，并“(上册下口)周方伯”的这个“王”，不是周王，应为商王。他还曾到北京大

学历史系做了有关西周甲骨研究的专题报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也曾根据周原甲骨对商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例如，严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为题，对这批甲骨的文字、时代和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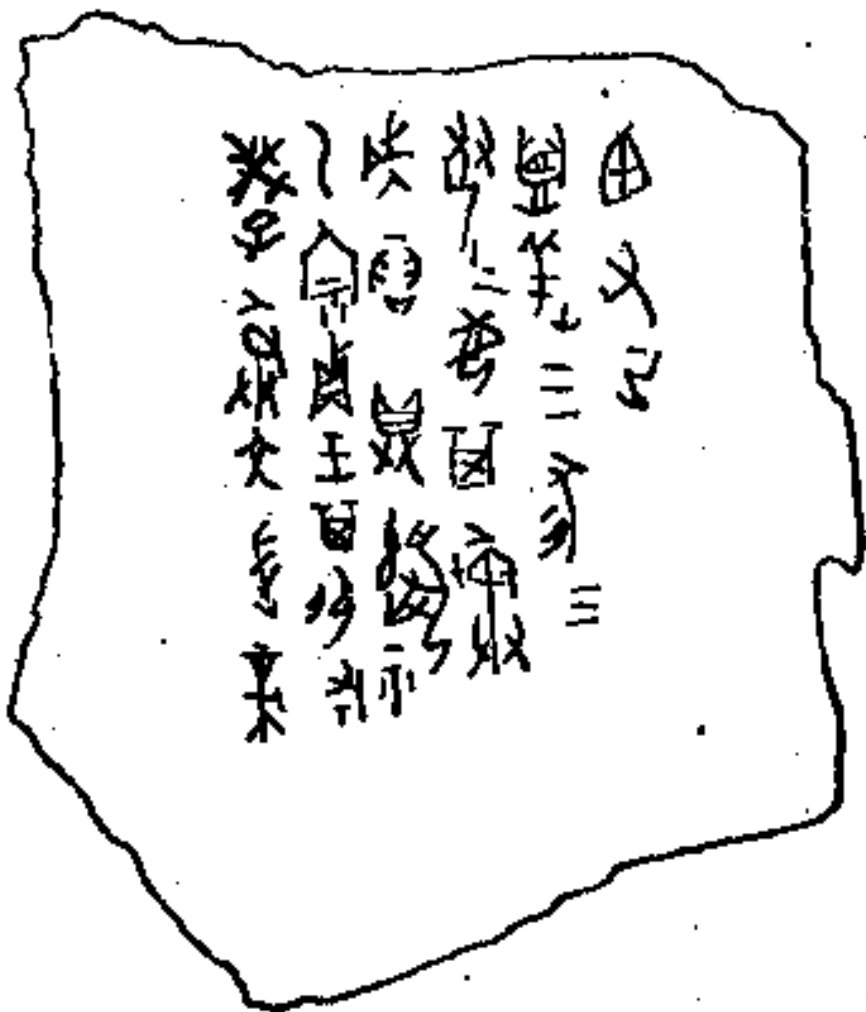


图 43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

正当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时候，周原的另一处遗址扶风齐家村，也于1979年9月发现和采集到西周甲骨22片；其中有字甲骨6片，共有102字。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的一块带有刻辞的较为完整的龟腹甲，仅缺甲尾和甲桥部分；背面共有方形凿孔35个，正面刻有卜辞4条23字，均在卜兆附近。这片龟腹甲的发现，弥补了过去由于出土的西周有字龟甲均很碎小，对其特征观察受较大局限的不足，同时也开阔了人们对于周原甲骨原有面貌的认识。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殷墟以外，陆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甲骨文新资料。共发现有字甲骨307片，共有甲骨文1,080字。这些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为商周历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可信史料，而且还促进甲骨学产生了一个以周原甲骨为中心的，研究西周甲骨的新的重要分支领域。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十一 甲骨文研究的未来展望

甲骨文研究，如果从1899年学者的最初发现和鉴定算起，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来，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甲骨文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已经成为当代考古学和中国古文字学中一个发展较快的重要分支，逐步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根据甲骨学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甲骨文研究的未来发展前途是非常广阔的。

根据甲骨学者最近作的统计，八十多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总数至少在150,000片以上。而各种著录甲骨文材料的专书、书刊和论著已达180多种，先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中外学者400多人，总共出版和发表甲骨文研究论著近3,000种。这些丰富的甲骨文资料和研究文献，既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给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任务。

首先，从甲骨文的资料整理方面来看，随着《甲骨文合集》和《小屯南地甲骨》等重要甲骨资料书的出版，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将大大超越前人。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这样丰富的资料是每个甲骨学者都在考虑的问题。不少学者都感到需要在已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基础上，再做进一步全面彻底的系统整理工作。尤其是需要按照材料的内在联系，将甲骨文材料进行系统的有规律的编排，这对于研究甲骨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将会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同时还需要编纂一部便于检索的甲骨文分类单字索引。在这方面，过去虽有日本学者岛邦男编纂过《殷墟卜辞综类》一书，但已远远赶不上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需要。新编这种工具书应当具有类典的性质，无论从材料的取用范围，还是从使用的方便上，都应超过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促进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其次，安阳殷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带有明确科学目的的发掘工作。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应结合已有的资料，把几经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依照出土坑位和共存文化遗物，整理为成套的科学资料，以便国内外甲骨学者和考古学者共同协作，把目前的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来。

在甲骨文本身的通读方面，识字问题仍然是需要学者们再作努力的重要研究领域。八十多年来，甲骨文考释工作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就目前情况看，在甲骨文中出现的4,500多个单字中，可以识读的不过1,000多个，其中真正比较可靠的还不足1,000个，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甲骨文中大量未获解该的单字还有待于学者们运用更科学的方法去作进一步研究。为了有助于吸收前人考释文字的学术成果，台湾学者李孝定曾编纂过《甲骨文字集释》一书，近年来于省吾也编纂了一部大型工具书《甲骨文字考释类编》。这些工具书的编案，对于甲骨文的文字考释工作，必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一直是甲骨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近年来这一方面的讨论日渐深入，许多学者先后对“非王卜辞”和“历组卜辞”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的结论。对于董作宾原定为一期的卜辞，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在作进一步分期的研究。此外，有的学者正在试图从以贞人为分期断代主要标准的传统看法之外，寻求解决分期断代问题的新手段和新途径。这些研究目前都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今后肯定会有新的重要突破出现。在关于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有无武丁以前和帝辛时代的卜辞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在试图找出肯定性的证明。学者们普遍感到，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进行系统的通盘整理，撰写出更高水平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专著。这是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方面，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过去虽然已有许多学者曾对商代晚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国家结构、土地制度等重大问题作过研究和探讨，但所得结论还有许多问题，远远不能视为定论，不少看法还需再作进一步讨论。此外，商代晚期的对外战争和军事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代疆域、历史地理问题，目前研究得也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商代晚期的科技文化史方面，也有许多研究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例如，甲骨文中的日食、月食材料，虽已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但随着甲骨文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天文计算工作的进步，还需进一步讨论和推定。又如，甲骨文中的“日又（音戈）”记载，究竟是指日食而言，还是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也是有待于研究的问题。再如，商代晚期的历法，也有许多问题需作进一步的解决。诸如置闰规律、合朔、月建、两分两至的有无等，都有待于学者们去进行深入探讨。

古代的气候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商代晚期我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状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内容。—早在三十多年前，有些甲骨学者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文章，曾经得出比较重要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作物栽培技术的记载也是非常丰富的，过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今后还应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关于我国古代的酒类酿造、蚕桑纺织、医药卫生、动物与植物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总之，甲骨文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有一系列重要课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可以预期，随着甲骨文研究在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和重大突破，甲骨学必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甲骨文研究作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科，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学者投身到它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来。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数不尽的文化宝藏。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是其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甲骨文是我国商、周时期用于记录占卜活动内容的古代文字。它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比较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甲骨文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的鼻祖和前身。

甲骨文又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它真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愧为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和古代埃及的纸草文书、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一样，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发达史上占居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放射着绚丽的光辉。

一、刻字“龙骨”的奥秘

我们通常所说的甲骨文，一般是指殷墟出土的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的商代晚期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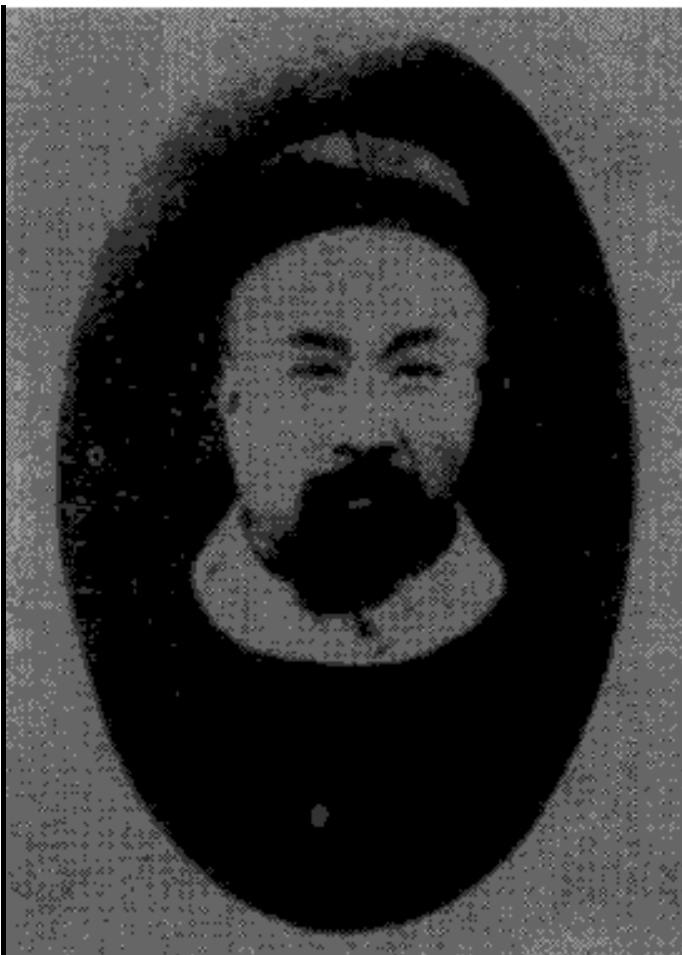
殷墟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至帝辛(即殷纣王)八代十二位商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我国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以小屯村为中心，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范围约有二十四平方公里左右。这里到处埋藏有极为丰富的商代晚期文化遗物，甲骨文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贵族在进行占卜活动后，将有关占卜活动的内容刻写在用于占卜的龟甲或兽骨之上的文字。由于刻写有这些文字的龟甲或兽骨首先在殷墟发现，甲骨文又有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殷契、殷墟文字等许多名称。此外，学者们也有称之为龟版文、龟甲兽骨文字、龟甲文、甲骨刻辞、贞卜文字的。甲骨文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名称。

甲骨文除了出土于殷墟之外，在我国的河南省郑州市，山西省洪洞县，陕西省长安县、扶风县、岐山县以及北京市昌平县等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也陆续有发现。这些甲骨文不仅有商代的，还有周代的。不过，它们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内容上看，都远远无法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比。因此，在以下各章的叙述中，我们所介绍的主要是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至于殷墟以外出土的甲骨文情况，我们将在第十章中专门介绍。

甲骨文最初发现于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关于它的发现经过，曾经流传过一个极为有趣的传说。

相传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秋天，北京城内有一位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图一)因患疟疾延请太医诊治。太医诊脉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一味是中医经常用以涩精补肾的药材“龙骨”。王懿荣随即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从明代开张至今的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一一审视，无意间发现药包中的“龙骨”上刻有一种和篆文相似而又不大能认识的文字。这一发现使他大为惊讶。王懿荣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对于古代文字有很深的素养和造诣，“龙骨”上的这些奇异的古代文字，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寻根问底，查明来历，专门派人又到那家中药店将所有带有文字的“龙骨”全数买回。王懿荣对这些带字的“龙骨”进行了精心研究，初步断定这些“龙骨”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原来是比当时已知的各种较早的古文字还要古老的文字，它们也根本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商代占卜用的兽骨。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是在这样偶然的场合中被发现的。



这个故事不仅十分生动，而且流传相当广泛，但它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传闻。因为经人调查，北京的中药店拣药时，一向都是先将拣出的龙骨捣碎，然后再包入药包的。“龙骨”既然被捣碎了，当然也就无从去发现它上面是否刻有文字。不过，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王懿荣是较早接触、收购甲骨文并最早对甲骨文进行初步鉴定的学者，则大体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

最早发现这些带字“龙骨”的，应当说是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农民。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被人们当作带字“龙骨”看待的。

早在学者们开始接触甲骨文之前的二十多年前，小屯村的农民便在翻耕土地时发现了甲骨。当时，他们只是把这些甲骨收集起来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药店，药店也一直把这些甲骨当作“龙骨”来收购。这种“龙骨”的收购，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激发着当地农民挖掘甲骨的兴趣。他们每至农闲时节，便随时就地挖掘，挑出较大的卖给药店。在这些较大的甲骨上，往往刻有文字，而药店收购时不要带有文字的，他们使用铲子削去文字后再拿去出售。对于小块的或字多不易削去的，他们往往用来填塞枯井。也有人用它们刮削成粉末充作医治刀伤的“刀尖粉”。总之，在学者们开始接触甲骨文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它们一直是被当作刻字“龙骨”看待的，数以万计的珍贵甲骨文资料就这样被毁弃了。

大约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药店不愿收购的刻字“龙骨”引起了古董商人的注意。清代末年的安阳城是当时的彰德府府治所在，由于当地经常出土青铜器和其他古代文物，北方各地的古董商人常到这里收购古物转销北京、天津等地。在这些古董商人中，有一位山东潍县人范维卿。他在收购古物的过程中，注意到小屯村农民挖出的刻字“龙骨”，便在这年冬天，告诉了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和王襄等人。他们听了范维卿谈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的契刻文字，孟定生并猜测这可能是古代的简策。第二年秋天，范维卿买到一些刻字“龙骨”，带到北京，送给当时担任园子监祭酒一职的著名金石学者王懿荣，立刻受到王懿荣的极大重视。王懿荣经过研究，初步断定这是一种刻写有古代文字的“龟版”，遂出高价购买收藏。王懿荣凭借他的丰富渊博的金石学和古文字知识，经过更进一步的精细研究，终于断定这是商代用于占卜的甲骨，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是当时所知最早的古文字篆文和籀文之前的一种更古老的古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说，最早接触、购买甲骨文并作出鉴定意见的学者是王懿荣。大约在同一年稍晚，范维卿到天津时还卖给了孟定生和王襄一些甲骨，因而，他们也是较早接触并购买收藏甲骨文的学者。由于王懿荣等人的购买、研究，一向不为人们所知的刻字“龙骨”终于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开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的重要珍贵资料。

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刻字“龙骨”的奥秘被人们揭示出来。原来这些刻字“龙骨”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王室贵族进行占卜活动留下的文化遗物。

占卜作为一种宗教迷信活动，在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就已流行，后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广泛流行于我国许多民族中。商代是占卜活动极为盛行的时代，当时几乎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吉凶。例如，祭祀、征伐、田猎、收成、风雨阴晴、祸福疾病，直至妇女妊娠，生男还是生女，都要进行占卜，有时对同一件事还要反复进行占卜。

商代晚期占卜所使用的材料是龟的甲壳和兽类骨骼。使用龟甲时主要是使用龟的腹甲，间或也用龟的背甲。兽骨则主要使用牛的肩胛骨，偶尔也使用牛的肋骨或鹿、羊、猪的肩胛骨等。龟甲在使用前要将甲壳从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的连锁处——甲桥部分锯开，使甲桥的平整部分留在腹甲上。然后将带甲桥的腹甲锯去甲桥外缘的一部分，使之成为边缘比较齐整的弧形(图2)。背甲则一般直接从中间脊缝处对剖为两个半甲(图3)。有的背甲在对剖之后，还要再锯去靠近中脊部位的凸凹较大的部分和首尾两端，使之成为近似于鞋底状，并在中部钻出一个圆孔(图4)，这种背甲学者们称之为改制背甲。牛肩胛骨也要经过加工才能使用。一般先要将骨臼部分从较长的一面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使之成为月牙形，然后再将臼角向下和向外分别切去一部分，使留下的臼角形成一个近于直角的缺口，最后再将直立的脊骨连根削去，并将整个骨板削平，同时削去骨臼下部隆起的部分，整个骨板的初步加工即算完成(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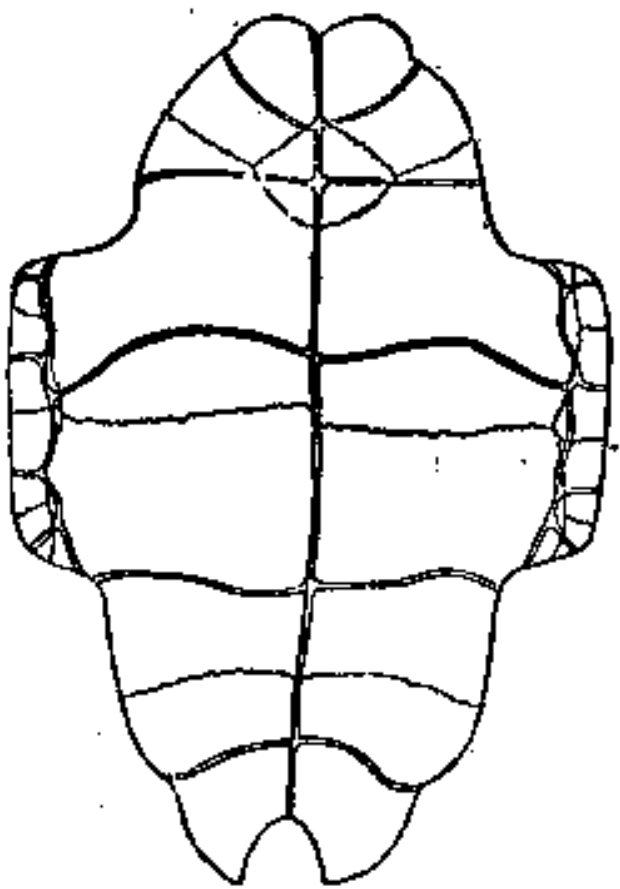


图 2 加工后的龟腹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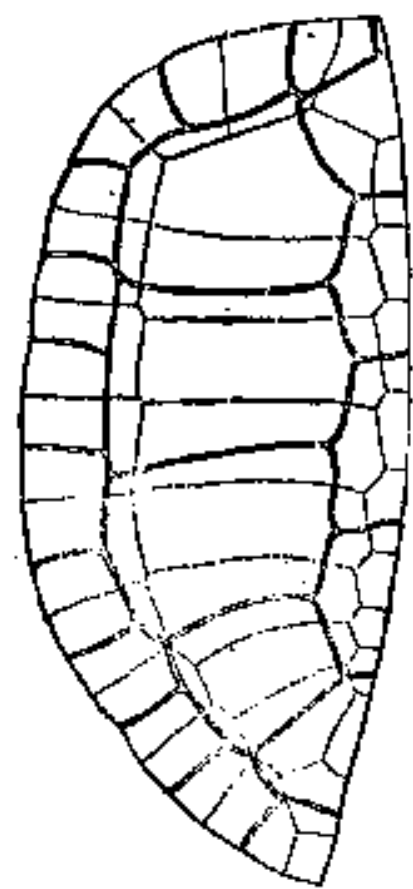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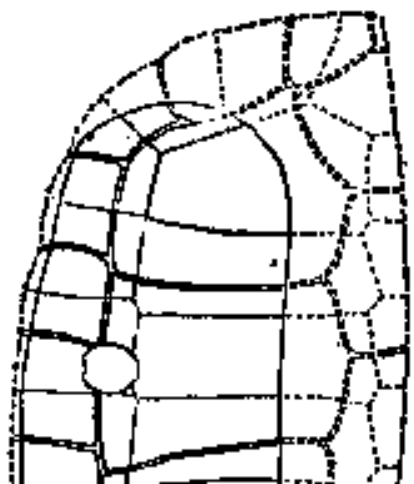


图 3 加工后的龟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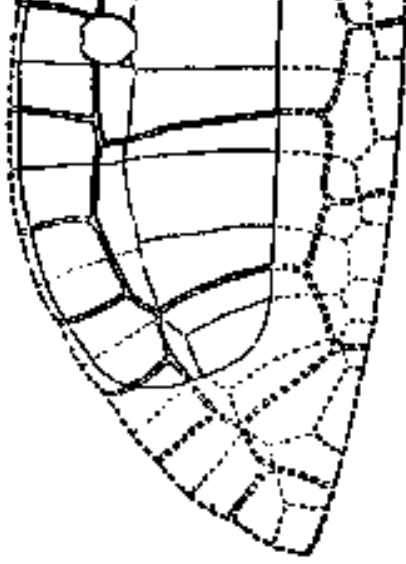


图 4 改制的龟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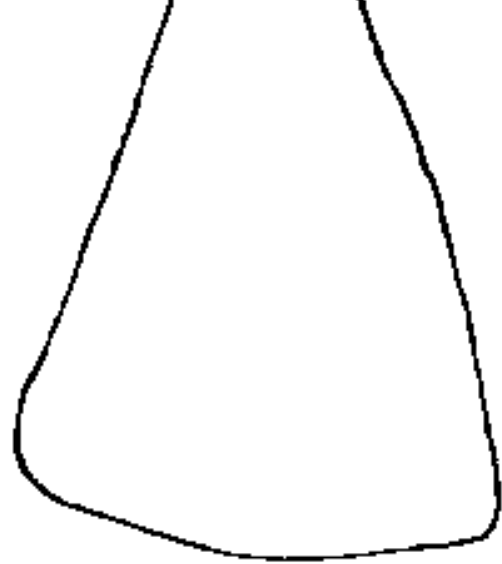


图 5 加工后的牛肩胛骨

龟甲和牛肩胛骨经过上述初步加工后，还要进一步刮削和磨光，然后在它们的反面挖和钻制出圆形和长椭圆形梭状的巢槽，以便在占卜时用火在这些巢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纹。长椭圆形梭状的巢槽叫作凿，一般长约1厘米左右，口宽底窄，呈梭状斜槽。圆形的巢槽叫作钻，一般紧靠凿边正中部位钻出，是比凿稍小的圆形洞穴，一般都在凿的内侧。凿和钻都只做到距离正面极薄的地方，但不能穿透骨面。凿和钻的排列和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其数目则根据龟甲和牛骨的大小而定(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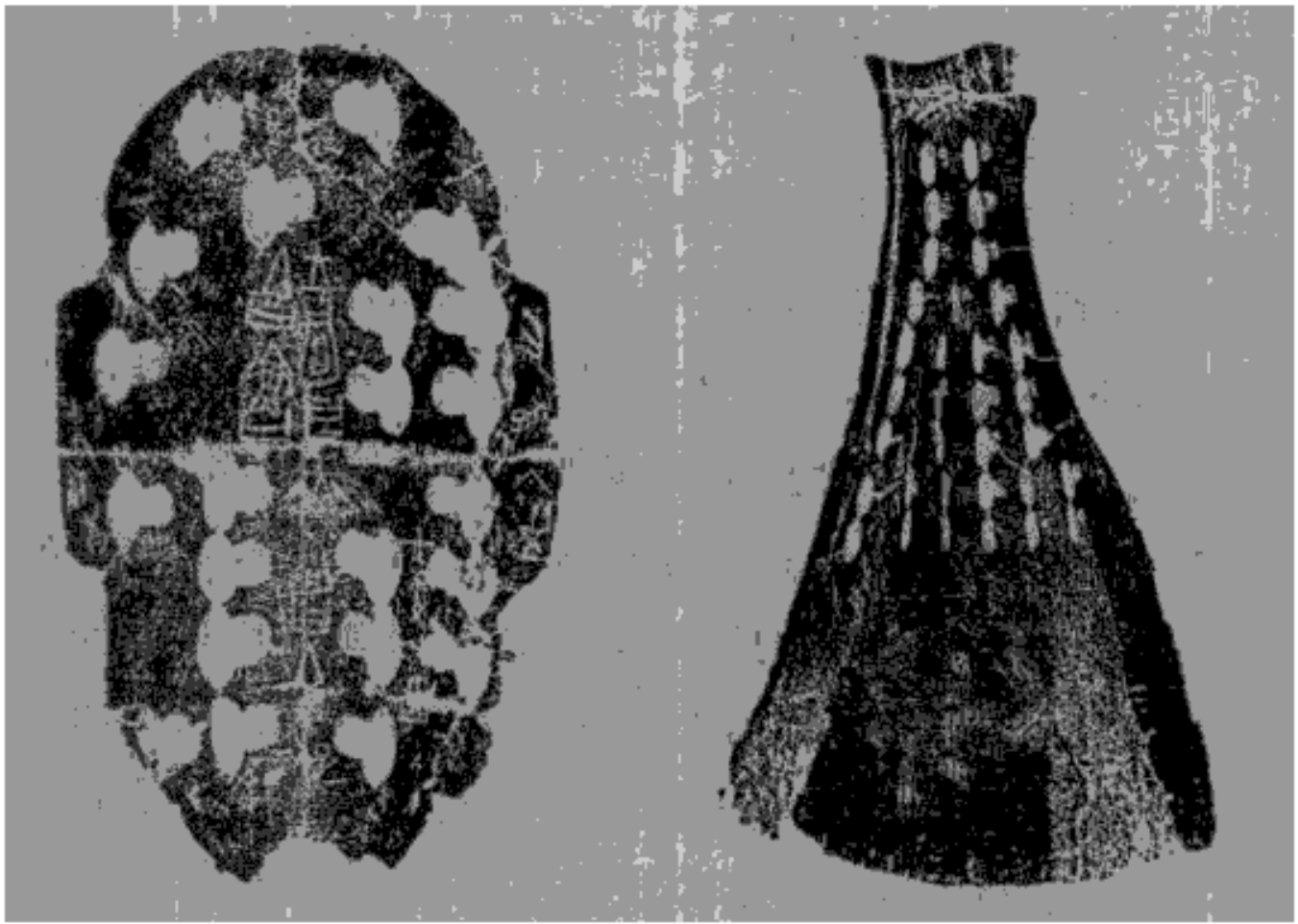
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保管这些龟甲和兽骨时，一般还要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这种记事文字在甲骨上刻写的部位共有五种形式，学者们称之为“五种记事刻辞”。它们分别为：

1、甲桥刻辞

即刻写在龟腹甲反面甲桥上的刻辞（图7）

2、背甲刻辞

即刻写在龟背甲反面边缘处的刻辞（图8）



a. 龟腹甲

b. 牛肩胛骨

图 6 甲骨上的钻凿

- 3、甲尾刻辞 即刻写在龟腹甲尾部的右边的刻辞(图9)。
- 4、骨臼刻辞 即刻写在牛肩胛骨顶端骨臼面上的刻辞 (图10)
- 5、骨面刻辞 即刻写在牛肩胛骨骨面比较宽薄的一边下部的刻辞(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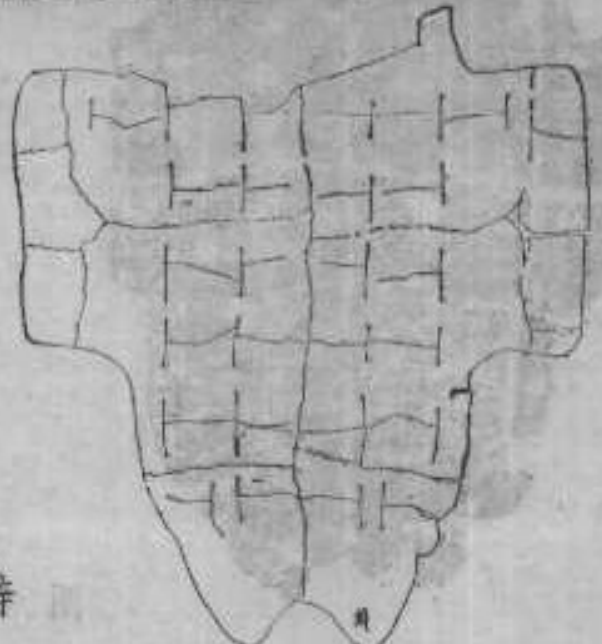


图 7 甲桥刻辞(右:我以千。
左:妇丙示百,癸)

图 8 背甲刻辞



图 9 甲尾刻辞



有的学者也把上述五种记事刻辞称为“署辞”。它们也是甲骨文的组成部分。

商代晚期的占卜活动一般是由卜官从事的。卜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穴，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项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的卜兆下面，还常常刻写出表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甲骨学者称之为“兆序”（图12）。它们也是甲骨文的组成部分。



图 10 骨白刻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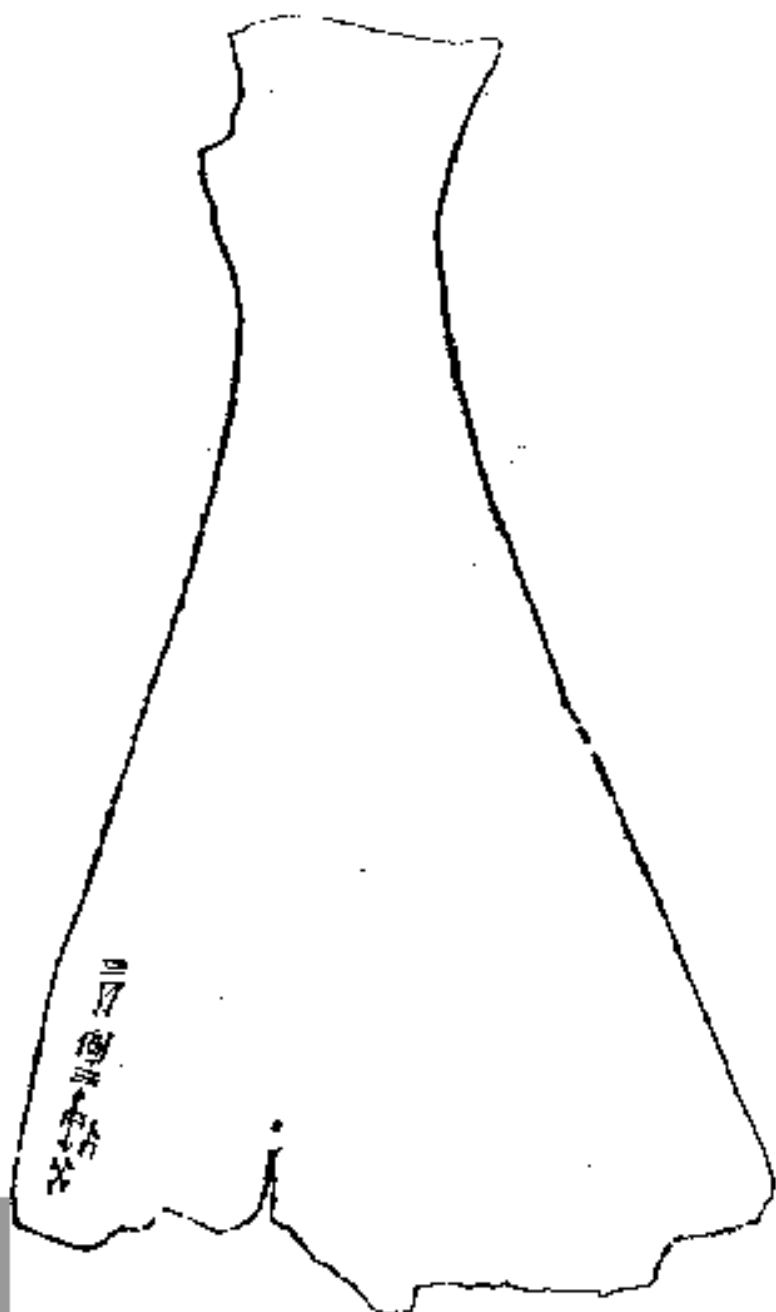


图 11 骨面刻辞



图 12 卜兆与兆序

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卜辞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通常是正面刻写出一部分，另一部分在反面接着刻写。一条比较完整的卜辞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1. 前辞

学者中也有称为叙辞的，一般记述占卜的干支日期和主持占卜活动的人物名称等内容。

2. 问辞

学者中也有称为命辞的，一般记述占卜时卜问的事项内容。

3. 占辞

一般记述商王或占卜者根据卜兆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吉凶判断或推测。

4. 验辞

一般记述占卜活动结束后事情是否和预卜的判断或推测相应验等内容。

例如，武丁时期的一条完整的卜辞为：

**癸卯卜，殼贞：旬亡(无)祸？王固曰：祟(有)祟，其
祟(有)来艰？迄至七日己巳，允祟(有)来艰自西，
噩友角告曰：吾方出，侵(侵)我于聚，田七十、人
五。(图13)**



图 13 刻有完整卜辞的甲骨

它的基本组成是

前辞：“癸卯卜，殼贞：”

问辞：“旬亡(无)祸？”

占辞：“王固曰：且(有)祟，其且(有)来艰？”

**验辞：“迄至七日己巳，允且(有)来艰自西，彗友角告
曰：舌方出，慢(侵)我于鬲，田七十，人五。”**

甲骨上卜辞的刻写也有一定的规律。商代的书写行款和旧时代直写的格式大体相同，也是竖写直行，由右到左。不过在甲骨上刻写卜辞时还要根据卜辞的位置而定。例如，刻写在龟甲上的卜辞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龟甲左右边缘部位的卜辞，刻写时是由外向里，即位于龟甲左边的行款由左向右，位于右边的则由右向左；另一种位于龟腹甲中缝两边的刻辞，则由里向外，即在左边的从右向左，而在右边的则从左向右。牛胛骨上的卜辞一般多刻在靠近骨边的部位，其行款大多是从外向里。

甲骨上一般刻写的卜辞不止一条。当时对于同一件事常常有正反相对应的两种卜问，记载这种对应相卜的卜辞叫作“对贞卜辞”。对贞卜辞往往刻写在甲骨上左右对称的相应位置上。此外，还有一种对于同一件事反复卜问多次的卜辞，它们在牛胛骨上大多由下向上依次分段排列。早期卜辞中的这种对于同一件事反复卜问多次的卜辞，也是连续卜问，但总是在每一段间刻写另一条卜辞，学者们称之为“相间卜辞”(图14)。





除了上述记事刻辞、兆序和卜辞外，中骨文中还有一种特殊刻辞。这种刻辞刻写的是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学者们也称之为甲子表（图15）。这种甲子表是当时的人们用来检核和推算干支纪日日期 的谱表，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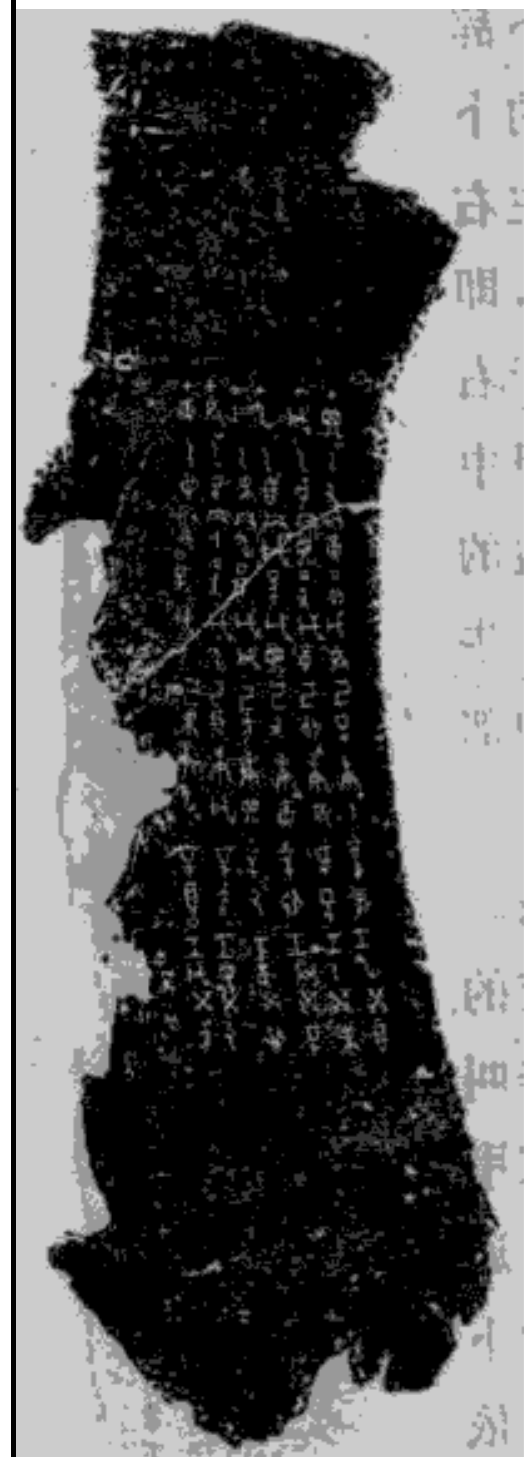


图 15 甲子表

此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文字的作品，学者们称之为习刻或习契(图16)。它们大多是一些单字的重复或甲子表以及某些卜辞的抄写，从中往往可以看出当时师徒相授的有趣迹象。

甲骨文一般是先用朱砂或黑墨写在甲骨上，然后再用刀刻出浅槽，但也有不少是直接刻成的；早期的甲骨文在刻好之后，还往往用朱砂或黑墨涂在字划里，学者称之为涂朱或涂墨。经过涂朱和涂墨的甲骨文显得格外好看，简直是一种雕刻精美的艺术品。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二 汉字的鼻祖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曾经经历过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从文字的成熟程度上看，还是从使用字数的数量和体系的完整来讲，甲骨文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汉字的萌芽，从现有资料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号是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图17)。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灰陶缸上的图形文字(图18)，已基本上具备了象形、会意文字的雏形。到了商代，文字的发展更为进步，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片上的刻划文字(图19)和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文字(图20)，已经是接近于甲骨文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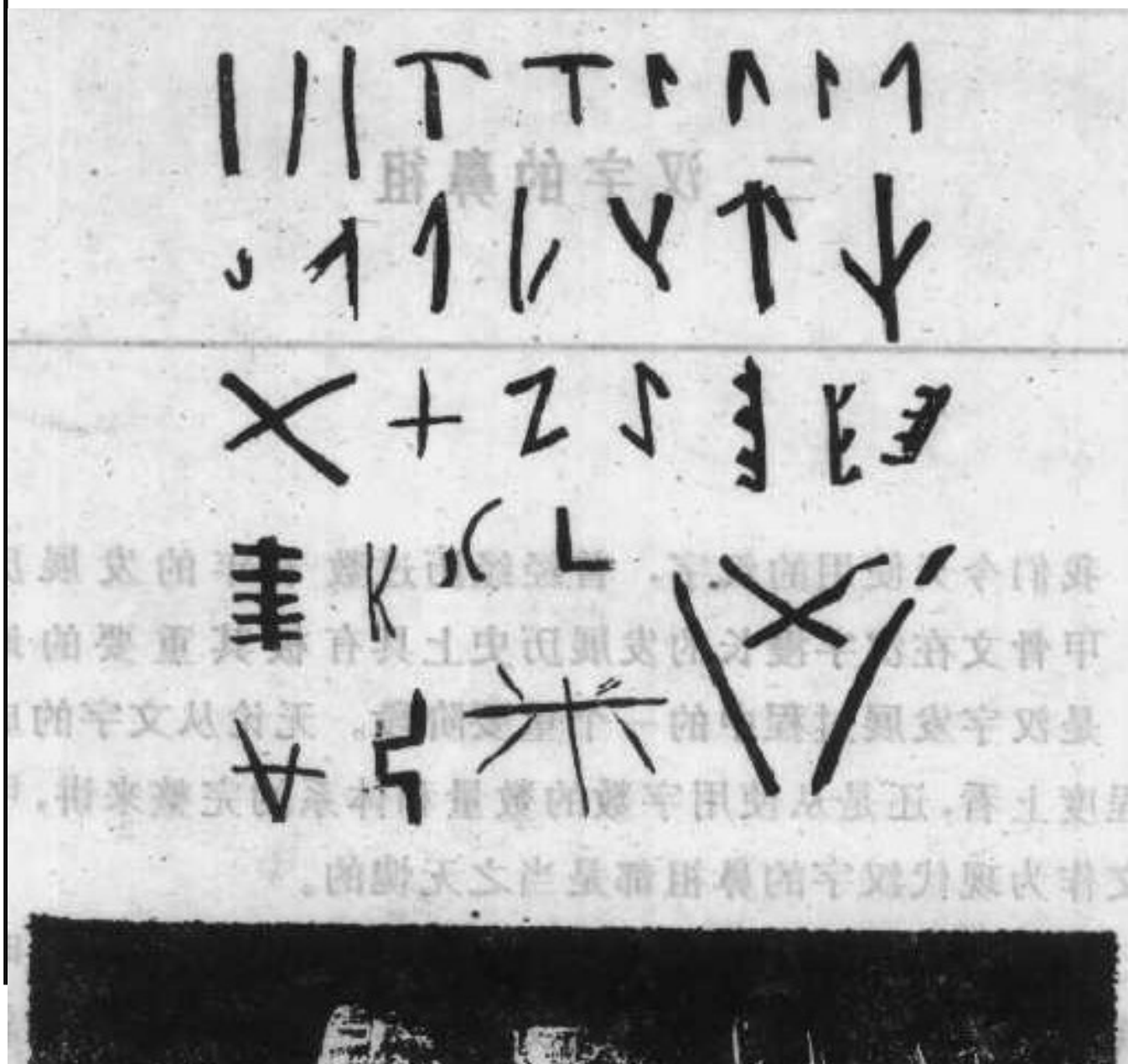




图 17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上 刻划符号摹本 下 带刻文的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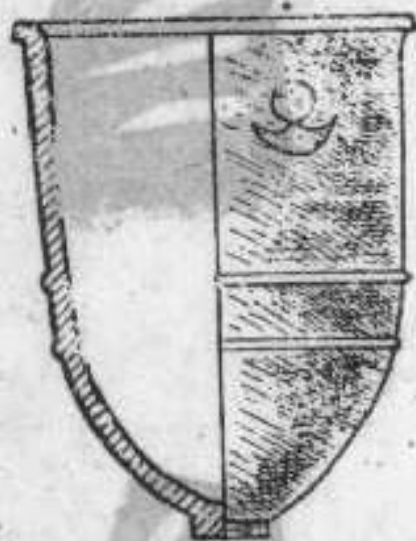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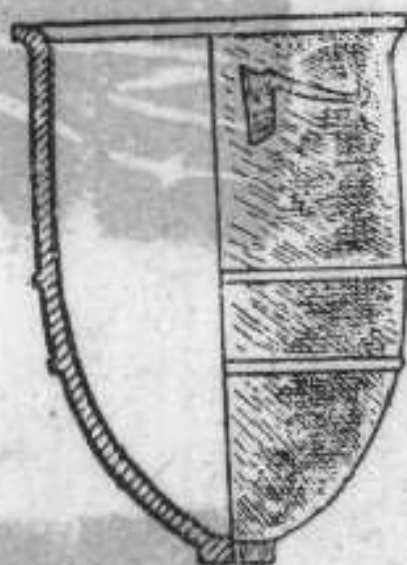
3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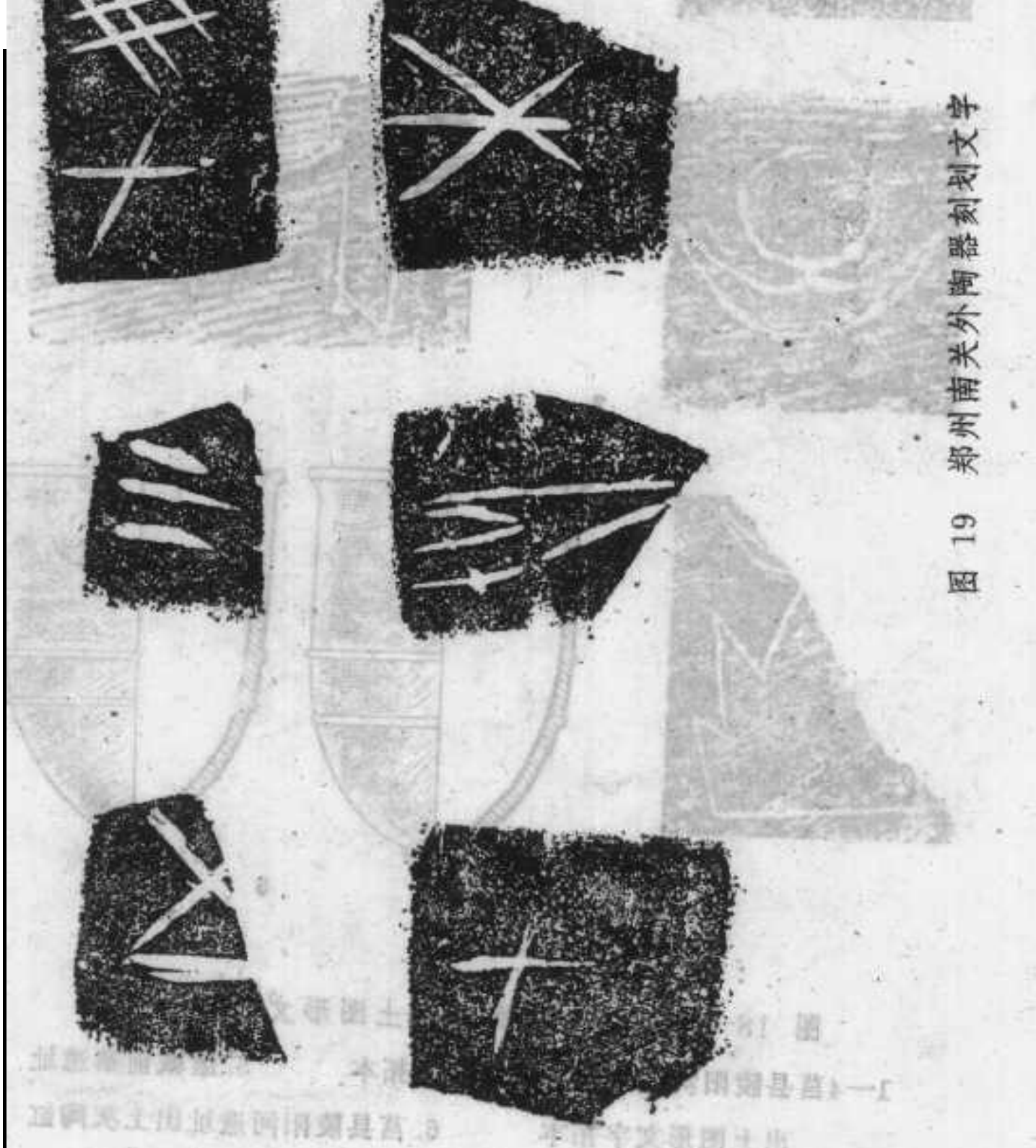
6

图 18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图形文字、灰陶缸
1—4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图形文字拓本 5. 诸城前寨遗址
出土图形文字拓本 6. 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灰陶缸



4

图 19 郑州南关外陶器刻划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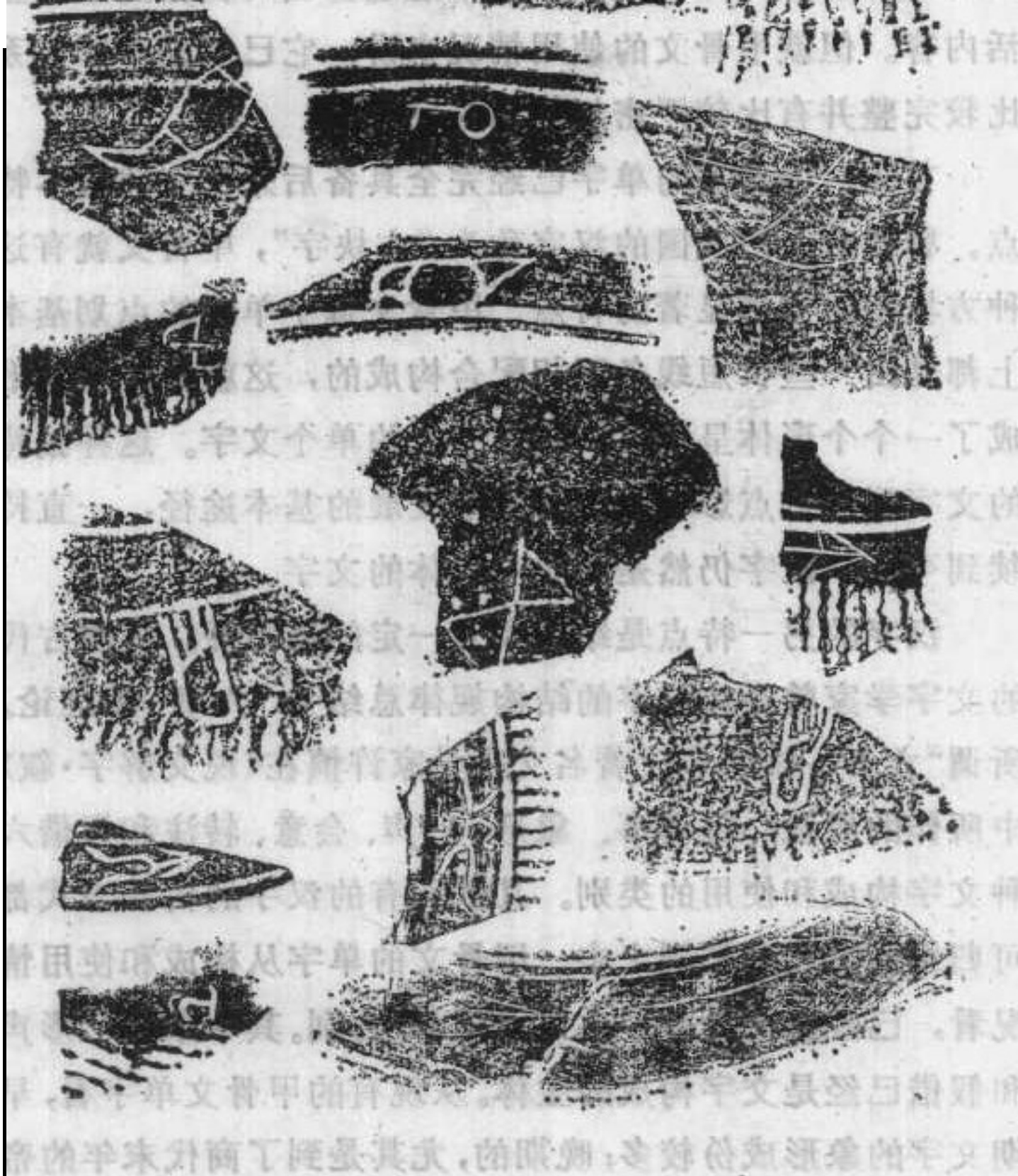


图 20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刻划文字

上述陶器上的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既无完整的体系，也很难看出规律来。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材料而言，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

根据学者们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相重复的单字四千五百个左右。这些单字并非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因为甲骨文只是记录占卜活动有关内容的文字；虽然卜辞中涉及到的内容极为广泛，但还远远不能包罗当时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

但就甲骨文的使用情况来讲，它已经是一种体系，比较完整并有比较严密规律的文字了。

首先，甲骨文的单字已经完全具备后来汉字的基本特点。。曾经有人把我国的汉字称为“方块字”，甲骨文就有这种方块字的非常显著的特点。甲骨文每个单字的点划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长短线条互相配合构成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形体呈现方块或长方块的单个文字。这种独特的文字形体特点影响着以后汉字发展的基本途径，一直持续到今天，汉字仍然是方块字形体的文字。

汉字的另一特点是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我国古代的文字学家曾经将汉字的结构规律总结为“六书”的理论。所谓“六书”，按照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作的界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六种文字构成和使用的类别。几乎所有的汉字的构成方式都可归纳到这六大类别之中。甲骨文的单字从构成和使用情况看，已经完全具备了这六大构成类别。其中象形、形声和假借已经是文字构成的主体。从现有的甲骨文单字看，早期文字的象形成份较多；晚期的，尤其是到了商代末年的帝乙、帝辛时代，象形字的比例渐少，形声字增多，许多字的形体结构都已基本定型。甲骨文与后来的西周金文、小篆、直至今天所使用的楷书形体，基本上是一脉相通、依次发展下来的。下面我们选取一些常见字的不同时代的形体(表一)，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彼此相承的关系。

表一 甲骨文、金文、小篆、今楷字形对照表

甲 骨 文	金 文	小 篆	今 楷
			大
			中
			小
			多
			少
			東
			西
			南
			北
			元
			兄
			先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由于甲骨文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形声字，一些相当于后来汉字偏旁部首的构字成份也开始形成并逐渐定形化。例如，下面的每一组甲骨文单字都包括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构字成份(表二)。

表二 甲骨文构字成份及其构成单字





















构字成份	构成单字字例
人(人)	𠂔(企) 𠂔(千) 𠂔(元) 𠂔(先) 𠂔(及) 𠂔(此) 𠂔(北) 𠂔(任) 𠂔(保) 𠂔(休)
止(止)	𠂔(步) 𠂔(之) 𠂔(出) 𠂔(各) 𠂔(正)
𠂔(𠂔)	𠂔(陟) 𠂔(降)
木(木)	𠂔(析) 𠂔(杞) 𠂔(林) 𠂔(楚)
牛(牛)	𠂔(物) 𠂔(牢) 𠂔(牡) 𠂔(牝) 𠂔(牝) 𠂔(告)
宀(宀)	𠂔(室) 𠂔(室) 𠂔(室) 𠂔(室) 𠂔(室)

	告(告)
冂(内)	宅(宅) 宰(宰) 宫(宫) 宗(宗) 室(室) 家(家)
女(女)	妇(妇) 妃(妃) 好(好) 娶(娶) 娠(娠)
酉(酉)	奠(奠) 尊(尊) 酒(酒)
水(水)	清(清) 洹(洹)
示(示)	柝(柝) 福(福)
隹(隹)	获(获) 崔(崔) 观(观) 难(难) 旧(旧) 迁(迁)






















甲骨文除了上述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现代汉字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一些经常出现的由两个单字结合构成的名词、习语、数词或数量词组合，每每采取写在一起的合书形式，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单字。这种合书的形式，学者们称之为“合文”。例如，商王的先公和先王的庙号常常写作下面的合文：

田(上甲) 𠂔(报乙) 𠂔(报丙) 𠂔(报丁) 𠂔(示壬) 𠂔(示癸)
 𠂔(大乙) 𠂔(大丁) 𠂔(大甲) 𠂔(大庚) 𠂔(大戊) 𠂔(中丁)
 𠂔(祖乙) 𠂔(祖辛) 𠂔(祖庚) 𠂔(小辛) 𠂔(小乙) 𠂔(武丁)




















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名称和习语写作下面的合文

 (后母)  (王母)  (小母)  (多母)  (小示)
 (小帝)  (小王)  (小臣)  (小风)  (小雨)
 (受佑)  (引舌)  (上下屯)  (黄牛)  (人方)
 (之日)  (上下)  (下上)  (翌日)  (正月)

又如，十以上的数字常常写成以下合文形式：

 (十三)  (十五)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二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八百)  (九百)  (二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六千)  (八千)  (三万)

另外还有一些数词和量词结合的词语，也往往采用合文的形式，例如：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旬)  (四旬)  (三祀)  (五宰)  (三牛)  (十五伐)  (十畎)

上述这些合文字虽然是由两个或三个(例如“十五伐”)单字组成的，但看起来则完全象一个字。我国古代的汉字书写历史中，这种合文的书写形式曾经流行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甲骨到西周金文、直至秦汉简牍，几乎都有这种合文的书写形式。这也是古代汉字的一个特点。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甲骨文已是一种具有比较完整体系和有相当严密规律的文字，并且基本上具备了后来汉字的种种特点，称它为现代汉字的鼻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三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工作，如前所述，是从王懿荣开始的。王懿荣是当时长于金石学的著名学者，在清末的朝野士大夫中，尤其是在山东缙绅中声望甚高。凭借他的特殊地位、雄厚财力和较高识力，他在认识到甲骨文的性质和价值后，立即开始积极购求、收藏。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天，王懿荣最先从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处买到12片甲骨，每片二两银子。第二年(1900年)春天，范维卿又带来一百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得了许多银子。稍后，王懿荣又用二百两银子从范维卿手中买到800多片甲骨。此外，王懿荣还曾用一百多两银子从山东潍县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手中买到几百片甲骨。就这样王懿荣在短短的一年内，先后以重金高价购求，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1900年秋天，王懿荣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自尽。他所辛勤搜集的上千片甲骨被抛置一边，无人问津了。

王懿荣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后来都转归到刘鹗手中。

刘鹗(图21)，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即精通数学，曾行医经商，都不得意，转而弃商从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在河南郑州附近决口，黄水泛滥成灾，清政府派吴大澄治理黄患，刘鹗以捐官投效吴大澄门下，以同知身分参预治理黄河事务。由于他精通数学，长于设计和计算，并能和民工一起操作，在治河中立功，由同知升知府入北京候补。到北京后，他体察当时的国家情势，认为扶衰振弊，应从兴造铁路着手，用实业振兴国家。于是他上书光绪皇帝，建议修筑津(天津)镇(江苏镇江)铁路，又请求与欧洲人合作开发山西铁矿，竟遭诬陷，被人指控为汉奸。刘鹗还能写小说，以讥讽清末官场丑态著名的《老残游记》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者。他参预治河时所投效的吴大澄就是当时名声极大的金石学家。刘鹗到北京作候补知府后，又和王懿荣交往很深。他在王懿荣处看到甲骨，深为惊奇，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王懿荣死难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懿荣的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父债，出卖家中所藏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甲骨买去。在这之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就已经开始搜集甲骨。后来他又从方药雨手中买到范维卿卖给他的300多片甲骨。同时，刘鹗还曾通过古董商人赵执斋买到甲骨3000多片。此外，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赴河南搜集到1,000多片。就这样，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总共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从他搜集到的甲骨中，精选拓印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问世。这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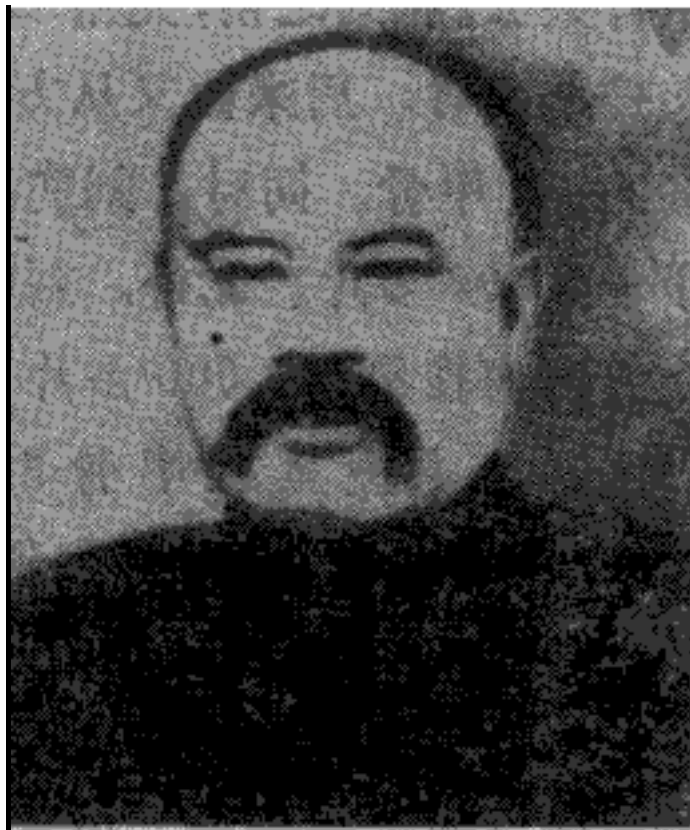


图 21 刘 鹗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古代文物时，因他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曾为救赈北京饥民向俄军购买他们所占的太仓中储藏的大米，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流放途中，刘鹗郁郁寡欢，悲愤而死。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到的甲骨随之四散，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在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此外，商承祚、束世澄、陈中凡、王澐、沈维钧、郇承铨、胡光玮和胡厚宣等几位学者，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总之，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以刘鹗搜集到的最多，然而在他死后，也分散得最零乱。

王懿荣、刘鹗之后，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方面，做工作最多的当推罗振玉(图22)。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新学兴起时，罗振玉曾趋奉时风，先后在上海创立“学农社”、“东文学社”，并编辑出版《农学报》和《教育世界》等杂志。但他更为擅长的却是考究古代文物和研求金石文字之学。凭借他对古代文物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兼做一些古董生意。就在王懿荣开始搜购甲骨文的那一年(1899年)，罗振玉也听到有关甲骨文的消息，但直到两年之后(1901年)，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他才在刘鹗家里看到这些拓本。刘鹗正是在他怂恿之下才编印了《铁云藏龟》一书。刘鹗印行此书时，罗振玉还根据他当时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理解，为该书撰写了序文。罗振玉自此便对甲骨文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移官北京后，利用经营古董生意的积蓄，开始积极搜购甲骨，通过古董商人陆续买到不少。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一大批甲骨，于是他便留意打听甲骨文的真实来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古董商人又由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才设法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与此同时，他又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由于罗振玉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而又深感这种珍贵的文物正在修遭破坏，日渐濒临毁灭，急需抢救，他便四处委托古董商人到河南尽力收购甲骨。仅在1910年一年内，他即从山西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手中买到甲骨10000片以上。但他仍然不满足，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等人亲自到小屯找当地农民挖掘，得到了更多的甲骨。



图 22 罗振玉

罗振玉搜集到这些甲骨后，从中选出比较精美并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约3000多片，拓制成拓本，依照刻辞的内容性质分为八类，编为《殷虚书契前编》一书，共二十卷，先在《国学丛刊》第一、二、三册上，以石印方式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逃亡日本，《国学丛刊》停刊，《殷虚书契前编》的刊行也暂时停顿。罗振玉逃往日本时，曾将他的全部甲骨收藏带走，途中几经波折，损坏约在一半以上。到日本后，罗振玉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重新编为八卷，于1912年用照相制版印出。1914年，罗振玉又在他所藏的甲骨文中选取最精美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拓墨精印成书。这就是甲骨著录书中印制最讲究的《殷虚书契菁华》。

1915年春天，罗振玉由日本回国，曾亲自跑到河南安阳小屯去考察殷墟的实际情况，写出《五十日梦痕录》一书。随后，他又在1916年将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甲骨以及旧藏的甲骨和殷墟其它的出土器物汇为

一编，编印为《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

此后，罗振玉又到日本将以前未拓印的甲骨再加挑选，选出比较精美的约1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后编》一书。后来，罗振玉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种种方法搜集到国内其他人收藏的甲骨文的拓本，从中精选出2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续编》一书，共分六卷。在解放前，除了中央研究院所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外，罗振玉所编的这几部甲骨文著录书，可说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罗振玉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甲骨出土地和包含年代的确定。由于罗振玉接触到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又具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识力，他在很早就对甲骨的内容、性质作出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并努力去探求它的真实出土地。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安阳小屯一带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废都的着法。191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安阳小屯一带是商王武乙到帝乙之间的都城故墟。这样，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而且第一次把甲骨文所包含的历史年代由以前笼统讲为“夏殷”时代缩短到了商代晚期武乙至帝乙三代商王统治的时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为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有关问题、尤其是把甲骨文包含的历史年代确定在从盘庚到帝辛(即殷纣王)的大约二百七十三年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诱发作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和包含年代，应当是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

罗振玉甲骨文收藏极富。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约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分别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前面已经讲过，和王懿荣约略同时接触并开始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他们最初搜集的甲骨大约不过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对甲骨文兴趣很大，陆续在北京、天津两地先后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他也选出一部分较好的，拓印成书，编为《簠室殷契徵文》一书印行。王襄所藏的甲骨解放后全部送归文化部文物局收藏。

早期搜集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还有清末大官僚端方。他仅在1904年一年中，就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1000片左右。端方所藏的甲骨后来也多散失，他的后人手中可能还保存有一些。此外，先后经过古董商人之手买到甲骨的，还有徐坊，他约购得1400片，后又卖给燕京大学，由容庚、瞿润缙编成《殷契卜辞》一书。又有黄心甫，也曾买得600片左右，但后来又卖掉，其中一部分的拓本由其子黄浚于1935年收录在《邺中片羽》一书中。另有方地山也买到300片左右，后归其子方曾寿；霍保禄曾买得463片，后来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其他学者如方药雨、沈曾植、王瓘、盛昱、黄仲慧、刘季纓等人，也都先后购得多少不等。而北伐战争中安阳小屯挖出的甲骨，大多都由开封和上海的古董商人转售到了各地学者手中。

以上这些人，在甲骨文资料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都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在甲骨文研究的发展史上，应当有其一定的地位。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四 甲骨文的流散国外

就在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文之后不久，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对甲骨开始注意并进行搜集。例如，1903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库寿龄，在潍县合伙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许多甲骨，并把其中的400片转卖给了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同时又把另外的79片卖给了英美教会在潍县合办的广文学堂校长柏根，后又转归英美教会在济南所办的广智院（解放后改为自然博物馆）。这些甲骨曾先后由英国人吉卜生和加拿大人明义士分别摹写发表，后来又由方法敛编为《甲骨卜辞七集》于1938年出版。此后，方法敛和库寿龄还陆续搜购到许多甲骨资料。1906年春天，方法敛从他所买到的甲骨中选取了119片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出土的珍贵甲骨资料从此开始流散国外。这批最早流散国外的甲骨曾经由白瑞华部分著录在《甲骨卜辞相片》和《殷虚甲骨拓片》两书中，后来又由方法敛发表在他的《甲骨卜辞七集》一书中。

方法敛除了上述转卖活动之外，还曾在1908年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在山东代购甲骨，一次就有800多片。这部分甲骨资料后来由方法敛摹写印成《金璋所藏甲骨卜辞》一书。1909年，方法敛又将他所购到的438片甲骨转卖给美国的卡内基博物院。1913年，方法敛还曾将他所买到的4片较大的甲骨转卖到了美国的菲尔德博物馆。与此同时，库寿龄也在1909年将他买到的760片甲骨转卖到苏格兰皇家博物院。1911年，库寿龄又将他和方法敛合买的485片甲骨转卖给了英国大英博物院。这些流散到英国和美国去的甲骨，后来曾由方法敛以摹本编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在中国出版。

此外，还有一位德国人威尔茨也在青岛买到711片甲骨，后来又转卖到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另一位德国人卫礼贤也曾从青岛买到72片甲骨，后来转卖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人种志博物馆和德国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据我国甲骨学家的统计，早期由欧美人转购流散到国外去的甲骨，至少也有5000片以上。

最早在中国开始购买甲骨的日本人是在天津《日日新闻》报担任主笔的西村博。其次是三井源右卫门，在罗振玉派人到安阳搜集甲骨之前，他就派专人到安阳收购甲骨，他先后共搜购甲骨约在30000片以上。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交往很深的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教堂早在1905年也买到了100片甲骨，当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林泰辅见到后即买了10片。此后，林泰辅又陆续买到600多片甲骨。至1917年，林泰辅把他所收藏的甲骨中比较重要的连同榑古斋所藏甲骨一起拓印成书，编为《龟甲兽骨文字》一书，于1921年以石印方式出版。这是日本人所编著的第一本甲骨文著录书。为了购买甲骨，林泰辅并于1918年亲自由日本到安阳小屯进行调查，得到一些甲骨，回日本后曾将调查所得进行研究，写成《殷虚遗物研究》。此外，1922年日本人大山柏也曾亲自到安阳作过调查。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日本先后购到甲骨的学术单位约有三十多个，私人收藏家也在三十个以上，如以这些公私收藏情况为准，流散到日本去的甲骨总数至少在12000片以上。

外国人中搜集到甲骨数量最大的要数加拿大人明义士。1914年春天，明义士在河南安阳作长老会的牧师，听说小屯一带出土带有文字的甲骨，就开始经常骑着一匹老弱的白马在小屯附近的洹水南岸进行考察。当他了解到这一带确实有带字甲骨出土的情况后，就积极向当地农民购买。最初，他曾买过一些假的大甲骨，是用新的牛骨仿刻的，存放不久就腐朽不堪。后来他转而购买小片，悉心学习，渐渐可以辨别真伪。到了1917年，他已买得甲骨50000片左右，对于甲骨文也有了一定研究。于是，他从买到的这些甲骨中选出2369片，编成《殷虚卜辞》一书，在上海出版。此后，明义士又分别在1923年、1924年、1925年和1926年先后从小屯农民处买到几批甲骨，并从这些甲骨中选拓了1000多片，编成《殷虚文字后编》一稿，后未出版。1937年，明义士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仓皇回国，后又转到美国军部任职。临行前，明义士曾将他所收藏的甲骨选出一部分寄存在加拿大使馆，解放后转归南京博物院。另一部分存在齐鲁大学，解放后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现存山东博物馆。明义士另有一部分甲骨已流散到加拿大，现存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约有3000多片，其中不少是极精美的甲骨

藏品。流散到加拿大的甲骨，除了上述明义士所藏之外，还有一批怀履光旧藏的甲骨及一些碎片，均藏安大略博物馆。总之，流散到加拿大的甲骨总数仅次于流散到日本的，约在7000片以上。

除了上述几批流散到国外去的甲骨之外，先后以各种方式流散到法国、苏联、比利时、瑞典、瑞士、新加坡、南朝鲜等国家的甲骨文资料也有相当数量。

根据我国甲骨学的专家最近所做的最新统计，目前收藏有甲骨文资料的国家共有十二个，流散到这些国家的甲骨文资料总数为26,700片。这些国家收藏的数字大致如下：

日本：12,443片

加拿大：7,802片

英国：3,355片

美国：1,882片

西德：715片

苏联：199片

瑞典：100片

瑞士：99片

法国：64片

新加坡：28片

比利时：7片

南朝鲜：6片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五 从孙诒让到王国维

从1899年甲骨文初次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甲骨学者一般称之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短短三十年年中，中外学者搜集、收藏的甲骨资料已达十万片左右。这一时期拓印成书的甲骨文著录专书有十二种，共公布甲骨文资料9919片。这些书的出版年代与收录甲骨文资料片数大略如下：

- 一、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1058片
- 二、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1912年2229片
- 三、罗振玉：《殷虚书契著华》1914年68片
- 四、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40片
- 五、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1104片
- 六、罗振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4片
- 七、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年2369片
- 八、王国维(原题姬佛陀)：《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655片
- 九、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1023片
- 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1925年1125片
- 十一、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1925年240片
- 十二、罗福成：《传古别录》第二集1928年4片

虽然以上发表的材料还只占当时传世甲骨的十分之一。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材料已大体上公布出来。随着上述甲骨文资料的流传和公布，研究甲骨文的风气逐渐在学者中慢慢形成，终于产生出一门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崭新学科——甲骨学。

最早对甲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当推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图23)。孙诒让，字仲容，晚年又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光绪末年，孙诒让旅居北京时，已是当时声闻遐迩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见重于当世，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推许。此外，他对古文字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几十年之久了。1904年，他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铁云藏龟》，感到非常惊奇，用他自己的话

讲：“自己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 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他凭借对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素养，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把《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材料大体上理出一个头绪。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被学术界誉为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作用的《契文举例》。



图 23 孙诒让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共分十章，各章的篇名为：

月旦第一

贞卜第二

卜事第三

鬼神第四

卜人第五

官氏第六

方国第七

典礼第八

文字第九

杂例第十

孙诒让的这部书虽然只是一部对甲骨文的文字进行极其初步考释的著作，但其中的不少见解却是很有见地的，有些看法甚至至今也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如果考虑到孙诒让是在甲骨文刚刚公布一年的时候，撰写这部书，所看到的材料还极有限，而刘鹗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在当时还仅仅只能称为龟板等的情况，孙诒让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窥破了它们的奥秘，看出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并能按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孙诒让当时所运用的那种以《说文解字》为根据，以铜器铭文作比较证据的文字考释方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的这一方法，对于其后的研究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所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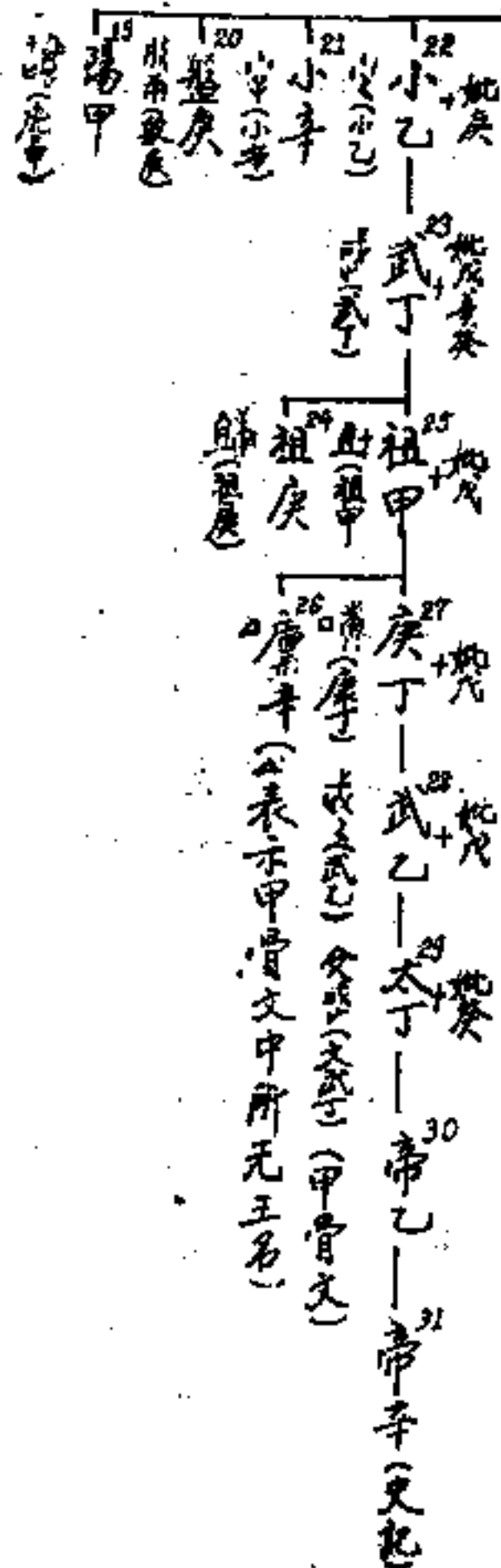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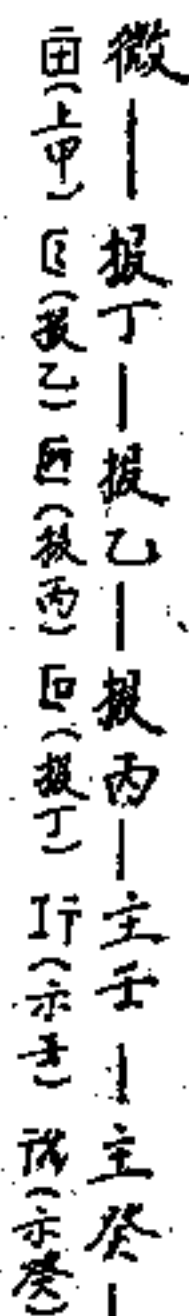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王国维(图24)，是孙诒让之后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又一位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死于1927年。王国维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1898年，正当罗振玉在上海兴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的时候，二十一岁的王国维由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他在汪康年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社担任抄写和校对工作。1898年夏季，《时务报》社关闭，王国维便转入罗振玉的东文学社作庶务，同时开始了日文和自然科学的学习。由于王国维聪明而又好学，不久便被罗振玉看重。1901年，罗振玉为了培养王国维，曾经慷慨解囊资助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年轻人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后来，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时，又请王国维回国担任该杂志的主笔。



图 24 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而又非常刻苦努力的学者。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先后撰写过《叔本华和尼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论著，显露出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学术见解。后来又转攻戏曲、音律，也撰写过名重一时的《戏曲考源》和《唐宋大曲考》等论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研究宋元戏曲的同时，开始帮助罗振玉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从此他和甲骨文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他在发表《宋元戏曲史》的同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并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氏资料拓印为《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就在编印、考释《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同时，王国维撰写并刊行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殷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篇论文和它的续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王国维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除在个别地方与卜辞记载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资料应当改为“王亥”。又如，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王国维根据甲骨文资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据甲骨文资料，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类似的还有《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均被王国维一一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甲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问题，在王国维之后，又有吴其昌、董作宾和丁山等几位学者，继续进行研究和补充，已经基本上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他们根据甲骨文资料整理、订正的商代世系表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大致可以列表对照如下：

表三 商代世系对照表



由于王国维在学术上卓有建树，1925年，他经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授。新的学术环境，使王国维有更好的条件从事甲骨文研究。他先后撰写出《古史新证》和《殷礼徵文》等论著，将甲骨文研究由孙诒让以来的单纯文字考释推进到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阶段。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贡献，郭沫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指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正当王国维准备对甲骨文进一步作更深入的综合研究的时候，由于他深感时代的前进与自己政治思想的保守日不相容，内心异常痛苦，最后只好怀着对旧日封建时代浓厚的依恋之情，投入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尽了。一代学术巨匠就这样匆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王国维约略同时或稍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振玉、丁山等人外，还有武龙章、王襄、商承柞、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玮、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这些人虽然远远赶不上罗振玉和王国维，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都有建树。

此外，这个时期陆续有些外国学者也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金璋、库寿龄、银格兰姆，法国人沙畹；德国人穆勒、勃汉第和日本人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滨纯太郎、石滨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岛佑马、丹羽正义、饭岛忠夫和无关等人。

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甲骨文的研究逐渐展开，相继取得重要成就，终于形成古文字学的一个崭新学科——甲骨学。这就为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文全面研究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六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的全面展开

随着甲骨文的广泛流传和研究者渐多，甲骨文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是也就在这时，甲骨文本身却在遭受着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厄运。一方面，小屯的农民每年都在为了卖钱而到处乱挖私掘，大批甲骨失去了原有的地层关系，与甲骨共存的其他文化遗物全遭毁弃；另一方面，甲骨文又大量流散国外，尤其是明义士几乎将1923年至1926年间出土的成千上万片比较完整的甲骨全部囊括而去。这在学术上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了抢救甲骨文和殷墟文化遗存，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成立，便立即开始了利用现代考古技术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928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派董作宾(图25)前往安阳小屯村调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况。董作宾到安阳后，首先同安阳的彰德十一中校长张尚德、城内古董店尊古斋店主王嘉瑞和城郊小屯附近花园庄私塾老师阎金声等人商谈调查事宜，委托他们代为收购甲骨和访查情况。然后，他又亲自到小屯村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殷墟的甲骨文尚未挖完，还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董作宾的调查结论是：殷墟确有从速进行科学发掘的必要。从此，开始了对于甲骨文研究和现代考古学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殷墟发掘工作。



图 25 董作宾

从1928年10月第一次试掘开始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在这短短十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总共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三次发掘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十二次均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仅在YH127坑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17,000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龟甲约有300多版，创造了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奇迹。总计十五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近30,000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

在殷墟发掘的间隙中，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2月进行过两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3,650片，由关百益选拓800片编为《殷墟文字存真》一书，后又由孙海波选拓出930片，编为《甲骨文录》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室曾经在安阳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后，直到解放前夕，除了陆续发生一些私人盗掘外，殷墟发掘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殷墟发掘工作在开始阶段的主要目的，仍旧在于发现甲骨。后来随着发掘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发掘经验的丰富，虽然也逐步注意到铜器、陶器、骨器、蚌器、象牙器和玉、石器等其他文化遗物以及建筑基址和墓葬等，但投入注意最多的仍然是甲骨文；在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中，有一些人由于从事殷墟发掘而走入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并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后来即成为甲骨文断代和天文年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而在殷墟发掘后期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些则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甲骨学学者。

殷墟发掘对于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甲骨文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在促成甲骨文研究这一根本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董作宾所创立的分期断代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学者发现后，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被考证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殷纣王)灭亡共约273年，经历过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能否根据甲骨文内在的规律将它们分出不同的时期，已经成为甲骨文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早在董作宾之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试图从一些角度着手进行探讨。例如，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于祖先的称呼有所不同，便断定这是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据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辈为阳甲、盘庚、小辛，判定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称谓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他还根据武丁的三个儿子分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断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时代的甲骨文。他的这种依据商王世系和称谓判定甲骨文时代的方法，曾对董作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终于成为董作宾关于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标准。

董作宾对甲骨文开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主要是受到所谓“大龟四版”启示的结果。所谓“大龟四版”，是指1929年12月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四个比较完整的刻满甲骨文的龟腹甲，当时的发掘报告称之为“大龟四版”。董作宾是第三次殷墟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他在对这四个龟腹甲的甲骨文进行考释时，发现其中的一个龟腹甲上，每一条卜辞中在干支之后和“卜”字之前都有一个相当于人名的字，他认为这些相当于人名的字都是当时参加占卜活动问卜的史官名字，他把这些史官称为“贞人”。在这个龟腹甲上总共有六个这种“贞人”的名字。他们既然同出现在一个龟腹甲上，当然应当是同时在商王朝任职的史官，而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当和这个龟腹甲上的甲骨文属于同一个时期。这就是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贞人断代学说。

1933年，董作宾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期断代学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系统提出根据十项标准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图26)的分期断代理论。他的十项标准是：

- 一世系
- 二称谓
- 三贞人
- 四坑位
- 五方国
- 六人物
- 七事类
- 八文法
- 九字形
- 十书体

他所划分的五个时期为：

-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位商王)
-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两位商王)
-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两位商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两代两位商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两代两位商王)





董作宾的这一分期断代方法虽然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但基本上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基础。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以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为经纬的甲骨文分期理论的创立，使甲骨文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视为混沌一片的十多万片甲骨文资料，从此鸿蒙凿破，成为可以划归前后五个不同时期的有条理的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据以探讨甲骨文不同时期文例、字体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据以探讨不同时期的史实、礼制的发展变化，把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就在董作宾从事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同时，大革命后东渡日本旅居的郭沫若(图27)，也开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断代问题。他在编纂《卜辞通纂》一书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与董作宾大体一致的一些看法。他在收到董作宾寄赠给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时，感到董作宾的说法和他的某些见解是相似的，他的一些看法也可在个别地方为董作宾的说法作补充。两个相距数千里之遥的学者能够产生大体一致的看法，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实际上并不在这一方面，而是在于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

郭沫若和甲骨文发生关系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于政治原因东渡日本以后；自此，他便和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晚年仍然兴趣不衰。1929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资料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31年，郭沫若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专门从事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33年，他又出版了《古代铭刻汇考》一书，其中有九篇是专门讨论甲骨文的有关问题的，因此他将这组文章定名为《殷契余论》。同年，他还根据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籍和国内外私家收藏的甲骨文，进行精心挑选、分类编排，并作详尽考释，编为《卜辞通纂》一书，为甲骨文的学习研究者提供了一本极方便的入门著作。1934年，郭沫若又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篇》一书，其中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文章有三篇。1937年，郭沫若又从刘体智所藏甲骨文资料中精选拓印，编成《殷契粹编》一书；同时对于书中收录的资料一一进行翔实考释。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八年间，编写了六七种甲骨文论著，考证出不少甲骨文新字，提出了系列有关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新见解，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学术界把他(号鼎堂)和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并称为为甲骨文研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所谓“四堂”。



图 27 郭沫若

“四堂”之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用力较勤、收获较大的学者，要数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的胡厚宣了。胡厚宣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叶曾亲身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并亲手整理过殷墟发掘所得的绝大多数甲骨文。他不仅为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科学发掘所获甲骨的总集《殷虚文字甲编》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作过释文，而且参加了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所发现的YH127坑出土的17,000多片甲骨的实物整理工作，这些甲骨后来曾是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得甲骨文总集《殷虚文字乙编》的主要内容。胡厚宣在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能充分利用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相传世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对殷代社会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此外，他在甲骨文材料的访求、搜集和流传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因此，他在甲骨学的许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例如，他曾先后解决了商代卜龟的来源、记事文字的类别与意义、商代的农业生产与气象问题、商代的宗法与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状况等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有关“四方风名”的考证与“一甲十癸”说法的考辨更为学者专家称道。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截至解放前夕，胡厚宣共发表、印行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的论著至少有五十四种之多，大多十四种之多，大多都收集在后来获国家科学著作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文集中。日本的甲骨学者曾经称道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是甲骨学“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

从殷墟发掘开始到解放前夕，甲骨学度过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历程，总算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首先是研究队伍的扩

大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中，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已近300人，出版的甲骨文著作已增加到70多种，著录和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已有四万多片，共发表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800多种。其次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方法的日渐科学化。这一时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现。除了前述董作宾、郭沫若和胡厚宣等人的专门著作外，许多学者都出版、发表了重要论著。例如，罗振玉、王国维的弟子商承祚，编印了《殷虚文字类编》一书，开创了将甲骨文按《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辑录成说集为专书这一先例；后来，他又编印、考释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又如，辽宁海城人于省吾于治理经学、小学之余，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形义，先后出版了《双剑（言多）殷契骈枝》初集、续集、三集，其中不少考证很有价值，对于甲骨文的形义源流解说精当，见解颇新。‘再如，浙江秀水人唐兰，除了编印、考释《天壤阁甲骨文存》外，还先后撰写了《殷虚文字记》、《殷虚文字研究》多种，并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对甲骨文的识读、考释方法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另外，河南潢川人孙海波辑录各家成说，将已经释读和未释读的全部甲骨文单字摹写编次，编印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加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则除了编有《甲骨学文字编》外，还编写了《甲骨学商史编》一书。此外，吴其昌著有《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丁山撰写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张政烺作《爽字解》，陈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炜作《甲骨文例》，周传儒写《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陈直著《殷契剩义》，徐仲舒著《未耜考》，余永梁著《殷虚文字考》……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新颖，影响广泛，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此相类似的论著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甲骨学由于殷墟科学发掘的促进，达一时期已经取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甲骨学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甲骨学真正获得新生，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七 新中国建立后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殷墟这一埋藏甲骨文的地下宝库。1950年春天，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还处于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国家就拨出专门费用，恢复了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随后，国家文物部门又将殷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殷墟设立了专门从事殷墟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考古工作站；六十年代，又在该站建立起专门陈列展出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其他文物的殷墟陈列室，供中外学者和广大群众参观学习和研究之用。在这一基础上，停顿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其规模和成就都是旧中国的殷墟发掘工作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随着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建国以后在甲骨文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例如，1950年春季，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殷墟发掘中，在小屯村西边的四盘磨村西地SP4探坑离地三米的SP11小探坑内，发现了一块横刻着三行包括有由数字组成的文字的卜骨(图28)。这些有数字组成的文字被学者称为甲骨文中的异形文字。四盘磨西地甲骨文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这一发现使得人们对殷墟甲骨文出土范围的认识较前更为开阔，学者们发现以前那种认为只有小屯村及其附近一带才出土甲骨文的看法显然是不当的。这一新的认识在以后的殷墟发掘过程中曾经再次得到证实。例如，1958年至1959年的殷墟发掘工作中，在小屯村东北洹河对岸的大司空村又发现过两块带字的卜骨。其中一片是在灰坑114中发现的，是一块整治粗糙、臼角未经切除的卜骨，其正面刻有“辛贞在衣”四个字(图29)；另一片刻有“文贞”二字。这两片卜骨经专家研究，认为都是习刻作品。虽然如此，“辛贞在衣”一片也极富有学术价值。“衣”依甲骨文通例应为地名，过去学者们都认为衣地在沁阳附近，而这片卜骨发现于殷墟范围内，这就使有的学者据以提出“衣”地可能就在安阳附近而与当时的王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新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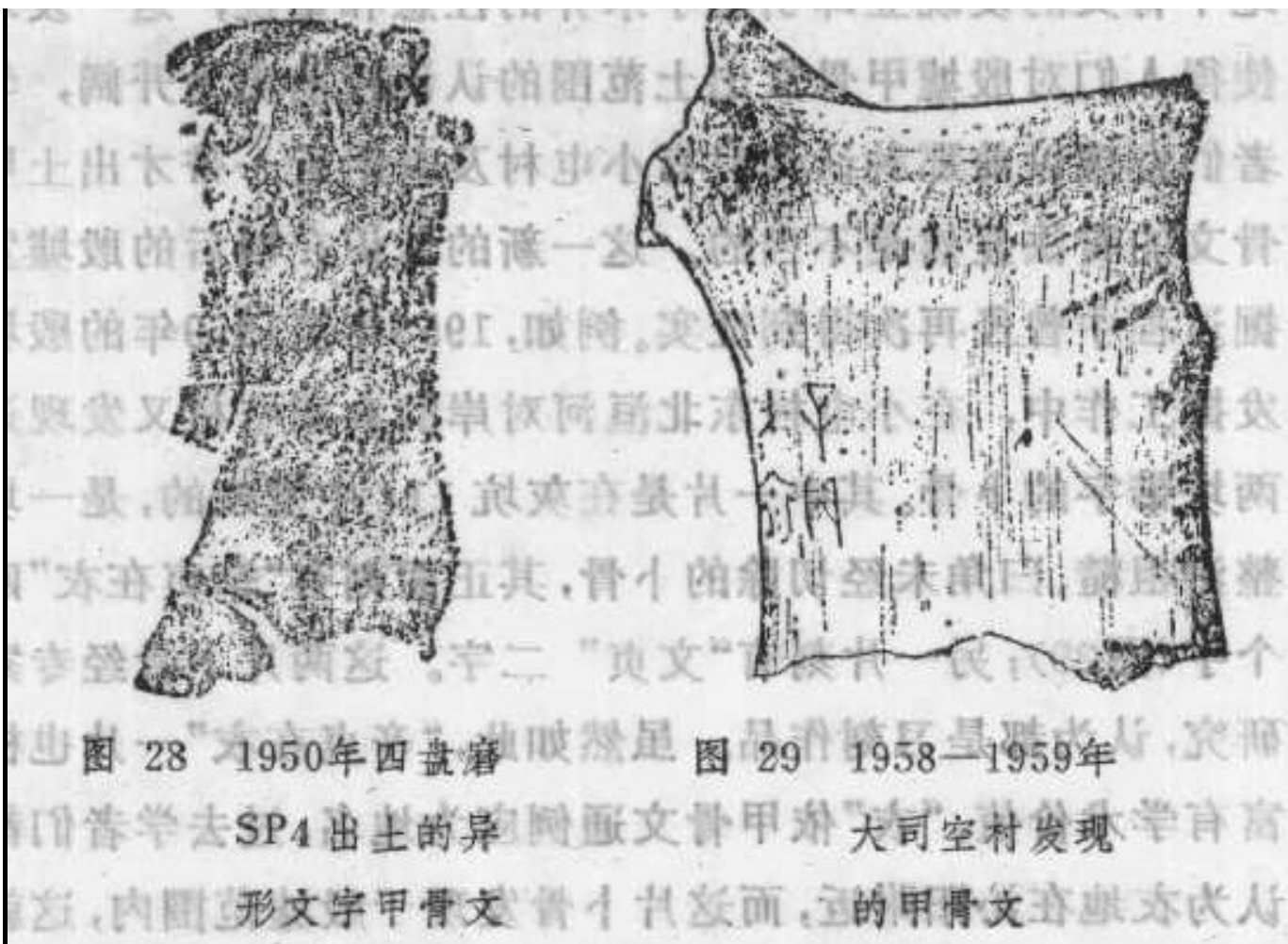


图 28 1950年四盘磨

图 29 1958—1959年

此外，小屯村及其周围也还继续有甲骨文出土。例如，1955年秋季，曾在小屯村的灰坑H1中，出土有一块带字牛胛骨，上面刻有“丁卯。癸亥卜，王其入商，*乙丑王弗每，弘吉”等字(图30)。又如，1971年12月，小屯西地1号探沟内发现21块完整的卜骨，其中有10块刻有文字(图31)。关于这批甲骨文的时代问题，学者间曾经有过较大的争论，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图 30 1955 年秋季小屯 H1



图 31 1971 年小屯西地 1 号探

面，大 出土的甲骨文 甲 沟出土的带字卜骨

建国以后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973年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所发现的一批甲骨。这批甲骨共7,150片，其中有字甲骨有4,829片。这批甲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所刻卜辞的内容也极丰富，几乎广泛涉及到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的又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小屯南地发现的这批甲骨文资料，从时代上讲，除一小部分为第一期和第五期的卜辞外，绝大多数为第三、四期的卜辞，其中尤以第四期武乙时代卜辞为多，康丁、文丁时期的卜辞也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这批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且大多都与陶器有共存关系，这就为甲骨文分期断代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积极制订、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历史文物政策，大量私人手中收藏的甲骨多被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单位陆续征集、收购起来，予以妥善保护，以便为研究人员集中提供甲骨文资料。例如早期刘鹗、罗振玉和哈同夫人所藏的甲骨文，几经辗转，最后都收归浙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旅大市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与此同时，许多文物收藏家和甲骨学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文藏品以各种方式捐献给国家主管单位。例如上海的大收藏家刘体智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8,000多片甲骨文藏品捐给了文化部，后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又如最早的甲骨文收藏家兼甲骨学者王襄，也将自己五十多年中搜集到的甲骨文藏品献给了天津市文化局，后归天津市博物馆收藏。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的甲骨文藏品除了极少数尚在私人手中外，绝大多数都已收归到九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这不仅使过去零散的珍贵文物相对集中起来得到了妥善保管，同时也为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带来了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首先在甲骨文的流传工作方面，胡厚宣一面努力以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作一番新的研究，一面积极从事甲骨文资料的调查、搜集和著录公布工作。他从1951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上、下)、《战后京津所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上、下)等四部甲骨文著录书。在这四部甲骨文著录书中，除了公布了他自己从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收集到的重要甲骨文资料外，还将当时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国内公私收藏的重要甲骨文藏品尽量收录，总共公布了甲骨文藏品13814片，约占段墟历年出土的全部甲骨文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是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在著录甲骨文的体例方面，他也突破了以往已出版的各种著录书的局限，采取了分期分类的编排方法。他把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三、四两期合为一期，从而把全部甲骨文材料分成四期，然后在每期甲骨材料中再依材料的内容性质分为若干门类。甲骨材料经他这样编排后，不仅眉目清晰，而且科学性极强。他所开创的这一著录甲骨文资料的新体例，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国外不少学者在

编纂甲骨文著录书时，也纷纷仿效他的体例。胡厚宣上述四部甲骨著录书的编印出版，是他长期努力访求、搜集、整理甲骨文的结果，其中蕴含着献身于甲骨文研究事业的大量心血。这些甲骨文著录书的印行，不仅使长期沉埋于公私收藏者手中的零散甲骨文资料得以集中刊布，而且使这些凌乱的甲骨文资料得到初步的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胡厚宣之外，还有一些甲骨学者也先后编印了一些甲骨文著录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亚农的《殷契摭佚续编》、郭若愚的《殷契拾掇》(一、二编)、陈邦怀的《甲骨文零拾》等。此外，解放前已经编讫尚未印完的《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也在五十年代初期分别在我国台湾和北京出版。

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先后出版过许多种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董作宾和严一萍曾于1956年编印了《殷虚文字外编》，饶宗颐于1956年编印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和《巴黎所见甲骨录》，并于1959年编印了《海外甲骨录遗》，又于1970年编辑出版了《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外也陆续编印了一些重要甲骨文著录书籍。例如，日本著名甲骨学者贝塚茂树曾在五十年代末编辑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书，松丸道雄曾于1979年出版过《谢氏瓠庐殷墟遗文》一书。加拿大学者许进雄在七十年代先后编辑出版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两书。美国学者周鸿翔也于1976年编印了《美国所藏甲骨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由郭沫若任主编、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已经陆续编讫出版，使学术界有了一部可资利用的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总集。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全部甲骨文资料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正式出版。这是继《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这部书不仅材料丰富齐全，在编排上还完全按照坑位关系系统编排，并且在每片下面都明确注明出土坑位和地层关系。这就为学者们结合考古资料更科学地研究甲骨学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的另一项成就，是甲骨文的缀合与辨伪工作。甲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由于骨质松脆，甲骨背面经过钻、凿和烧灼，出土时极易碎裂，再加上出土后又屡经转运、转卖和各种人为的损坏，往往一片完整的甲骨几经断裂最后成为碎片，并常常分属几个藏家，弄得身首异处、面目皆非。这种支离破碎的甲骨文碎片，如果不经复原，就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很早就有学者注意把原来同属一片而散在各处的甲骨文碎片拼接在一起，使之复原为一片。这种工作就是甲骨文的缀合工作，它是甲骨文研究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最早注意到这一工作的是王国维，他在1917年曾将《戡寿堂所藏甲骨文字》中的一片与《殷虚文字后编》中的一片加以缀合(图32)，从而发现了自上甲至示癸的商代先公世系次序与《史记·殷本纪》所记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1933年，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又再补缀上一片，使这片甲骨更为完整(图33)。1933年，郭沫若在编纂《卜辞通纂》的过程中，曾经缀合过30多片甲骨，随后又在《古代铭刻汇考》一书中补充了经他缀合的甲骨断片的八个例子。董作宾后来在编写《殷历谱》一书的过程中，又缀合过许多甲骨碎片。这些缀合工作曾经给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图 32 王国维缀合的甲骨文

图 33 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基础上作的新缀合

建国以后，致力于甲骨文缀合工作的学者也有很多。例如，1950年，曾毅公曾将他多年的缀合工作成果汇集成书，编印为《甲骨缀合编》，共收录已缀合甲骨396片，取材于32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其中不少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比起他在解放前出版的《甲骨（上双下双）存》一书，规模要大得多。《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两书所收录的甲骨资料，虽然都是解放前殷墟发掘所得的科学发掘品，但它们在出土之后屡经周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搬运，其中多数原来比较完整的甲骨都已破碎成为失掉原有联系的碎片，这种状况曾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使这些失去联系的甲骨碎片重新会合，郭若愚曾经精心拼接，缀合出324片。随后，曾毅公、李学勤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拼合，缀合出郭若愚尚未缀合的甲骨158片，并于1955年汇合三家缀合结果，印为《殷墟文字缀合》一书，共收录缀合甲骨482片。

另一位对甲骨文缀合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的是台湾学者张秉权。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根据实物对《殷虚文字乙编》中所收录的YH127坑出土的甲骨碎片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出较完整和较大的甲骨300多片，先后编为《殷虚文字乙编》上辑、中辑和下辑共6册，分别于1957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67年和1972年在台湾印刷出版。还有一位台湾学者屈万里，对《殷虚文字甲编》进行了拼接缀合工作。他除了纠正了《殷虚文字缀合》误拼的一些错误外，又新缀合了106片甲骨。这些成果收录在他在1961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一书中。此外，原在台湾后又旅居美国的严一萍，也于1975年编印了《甲骨缀合新编》一书，全书共十册，总共收录已缀合的甲骨资料700多片。他还专门将以往误拼错缀的甲骨加以订正，印为《甲骨缀合订伪》一册。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缀合工作在最近一些年来，又有新的异军突起，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文试验工作的展开。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到现代生活，1973年国外有人开始尝试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甲骨文进行缀合。1974年，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索。根据童恩正、张升楷、陈景春等人的报告，他们选用了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在大连坑出土的263片卜甲和殷墟第四次发掘中E16坑中出土的154片甲骨，编出程序，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缀合试验，结果成功率达到40%左右。虽然从成功率看还不算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开创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甲骨文研究的先例，是甲骨文研究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可喜的先声。

甲骨文的辨伪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甲骨文发现后，随着它的广泛流传和人们的积极搜求，其价值日渐昂贵。商人们为了牟

利，便请人刻制假的甲骨文冒充真品，经过转售而广泛流传。甲骨文的伪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甲骨本身和上面的文字全是假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早期收买的甲骨文，不少都是用新鲜牛骨炮制后刻上文字的假甲骨文。有的则是用殷墟出土的无字骨刻上假字，或用真的甲骨文作底本进行仿刻伪造，或在甲骨上真的字数较少的甲骨文旁边再加刻一些假的甲骨文。例如解放前安阳城内即有一位专为古董商刻制假甲骨文的兰宝光，他所刻制的假甲骨文就欺骗过不少学者。这些伪刻的甲骨文有时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编印的甲骨文著录书中。如果对甲骨文不加鉴别地运用，就会出现以假当真或以真为假的情况，这都会给甲骨文研究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干扰和损失。

早在解放以前，就有不少学者做过一些辨伪工作。例如，郭沫若、胡光玮、董作宾、陈梦家和容庚等人都曾对《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伪刻部分有所辨正。解放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这部书中的有关材料继续进行辨伪工作。

学者间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对其中的第1056片所谓“儿氏家谱”这片大骨(图34)的鉴定意见。五十年代中期，陈梦家、李学勤曾经认为“儿氏家谱”不是伪品，并断定它是武丁时代的家系刻辞。于省吾认为它并非伪品，并据以论证了商代王室和其他贵族的谱牒世系的上限，应在夏末商初之际。最近，胡厚宣论证了这片甲骨系伪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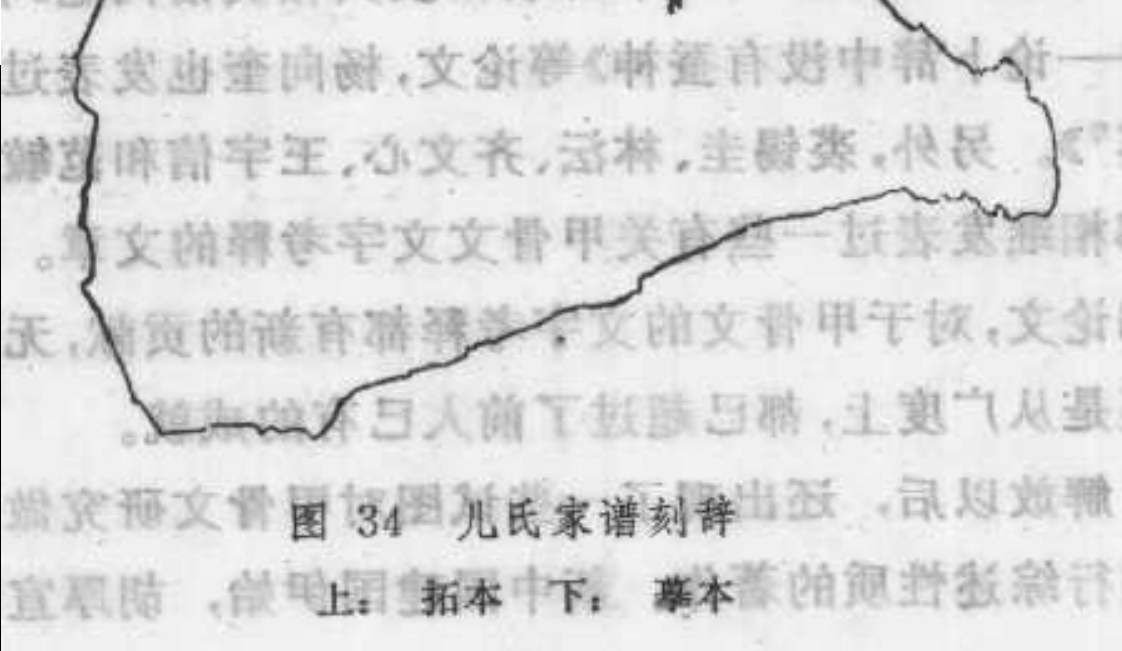


图 34 儿氏家谱刻辞

上：拓本 中下：摹本

对于《甲骨卜辞七集》一书中所收录的孙文澜旧藏甲骨，学者们意见也不一致。1956年陈梦家认为这部分甲骨全是伪刻。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分甲骨非但不伪，而且内容较精。

此外，过去不少学者在谈到我国古代蚕桑史时，大多都以刻在甲骨上的所谓蚕桑图形的甲骨文作为商代已有蚕桑生产的例证。这种刻有所谓蚕桑图的甲骨文共有2片，经考古学专家鉴定，这2片都是伪刻。

上述这些辨伪工作，对于有效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甲骨文文字考释方面，建国以后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新成就。首先是一些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例如，杨树达曾于1954年出版过《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和《耐林廌甲文说L辞求义》两书。朱芳圃于1966年出版了《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收录了他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不少成果。于省吾于1980年将其历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甲骨文的考释成果汇为一编，编印为《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还有不少学者为了深入探讨卜辞内容，更好地发挥甲骨文资料的珍贵史料价值，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释方面进行积极的研究，先后发表过一系列论著。例如，胡厚宣发表过《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释余一人》、《殷代的刖刑》和《说我王》等，张政烺发表过《释甲骨文中俄、隶、蕴三字》、《卜辞袁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和《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等论文，杨向奎也发表过《释“不玄冥”》。另外，裘锡圭、林（水云）、齐文心、王宇信和范毓周等人也部相继发表过一些有关甲骨文文字考释的文章。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于甲骨文的文字考释都有新的贡献，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已超过了前人已有的成就。

解放以后，还出现了一些试图对甲骨文研究做出总结或进行综述性质的著作。新中国建国伊始，胡厚宣就先后编印了《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和《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两书，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甲骨文发现和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1956年，陈梦家用了两年多时间撰写的《殷墟卜辞综述》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对1956年以前六十多年来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比较全面系统总结的巨著。在这部书中，陈梦家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文献材料和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心得，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经过、研究方法和各个分支领域的主要内容与重要问题，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叙述和讨论。全书共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上、下)、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庙号(上、下)、亲属、百官、农业及其它、宗教、身分、总结及附录等二十章，共约75万字。这部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至今仍为学术界普遍重视。

继陈梦家之后，从事甲骨文综述工作的，还有严一萍。他于1978年在台湾编印了《甲骨学》一书，共分九章，各章篇名为：

第一章认识甲骨与殷商的疆域

第二章甲骨的出土传拓与著录

第三章辨伪与缀合

第四章钻凿与占卜

第五章释字与识字

第六章通句读与识文例

第七章断代

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

第九章甲骨学前途之展望

全书长达1,400多页，也是一部系统总结八十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综述之作，对于学习和研究甲骨文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国外也有于些学者从事这一工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1978年编写了《商史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一书。这是由外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对甲骨文发现与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和介绍的英文专著，在学术界受到一致好评；目前被国外的不少学校采用，作为学习甲骨文的必备教材。

1979年，王宇信也编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对三十年来甲骨文研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面介绍。1980年，孟世凯也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殷墟甲骨文简述》，对甲骨文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概况作了简要介绍。总之，上述各种综述和介绍性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甲骨文知识、推动甲骨文研究，都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后，甲骨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另一领域是利用骨文资料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些甲骨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商代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首先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拉开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讨论的序幕。随后，他又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奴隶制时代》等一系列论文，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至五十年代中期，许多学者都先后参加过这一讨论。例如，孙海波于1956年发表了《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一文，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徐喜辰也于1956年发表《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一文，提出了和孙海波大体相似的看法。同年，束世澄在《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中也提出了和孙、徐相近的观点。1958年，唐兰发表《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针对于省吾1957年在《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中提出的商代为军事民主主义说，主张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一书中也持有相似的看法。这些讨论，对于深入探讨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许多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有关商代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根据甲骨文和考古资料，对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探索。例如，胡厚宣于1956年、1959年先后发表《释“余一人”》、《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下)，赵锡元于1957年发表《关于殷代的“奴隶”》，于省吾于1956年发表了《殷代的奚、奴》，又于1962年发表《释奴、婢》，姚孝遂于1960年发表过《“人性”和“人殉”》，胡厚宣又于1976年发表了《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齐文心于1979年发表了《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兼甲骨文“圉”、“戎”二字用法的分析》。此外，郭沫若、李亚农、王承(示召)、王玉哲、斯维至、徐嘉辰、赵锡元、束世澄和陈福林等人，还曾就“众”和“众人”的阶级身分和社会地位进行过一系列的讨论。陈梦家还曾就殷代的官僚机构与官吏组成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讨论。所有这些，对于深入进行甲骨文和商代社会史研究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建国之初就有陈梦家连续发表《甲骨断代学(甲篇)》(1951年)、《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1951年)、《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学丙篇》(1953年)和《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1954年)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甲骨文的分期与断代问题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新看法。胡厚宣在编印前文所述的几部重要甲骨著录书时，合并了董作宾五期分期学说中的第三、四两期，形成新的四期分期法。李学勤于1958年发表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并对这类卜辞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断代意见。于此同时，日本甲骨学家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也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分期断代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研究，把董作宾原定为文丁时期的一部分卜辞划归武丁时代。另外一位对贞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对董作宾的贞人断代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意见。香港学者饶宗颐，也对贞人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出版了专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七十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许进雄，从钻凿形态角度研究甲骨文断代理论，先后发表了《钻凿对卜辞断代的意义》(1970年)的论文和出版了《卜骨上的钻凿形态—断代分期的重要标准》(1973年)的专著。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对T53(4A)探方中出土的七片“(阜去掉十)组卜甲”进行研究后，依据地层关系，否定了董作宾把这类卜辞定为文丁时代的说法，从而确定它们的时代应为武丁时代。甲骨文中有一种字体较大、书法峻峭，贞人名称为“历”的卜辞，学者们称之为历组卜辞(图35)。过去董作宾曾把这类卜辞定为武乙、文丁时代，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对于董作宾的上述说法发生怀疑。例如1976年冬，安阳殷墟五号墓发现后，李学勤根据他对五号墓出土铜器、陶器的分析，认为出现此墓墓主人妇好名称的历组卜辞可能是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的甲骨文。他的这一看法后来经过裘锡圭、林(水云)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于

上述一些问题还有不少看法互异的意见，但总的来讲，已经冲破了传统 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的禁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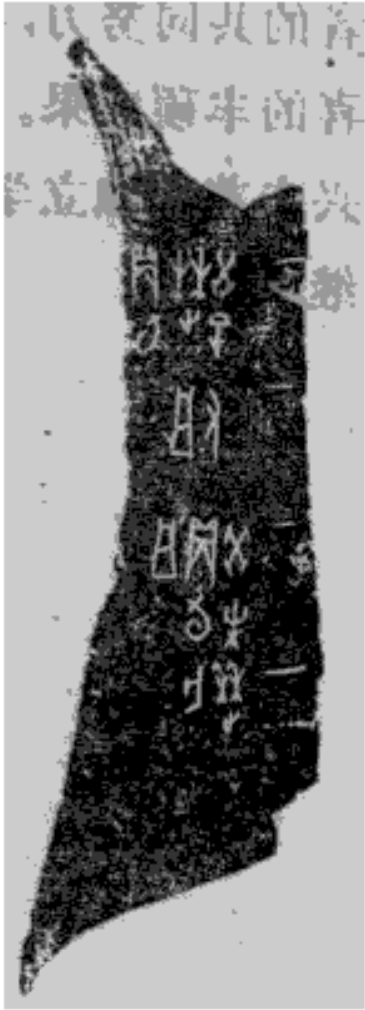


图 35 历组卜辞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又新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大批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新资料，而且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甲骨文研究的许多分支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独立学科，正在逐渐成长、壮大，不断丰富、完善和继续发展。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八《甲骨文合集》的编集及其意义

甲骨文从它在1899年被学者发现到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努力，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学者们普遍感到，在甲骨文的流传、掌握和利用方面，仍有极大的局限性。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甲骨实物大多由私人搜购，古董商人为牟取暴利而随意转购，外国人也乘机涉足其间，许多重要资料或者惨遭破坏，或者流散国外，或长期封藏在私人的箱底秘而不宣，以致于许多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甲骨文资料长期与世隔绝，无法得到利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著录的资料，也因大多是由私人拓印，很多材料辗转流传，造成许多著录书籍互相重复，而且拓印的质量优劣不等，有些资料即使已经印出，也无法加以有效的利用。此外，在这些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刊中，也有不少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而且印数较少，现又分散在各地，有的已经很难见到。这些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因而，对国内公私收藏的甲骨文资料重新拓印、统一挑选、剔出伪片、全面整理、科学地汇编为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久已成为中外学术界深所期望但又不易着手的巨大工程。

1956年，多年来就有志于进行这一工作的胡厚宣、桂琼英夫妇，将他们已开始着手的这项科研课题在中国科学院提出，很快就被列为国家科学研究“1956年至1967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的大型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后来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的组织、编写工作非常繁重，需要动员许多人力，集思广益。为了推动《甲骨文合集》编集工作的进行，国内著名古文字学家会聚一堂，共同讨论编辑计划，同时成立《甲骨文合集》编纂委员会，请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担任全部编集工作。编集工作正式开始于1959年。在编集过程中，工作人员追访祖国各地，先后到过大江南北44个城市，访问90多个收藏甲骨文的单位和40多个私人收藏家，并对他们所藏甲骨进行鉴别、精选和拓印，然后汇合八十多年来国内外已出版和已发表的甲骨文资料以及分散在国内外公私藏家手中的甲骨实物的传世拓本、照片与摹本，进行系统的选片、辨伪、去重、缀合和分期、分类等艰巨、繁重而又细致、认真的一系列工作；历经二十多个寒暑，中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几经波折，时辍时续，终于在1979年完成，并开始出版精选40,000多片甲骨文资料的集大成巨著《甲骨文合集》(图版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极高的声誉。

《甲骨文合集》的图版部分共十三巨册，总共著录甲骨文精品41,956片，系由目前国内外藏品的150000余片甲骨文资料中精选出来的，约占全部现存甲骨文总数的四分之一。《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文资料的基本原则是：“凡甲骨刻辞完全和比较完全的文句(包括省略句)以及辞句虽有残缺而内容较为少见者，一律选录。”因此，凡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体上已被收进《甲骨文合集》中。因而，《甲骨文合集》是一部既不同于全集，也有别于选集的精粹毕集的合集。

《甲骨文合集》的材料来源是非常广泛的。它首先取材于自1903年最早问世的《铁云藏龟》至七十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六十多种中外甲骨文著录书，同时包括各种甲骨文论著所附录的甲骨文材料。其次，它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公私所藏的各种甲骨文拓本、照片与摹本，其中有许多材料是迄今尚未发表的。此外，它还选拓了全国21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少数个人70多处现藏的甲骨实物。这些新拓的拓本，有的和旧拓本相比更为清晰精美；有的则补充了旧著录书上所印拓本经过剪裁、残缺或漏收(如有的甲骨正、反面都有刻辞，著录书只收一面等)的不足；有的则纠正了旧著录书的种种错误。总之，就现存甲骨文资料来讲，经过《甲骨文合集》的编选，可以说基本上被搜罗殆尽了。

《甲骨文合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编排方法上，它既照顾到甲骨文本身时代的先后关系，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全部甲骨文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期分类编排。在纵的方面，它依照目前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材料分为五个时期。在横的方面，它又在每期中依照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四

个大的类别，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其分类原则大体为：一、阶级和国家

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等若干小类。二、社会生产包括农业、渔猎、畜牧等小类。三、思想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气象、医学、祭祀、鬼神崇拜等小类。四、其他包括文字等不宜划归以上各类者。这种分期与分类互为经纬的编排方法，使40,000多片混沌一团的甲骨文资料成为条理分明的科学资料，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甲骨文合集》的编集过程中，全体工作人员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付出巨大的心血。例如，以往的甲骨文书录书材料的互相重复现象非常严重，他们曾对60多种主要甲骨文书录书进行过认真的对重，同时还把新拓的甲骨文书录书与这些甲骨文书录书进行互校。据初步统计，他们在编集过程中，校重复片次有14,000多片次，校出各种重片6,000多片，占《甲骨文合集》所收甲骨文资料总数的七分之一强。经过这一工作，不仅彻底清理了旧的甲骨文书录书的重出现象，同时也为《甲骨文合集》避免出现重片打下了良好基础。又如，《甲骨文合集》还比较全面地进行了甲骨文的缀合工作，他们在前人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工作成果而又大大超越了前人，全书共缀合甲骨文1,600多片。这一工作使得原来残缺零乱的碎片得以复聚，使原来无法通读的许多内容变得通畅明了，从而等于增添不少新的材料。此外，在《甲骨文合集》中，凡是文句相同的卜辞(甲骨学者称之为“同文”现象)，都已按照记载占卜先后次序的数字，从小到大排列，这就不仅使一些原已残缺的卜辞有了补足所缺辞句的机会，同时也体现了原来占卜时的先后次序，便于学者据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甲骨文合集》还将散见于各书之中被分割开的原属同一卜骨的正面、反面与骨臼的拓本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编号来处理，这就使甲骨文原有的面貌更为清楚，内在联系更加明显。

总之，《甲骨文合集》一书无论从材料来源、编排方法上讲，还是从工作的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等方面看，都远远超越了前人。这样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工作，是前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甲骨文合集》的图版部分目前已经编讫出版，释文部分也已基本完成，行将付印。这一大型整理工作的完成，在甲骨学发展史上无疑是树立了一座丰碑。它既是八十多年来甲骨学各项成果的结晶，也是甲骨学开始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迈进的重要标志。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九甲骨文所反映的晚商社会

商代晚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由初步繁荣走向全盛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一直无法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面貌。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感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太少，从而发出过“文献不足”的慨叹。关于商代历史的较为可靠的文献，有《尚书》中的五篇《商书》和《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尚书》中的五篇《商书》，其中《汤誓》的文字比较浅显平易，学者们大多认为它的时代较晚，未足凭信。《高宗彤（rong2）日》、《西伯勘黎》与《微子》三篇文字很短。比较长而可信的只有《盘庚》一篇，总共不过1,283字，并且只谈到盘庚迁殷一件事。而《商颂》五篇，是周代宋人追祀先祖的颂歌，内容也较简单。根据这样的史料来探讨商代的社会历史，当然不免会有“文献不足”的慨叹。甲骨文的发现，给研究商代晚期的社会历史带来了新的契机。尽管甲骨文字句比较简单，形式千篇一律，有些字句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但它毕竟是商代晚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数量有十多万片之多，内容相当丰富，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根据甲骨文来探讨商代晚期的社会历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经过八十多年来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商代晚期的社会面貌已经大体清楚。

首先，从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商王是全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常自称“余一人”，这完全是一种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唯其一人至为至高无上的独裁口吻。商王又利用对上帝的信仰将其王权充分神化。在甲骨文中，上帝是一位至上神，他不但有极大权威，并有人格和意志，主宰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他能命令风、雷、云、雨，决定农业收成，并能降赐人间祸福、护佑国家兴亡、决定军事胜败。‘他也拥有朝廷，并有史、臣供其役使。商王的先祖多被赋予帝的称号，从而被神化为和上帝具有同样权威的上帝。他们也能降临祸福，主宰人间吉凶。甲骨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宰人间的商王向上帝和先祖问卜吉凶的活动记录。商王就是通过这种神秘手段神化他们的王权的。

在商王之下，设置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包括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监狱等。根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商代晚期有数量众多的官吏队伍，依照他们职能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主管事务的臣正(包括“某臣”、“某正”、“某臣正”、“某元臣”、“某藉臣”、“某小藉臣”、“某匕臣”、“小丘臣”、“臣”、“小臣”、“少臣”、“多臣”、“多辟臣”、“尹”、“多尹”、“某尹”、“某族尹”等)，主管军事的武官(包括“马”、“多马”、“亚”、“多亚”、“亚某”、“多(上竹下服)”、“射”、“多射”、“射某”、“卫”、“犬”、“多犬”、“犬某”、“五族戍”、“戍某”等)和主管文化的史官(包括“乍册”、“史”、“御史”、“卿事”、“吏”等)。此外，各个邦族、方国又有“侯”、“田”、“牧”、“卫”、“方伯”等首长和官吏。商王就是依靠这些官吏统治着分为内服与外服的辽阔疆域的。

甲骨文中常有有关“古王事”的记载，是指一些臣服于商王的方国、邦族首领和商王封在外地的臣属、王妇、诺子，为商王服役、从征、戍守等事。此外，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关于商王向方国邦族征收贡物的记载。这都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属关系。

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和征服威慑方国邦族，商王拥有数量巨大的军队。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当时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记载。例如，根据专家研究，仅在武丁时期，商王就对周围方国邦族发动60多次战争，每次征集兵员数字都在3,000人以上，其中最多曾达13,000多人。根据商代末期甲骨文记载，当时有右、中、左三师军队，每师约有10,000人左右。当时的作战方式是车战，乘车作战的是“王族”和“多子族”等贵族武士；一般每车三人，前边为驾驶车辆的御手，左边持弓、矢的为主将，右边持戈的为护卫。车下由徒兵追随，一般由三人组成一组，他们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被征参战的“众”或“众人”，其身分可能为平民。此外，商王还拥有“马”、“射”等特种武装，其中射手常

以300人为一单位。由此可见，当时商王的军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商王还制定了种种酷刑并设立了不少监狱。据专家研究，当时已有“墨”、“劓（yì）”、“宫”、“（非刀）”和“大辟”等所谓“五刑”。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大量关于“刖刑”的记载，“刖刑”是锯掉一条腿的酷刑，当时对于奴隶常常施用这一刑罚，动辄数十人直至百人之多。商王还在各地设有监狱，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商王曾在东对、敦、冰、爻、旁方等地普遍设置了监狱，其中不少是设在边塞地区的。这些监狱，既是监禁奴隶的集中营，也是向中央王朝输送奴隶的转运站，是镇压奴隶反抗的强大工具。

当时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被称之为“羌”的奴隶，他们随时都有被无辜杀害的可能。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捕捉他们并把他们贡到商王朝的记载，还有大量用他们和牛、羊等牲畜一起当作祭品的记录。他们还要从事开垦农田等各种繁重劳动，最终仍然不免惨死于奴隶主手中。

甲骨文中还有关于“仆”的记载，从字形上看，象是一个手中拿着工具在房子里干活的家内奴隶，他们可能是从事家庭劳动的。商代奴隶主对他们的杀戮是非常随意的，甲骨文中有一次祭祀中就屠杀500个仆来作祭品的记载。

此外，被商王用作祭品的奴隶还有“报（去掉提手）”、“奚”、“妾”等多种。杀害他们的方法既有用刀、斧砍杀的“伐”、“（奚戊）”，又有用火焚烧的“（火交）”等多种。每次屠杀的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上百人。

“众”和“众人”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身分名称。关于他们的阶级身分和社会地位，目前还有争议，但从他们在商代所参加的各种活动看，可能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王命令众人进行大规模农业协作生产，和众在小臣的命令下种植黍类作物(图36)的记载，都反映他们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加者。此外，他们还常常被征调参加战争和戍守活动，商王还屡屡卜问他们会不会丧失，这又反映了他们是受到商王的信任和关心的，其社会地位与上述可以随意杀戮的奴隶是完全不同的。



图 36 记载众在小臣命令下
种植黍的卜辞

由于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对广大奴隶和平民进行种种剥削和压迫，奴隶和平民常常举行反抗和斗争。甲骨文中有不少追捕逃亡奴隶的记载。例如，常常有关于“呼追羌及”、“呼追羌执”、“呼追羌获”、“踵羌”、“及奴”、“追仆及”、“踵仆执”等的记载。这些逃亡奴隶一旦被追捕回来，就要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有的被用乱箭射杀，有的则被处以刖刑，有的在被杀戮后还被用作祭品。面对这种迫害，奴隶们不得不进行反抗和斗争，他们或者焚烧仓廩(图37)，或者在监狱举行暴动(图38)。这些反抗和斗争与平民对贵族的反抗和斗争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终于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以阵前倒戈的方式，推翻了商王为首的奴隶主的统治，把我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时期。





图 38 记载羌奴在
殷文骨甲 版地监狱暴
动的甲骨刻
辞

在甲骨文中，还保留有不少有关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状况的珍贵史料。当时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已有多用途不同的农业生产工具。例如，整地和翻土的工具耒和耜，耒是一根尖木棒或下端分叉的尖木棒，在靠近下端处附加一根供足踏的短横木，耜则是固定在耒上的锋刃具。甲骨文中“藉”字，就是人持耒以足踏短横木进行翻土的象形。除草、中耕和收获用的农具，主要有石制的锄、镰和蚌制的凸刃蚌刀和蚌镰，甲骨文中的“薳(ru4入)”、“薳(hao1蒿)”等字，都是手持蚌制工具刈除草木的象形。甲骨文中的“秦”字，是手持杵(chu3)对禾进行加工的象形。甲骨文中又有“田”字，则是土地经过整

修分割成块的象形。当时的农作物也有许多种，从甲骨文看，至少已有“黍”、“稷”、“稻”、“麦”和“（禾来）”等类作物。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当时已有一定的灌溉系统，并有调节土地肥力情况的轮作制，同时还要定期进行土地翻整。当时的农作物可能多是春天播种，一年一熟，播种方法可能为点播或撒播。当时并有一系列的田间管理，如除草、培土、施肥和灌溉等。甲骨文中“贵田”，据专家研究，是用锄或铲一类工具使土壤崩溃松散，同时进行除草并将土壅附在农作物根部的农事活动。又据有的学者推断，当时已掌握溷厕储粪和翻肥的方法，因而已懂得对农作物施肥。一些农史学者还据甲骨文资料推测，当时已有一定的农田灌溉系统，并有一些朴素的植物水分生理知识。甲骨文中“采黍”和有关“廩”的记载，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对农作物的收割和储藏情况。此外，甲骨文中大量关于“求年”、“它禾”和“省黍”的记载，反映着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畜牧业方面，商代晚期已有比较繁盛的畜禽驯养生产。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当时驯养的畜禽已有马、牛、羊、鸡、犬、猪等多种，其中对马、牛、羊、猪的驯养尤为发达。当时的商王几乎每天都要宰杀牲畜作为祭品，每次少则几头、十几头，多则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头。甲骨文中就有商王为了耳鸣进行祭把，一次宰杀158只羊的记载(图39)。此外还有用“千牛”进行祭把的卜辞。由此可见当时的畜牧业是何等发达，牲畜贮备多么丰富。



图 39 记载商王为耳鸣宰杀 158 只羊举行

图 39 记载商王为耳鸣宰杀 158 只羊举行 祭祀的甲骨文(左侧刻辞)

商代晚期的蚕桑业也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关于蚕桑的记载也有不少，据学者们研究，仅据武丁时甲骨文记载，商王命令臣属省察蚕事的卜辞就有九条之多。这就说明蚕桑在当时是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之一。

商代晚期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久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甲骨文中也有有关冶铸情况的记载。例如，甲骨文中记有当时铸造青铜器不是使用铜矿石冶炼，而是直接采用“黄吕”这种冶炼后的铜料的情形。这反映了商代后期青铜冶铸已有炼铜和铸器两种不同的分工。这种情况也为考古材料所证实，例如，安阳苗圃北地的殷墟铸铜遗址中，在10,00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只发现有坩埚、陶范和陶模，而从未见有铜矿石出土。

商代晚期的科学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根据甲骨文记载，当时的人们对于天象已有比较详尽而周密的观察，对于风、云、雷、雨、雹等天气变化已作记录。甲骨文中不但有我国对于心宿二(大火)、新星、南方七宿(鸟星)和木星(太岁星)等星象的最早观察记载，而且还有关于日食和月食的最早记录。董作宾、赵却民、张秉权、张培瑜等学者都曾经对其中的月食记录进行过研究和推算，认为它们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天文现象。

商代晚期的历法也是比较成熟的。根据甲骨文可知，当时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每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一般有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十四个月不等。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般是大、小月相间，有时则有两个大月相连接的“频大月”现象。在历法的置闰方法上，早期一般是把闰年放在岁末，从而形成十三月，有时则要“再闰”，增加一个闰月，因而有十四月现象。祖庚、祖甲以后，闰月开始放在一年中间的七月或八月，这是所谓年中置闰的方法。当时的月名一般以数字表示，但也有用其他名称的，如一月也称“食麦”，二月也称“父(禾玄)”等。当时一个月又分为三旬，每旬十日，每日以干支表示，依次循环往复，并不受月份的限制。当时的年一般称为祀，也有称年或岁的。每年约有353日或354日，闰年则为383日或384日。有的学者还认为，当时已有了夏至的概念。

商代晚期对于一日之内也有表示不同时间阶段的各种名称。甲骨文把从日出到日没的白天称为“日”，从日没到日出的夜晚称为“夕”。日又分为上午的“明”、“旦”、“朝”、“大采”和“大食”，中午的“中日”、“昼”和下午的“昃”、“小食”、“小夕”、“暮”和“昏”等。可见当时的历法是非常细密完备的。

商代晚期对于人体和疾病的知识也很丰富。根据胡厚宣研究，当时记录在甲骨文中的疾病已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疾病，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今天的内、外、脑、眼、耳鼻喉、口腔、泌尿、妇产、小儿和传染病等主要医学分科的知识。此外，还有关于“心疾”和“疾肘”等病的记载，相当于今天神经系统和疔肿等病患。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关于“龋齿”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龋齿记录，比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同类记载要早七至十个世纪。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关于“疾言”的记载，可能是因口腔疾病或咽喉患病影响到语言上产生障碍的病状记录。上述种种有关人体各种疾病的记载，都是当时人们长期同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案记载，是研究世界医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史料。

商代晚期在数学方面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知识。甲骨文中有了以1为基本单位的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并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位单位和概念。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

在牲畜驯养技术方面，商代晚期也已具有比较高的水平。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相马、执驹、攻特等技术的记载，并且出现了原始的马医。

此外，在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蝗灾记录(图40)，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危害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灾害有了一定的认识。

总之，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晚期社会生活是极丰富多彩的。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不但在整个古代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后世的科技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它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极好证明。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十殷墟以外的甲骨文

除了殷墟之外，解放以后先后在我国的河南郑州二里岗、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和扶风齐家村等地，都曾发现过一些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这些新的发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

河南郑州二里岗，是一处商代中期文化遗址，它的时代早于殷墟文化并与殷墟文化相衔接。1952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训练班在当地发掘时曾发现卜用兽骨375片，卜用龟甲11片，但未发现文字。有字甲骨是河南文物工作队后来在这处遗址中发现的。

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共有3片。其中一片是1953年4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在被翻动的地面上找到的。这是一片牛肋骨，上面刻写的是练习契刻的十个字(图41)，文字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体相似，有人认为可能和殷墟甲骨属于同一时期。另外一片是1953年9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在CIT30探沟内发现的，这是一片呈扁圆状的牛肱骨骨片，出土于离地面半米左右的地层中，它的一面为平底，一面凸起，在凸起的一面刻着一个“有”字(图42)，是殷墟甲骨文中常见的字。第三片是1954年4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发掘时发现的一条带有小孔的薄骨片，上面也刻有一个字。专家们认为，上述三片甲骨可能是王室以外的贵族日常使用的卜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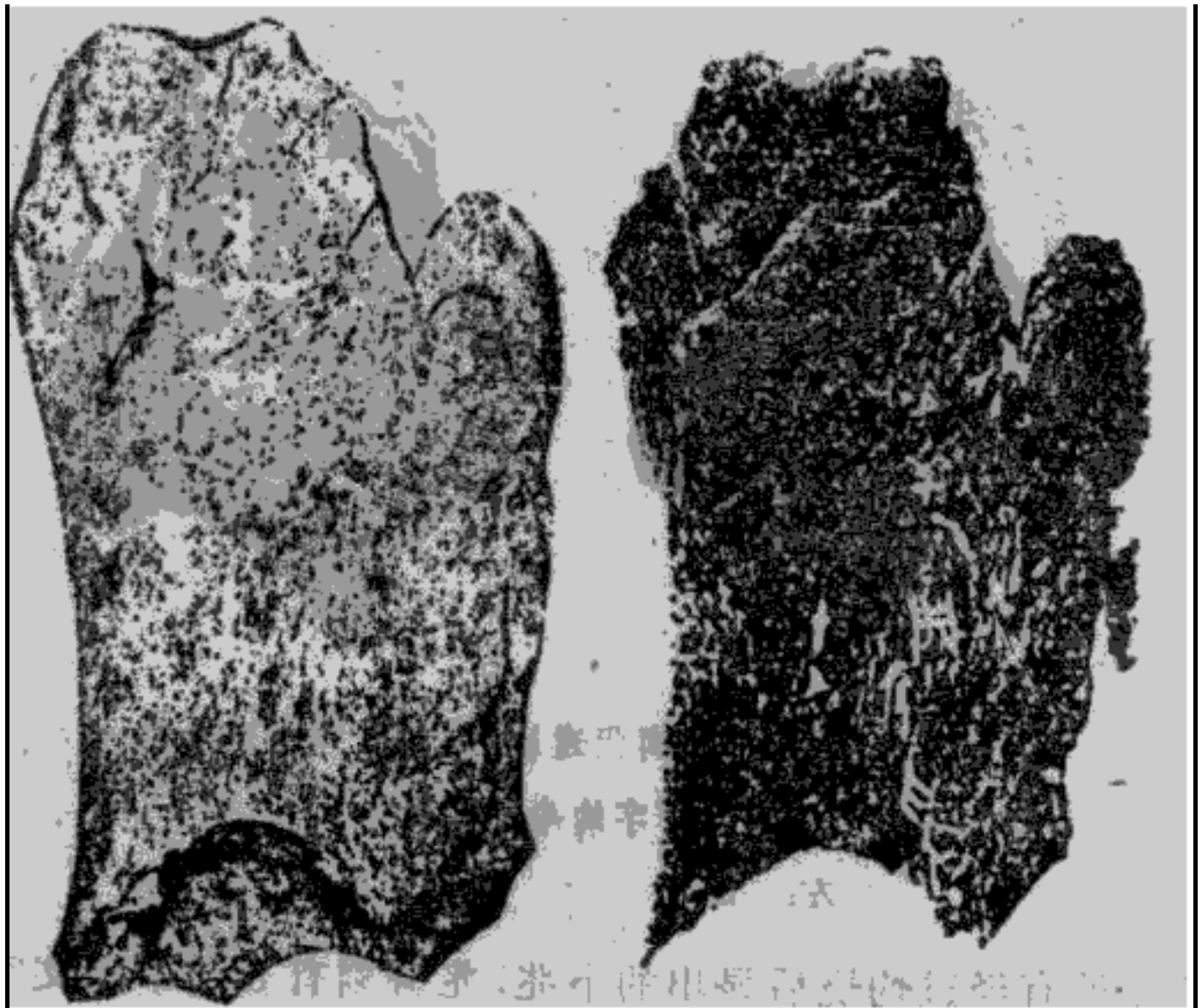


图 41 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练习契刻的甲骨
左： 照片 右：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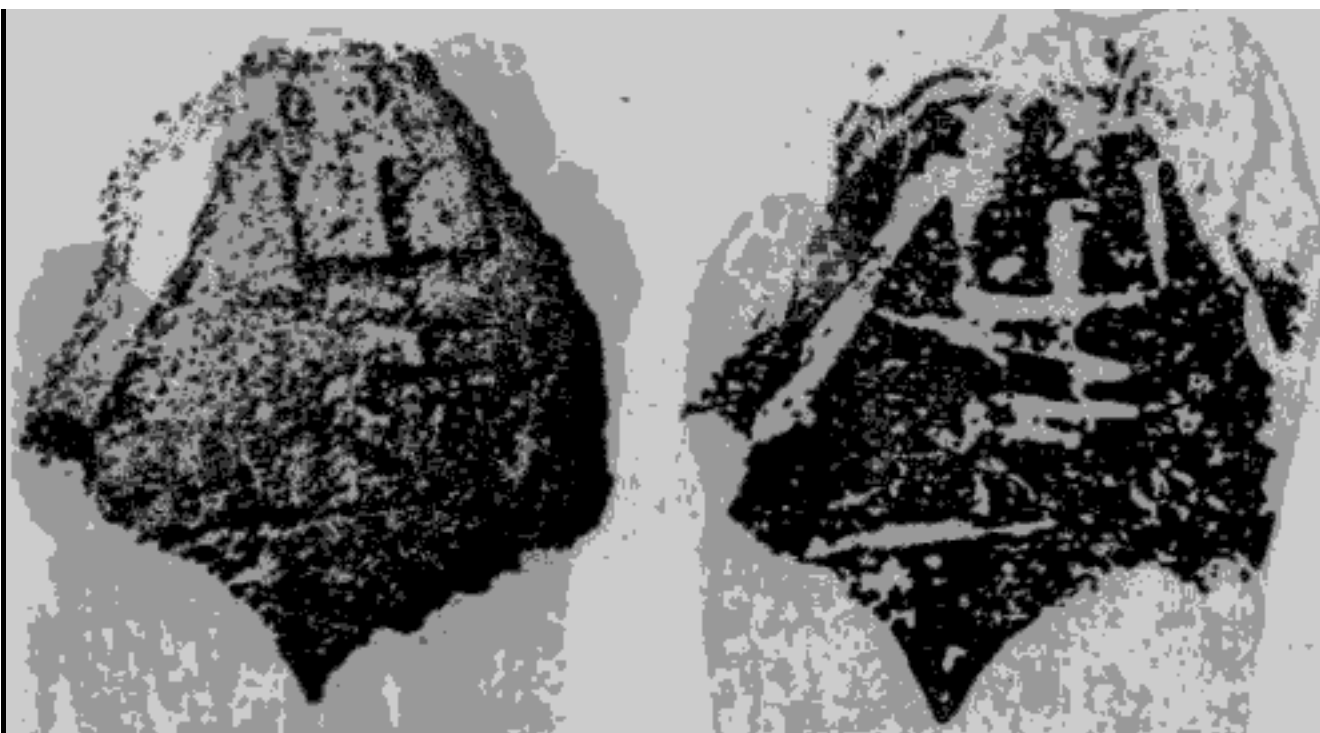


图 42 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 CIT30 探沟出土的
刻有“里”字的牛肱骨骨片

左： 照片

右： 拓本

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有字甲骨，人们开始认识到甲骨文并不限于商代才有。洪赵坊堆发现的有字甲骨仅一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臼处有钻窝16个，不规则排列成数行，中下部靠近左边处另有钻窝5个，形成纵列一行。卜骨正面相当于背面钻窝处有经过灼烧后显出的卜兆，兆旁刻有8个甲骨文字。对于这片甲骨的时代，学者间曾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春秋或更晚时期的东西，有人认为应属西周初期。

继上述发现后不久，1956年1月，陕西文管会又在西周的京畿腹地长安丰镐遗址的张家坡，发现了西周的有字甲骨。这是一块肩胛骨的柄部，背面靠边处有三个钻窝，钻边有极细的凿孔，正面相当于钻凿处均有卜兆，卜兆附近并刻有极细的两行文字，一竖行，一横行。随后又在同一地区发现过另外一块兽类肢骨，其上部相当于钻孔的正面，也刻有字划极细的文字。据统计，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先后共发现3片有字甲骨，共刻有30字。

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周初燕国墓地也出土了两批甲骨。其中一批出土于一座墓葬的人骨左上方，共10片，全是卜甲碎片，有腹甲也有背甲；其中刻有文字的共2片，分别刻有“贞”和“不止”等字。另一批出土于另一座墓葬的椁室右侧中部，约有100多片，均为卜甲残片，腹甲、背甲兼有；其中刻有文字的共3片，一片刻有“其祀”二字，一片刻有“其尚上下韦馭”等字，另一片刻有“央告”等字。这一遗址共出土有字甲骨5片，共有13个文字。

以上几处周代甲骨的发现，使人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大为改观。人们看到，不仅在西周的京畿地区有甲骨文出土，而且在周的晋、燕等封国也有甲骨文发现。能否发现更多的西周甲骨文呢？1977年春天，考古工作对此作出回答。陕西省周原考古队的考古工作者，在对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西周宫殿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清理时，在该基址的西厢房2号房基内的H11和H31两个窖藏中发现了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F甲16,700多片，均为龟腹甲；卜骨300多片，均为牛肩胛骨。这批甲骨经过清洗整理，共发现有字甲骨289片，总共刻有903字，其中合文字12个(图43)。这批甲骨大多数为周初卜甲，也有少数在灭商以前的

商代晚期；刻辞内容极其丰富，广泛涉及到灭商以前到西周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批甲骨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重视，有关周原甲骨的讨论和研究从各个方面迅速展开。例如，有一些研究人员对这批甲骨的字形、孔型和刻辞中的人名、宫名、方国名、地名以及有关周初历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根据这批甲骨资料，结合殷墟甲骨文中的有关资料探讨了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根据这批甲骨资料论证了周原甲骨中“楚子来告”一片应为楚人先祖鬻熊投奔西周的原始记录；讨论了这批甲骨的来源问题；研究了有关方国的一些问题；有一些研究人员则讨论了这批甲骨的分期与断代的问题。这批甲骨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也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也先后撰文参加了讨论。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现的“王”进行讨论；认为在“文武帝乙”庙中祭祀祖先，并“(上册下口)周方伯”的这个“王”，不是周王，应为商王。他还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有关西周甲骨研究的专题报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也曾根据周原甲骨对商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例如，严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为题，对这批甲骨的文字、时代和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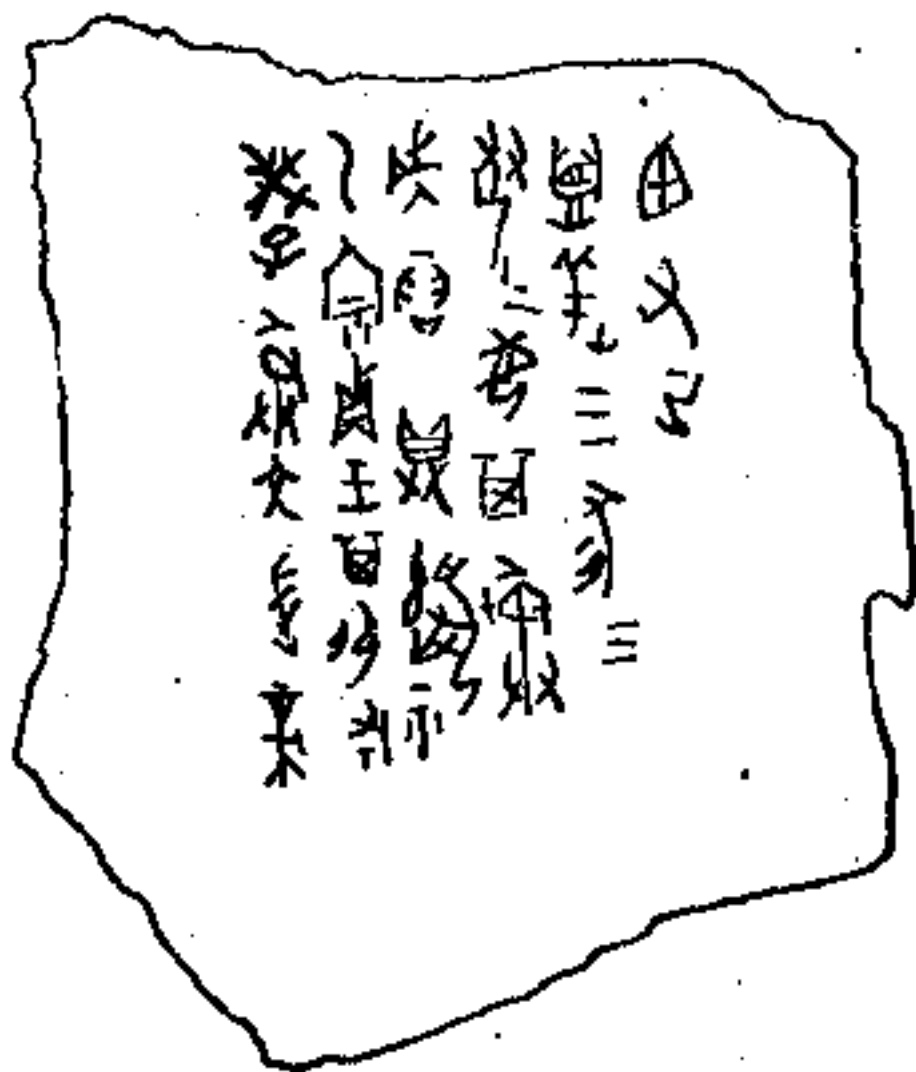


图 43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

正当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时候，周原的另一处遗址扶风齐家村，也于1979年9月发现和采集到西周甲骨22片；其中有字甲骨6片，共有102字。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的一块带有刻辞的较为完整的龟腹甲，仅缺甲尾和甲桥部分；背面共有方形凿孔35个，正面刻有卜辞4条23字，均在卜

兆附近。这片龟腹甲的发现，弥补了过去由于出土的西周有字龟甲均很碎小，对其特征观察受较大局限的不足，同时也开阔了人们对于周原甲骨原有面貌的认识。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殷墟以外，陆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甲骨文新资料。共发现有字甲骨307片，共有甲骨文1,080字。这些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为商周历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可信史料，而且还促进甲骨学产生了一个以周原甲骨为中心的，研究西周甲骨的新的重要分支领域。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您的位置：殷墟

十一 甲骨文研究的未来展望

甲骨文研究，如果从1899年学者的最初发现和鉴定算起，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来，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甲骨文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已经成为当代考古学和中国古文字学中一个发展较快的重要分支，逐步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根据甲骨学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甲骨文研究的未来发展前途是非常广阔的。

根据甲骨学者最近作的统计，八十多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总数至少在150,000片以上。而各种著录甲骨文材料的专书、书刊和论著已达180多种，先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中外学者400多人，总共出版和发表甲骨文研究论著近3,000种。这些丰富的甲骨文资料和研究文献，既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给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任务。

首先，从甲骨文的资料整理方面来看，随着《甲骨文合集》和《小屯南地甲骨》等重要甲骨资料书的出版，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将大大超越前人。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这样丰富的资料是每个甲骨学者都在考虑的问题。不少学者都感到需要在已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基础上，再做进一步全面彻底的系统整理工作。尤其是需要按照材料的内在联系，将甲骨文材料进行系统的有规律的编排，这对于研究甲骨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将会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同时还需要编纂一部便于检索的甲骨文分类单字索引。在这方面，过去虽有日本学者岛邦男编纂过《殷墟卜辞综类》一书，但已远远赶不上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需要。新编这种工具书应当具有类典的性质，无论从材料的取用范围，还是从使用的方便上，都应超过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促进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其次，安阳殷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带有明确科学目的的发掘工作。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应结合已有的资料，把几经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依照出土坑位和共存文化遗物，整理为成套的科学资料，以便国内外甲骨学者和考古学者共同协作，把目前的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来。

在甲骨文本身的通读方面，识字问题仍然是需要学者们再作努力的重要研究领域。八十多年来，甲骨文考释工作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就目前情况看，在甲骨文中出现的4,500多个单字中，可以识读的不过1,000多个，其中真正比较可靠的还不足1,000个，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甲骨文中大量未获解的单字还有待于学者们运用更科学的方法去作进一步研究。为了有助于吸收前人考释文字的学术成果，台湾学者李孝定曾编纂过《甲骨文字集释》一书，近年来于省吾也编纂了一部大型工具书《甲骨文字考释类编》。这些工具书的编案，对于甲骨文的文字考释工作，必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一直是甲骨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近年来这一方面的讨论日渐深入，许多学者先后对“非王卜辞”和“历组卜辞”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的结论。对于董作宾原定为一系列的卜辞，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在作进一步分期的研究。此外，有的学者正在试图从以贞人为分期断代主要标准的传统看法之外，寻求解决分期断代问题的新手段和新途径。这些研究目前都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今后肯定会有新的重要突破出现。在关于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有无武丁以前和帝辛时代的卜辞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在试图找出肯定性的证明。学者们普遍感到，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进行系统的通盘整理，撰写出更高水平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专著。这是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方面，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过去虽然已有许多学者曾对商代晚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国家结构、土地制度等重大问题作过研究和探讨，但所得结论还有

许多问题，远远不能视为定论，不少看法还需再作进一步讨论。此外，商代晚期的对外战争和军事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代疆域、历史地理问题，目前研究得也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商代晚期的科技文化史方面，也有许多研究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例如，甲骨文中的日食、月食材料，虽已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但随着甲骨文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天文计算工作的进步，还需进一步讨论和推定。又如，甲骨文中的“日又（音戈）”记载，究竟是指日食而言，还是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也是有待于研究的问题。再如，商代晚期的历法，也有许多问题需作进一步的解决。诸如置闰规律、合朔、月建、两分两至的有无等，都有待于学者们去进行深入探讨。

古代的气候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商代晚期我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状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内容。—早在三十多年前，有些甲骨学者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文章，曾经得出比较重要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作物栽培技术的记载也是非常丰富的，过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今后还应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关于我国古代的酒类酿造、蚕桑纺织、医药卫生、动物与植物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总之，甲骨文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有一系列重要课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可以预期，随着甲骨文研究在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和重大突破，甲骨学必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甲骨文研究作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科，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学者投身到它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

文章出处：殷墟网站
整理发送：殷商帝国大祭司

【关闭窗口】

© Copyright 2002 www.anyang.gov.cn/oracle

联系站长：ayzszs@public.ayptt.ha.cn



Yin Ruins

殷墟



-
[甲骨字库](#)

-
[大众话题](#)

-
[著名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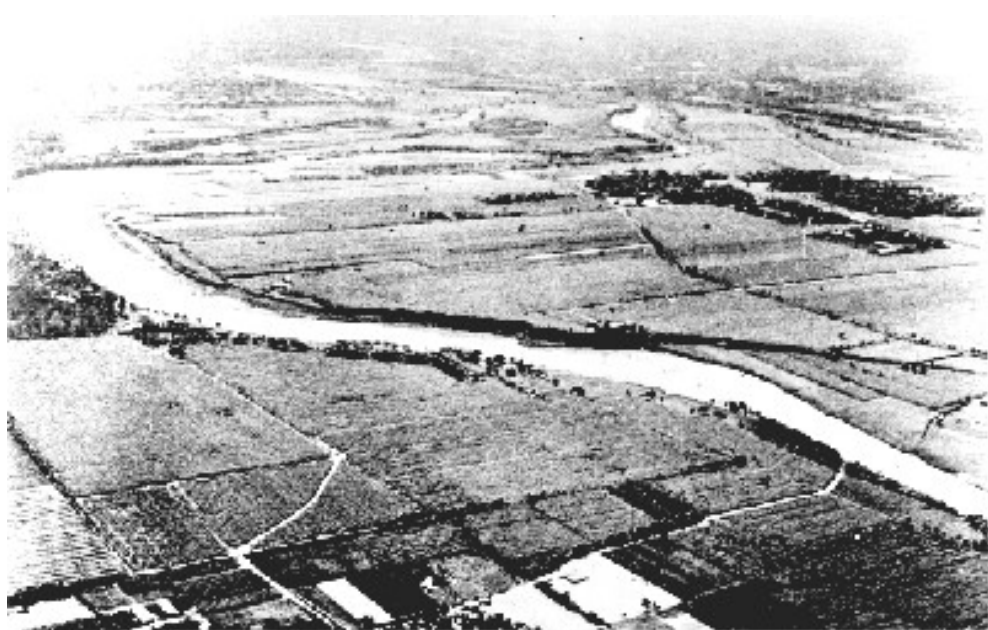
-
[甲骨释读](#)

-
[殷墟动态](#)

-
[站长日志](#)

-
[文物仓库](#)

-
[学术文库](#)



- ❖ [返回殷墟网站首页](#)
- ❖ [破译甲骨文](#)
- ❖ [本站顾问](#)
- ❖ [殷墟网站之甲骨文博物馆](#)
- ❖ [郭青萍先生《甲骨文集句选刻》](#)
- ❖ [察看往日留言（请不要再留言）](#)

站内搜索

殷墟，又名殷虚，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254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

